

CHINA SPRING

中國之春

月刊 · 一九八四年一月號

紐約領事館內幕

• 9 •

鄧小平：「反精神污染」剎車！

方丹：再致鄧小平 • 高準：成都紀行



電子遊戲會不會是「精神污染」？
攝影：木公

北京一個四合院里的公用住家水喉。

攝影：木公



國內生活一瞥

廣東一個市集。

攝影：江心



反精神污染運動會不會又一次掃到佛前

攝影：木公



中南海遠眺。

攝影：江心



維護“異化論”說話的權利！

最近，國內殺氣騰騰的反精神污染運動一度風起雲湧。鄧小平、陳雲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一聲令下，全國宣傳機構大嚷大叫，首當其衝遭了殃的，就是「異化論」和它的代表人物。

什麼是「異化論」？它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理論流派，在歐洲早已有之。爲什麼在中國就不能有它的立足之地？爲什麼剛剛萌芽，就要大砍大伐？無非又一次證明：中國的當政者比其他共產黨更不能容「異己」而已，連共產主義內部的不同聲音都容不下，還高談闊論什麼「可以和香港的資本主義、台灣的三民主義『共存』」呢？海內外人士一片寒心，是有道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異化論」在中國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現象，它正好說明：從蘇聯「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爲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毛澤東建立的中國之「真正的馬列主義」理論體系，已經走過了它興旺的頂點。現在，有一種新的東西出來，跟正統派（或者，可以稱之爲目前的中國馬列主義理論隊伍中的「主流」派）分庭抗禮，打破了正統派一統天下的局面。這種現象可喜可賀！偌大個中國，哪能「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還值得指出的是：「異化」論既然源深流長，在國外有深刻基礎，在國內有廣泛影響，現在，在北京打出旗號，就沒有那麼容易倒下去了。王若水的堅決不低頭，周揚的『不老實』的檢討，就是一個證明。中國的頑固派，且慢沾沾自喜！

我們一貫把王希哲等共產主義—人道主義者歸入民主運動鬥士的範疇。本刊早在「反精神污染」運動之前，就察覺到「異化論」在中國大陸的重要性。我們在今年七月份第四期上就刊登過一篇「馬克思主義的『疏離性』（英譯名，即異化性）」、在今年八月份第五期上就刊登過另一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局限性」，都介紹和支持了「異化論」。本刊願就這裏再一次大胆地預言：「異化論」在中國大陸的崛起，它和保守勢力的鬥爭，將會是長期的、貫穿馬克思主義統治中國的整個歷史時期的理論鬥爭。予謂不信，請拭目以待。

本刊更願在這裏代表「中國之春」的全體留學生、海內外學人正式宣告：

我們同情王若水、周揚等「異化論」人士！

我們維護「異化論」的說話權利！

我們支持一切爭取人權、民主的一切派別和戰士！

中國之春

一九八四年一月號

第九期

目錄

卷頭語 3

國內快訊

鄧小平：反精神污染刹車 本刊記者·小子(北京) 6

專題報導

紐約領事館巡禮 余軍 8

動亂：反精神污染

——中國部份公、自費留學生、學者座談紀要 本刊資料室 11

高饒案件內幕 萬家 16

國內經濟仍然不穩

——訪程明金碩士 本刊記者·燕鳴、林丹 17

最近日本報刊大量報導「中國之春」 本刊資料室 22

大陸專欄

再致鄧小平 方丹 24

談談異化問題 王若水 32

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周揚 34

黨領導佛 民心(日本) 36

香港專欄

中英應停止對罵 前華爾街日報記者·秦家聰 37

評習仲勳關於香港的談話 徐煊 40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New York,
N. Y. 10185. Tel: (212) 728-7008

僑社專欄

旅美雜感.....	王魯生	43
回國探親記(上).....	江心	44
統一中國淺見.....	李瑞駿	51
馬克思主義與意識形態.....	沙林	55
蒙古人歡迎聯邦制.....	經鐵木兒	60
夢.....	柯慙	63

文藝園地

成都遊綜(續完).....	高準	65
老Q新傳(續二).....	柏仁	69
惜陰.....	白丁	82
在西雙版納的日子裏.....	蔡可風	75
王希哲.....	小楓	79
漫畫.....	華君武, 方成等	

封面: 電子遊戲會不會成爲精神污染(攝影).....	木公
封底: 殺風未已(攝影).....	木公
封二: 國內生活一(攝影).....	木公, 江心
封三: 紐約的一次人權座談會(攝影).....	本刊記者

鄧小平：

「反精神污染」剎車

本刊記者·小子·

吵吵鬧鬧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在十二月下旬，突然一夜之間寂靜了下來。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的人民日報，一反前一段日子大叫大喊的調子，眨眼之間，隻字不提反「精神污染」運動，中國大陸政治的神經質，不單令驚魂未定的中國大陸十億人目瞪口呆，而且令矇頭昏腦的外國觀察家和記者們消失了不少跑到北京電報大樓發最新新聞的勇氣。

始作俑者陳雲

回顧這一幕鬧劇的鑼鼓上場，有案可稽的首推陳雲。是他，首先在中央高級會議喊出：「十年後向資本主義總算帳！」的口號。這句話，本來也許可以理解為套用了一句老套的中國俗語：「君子報仇，十年未晚。」然而，那班心懷不善的老幹部早就按捺不住自「經濟改革」以來積下來的怨氣，於是藉機而發。個個都七老八十了，不知哪個有命等十年？彭真、王震、鄧力群首先「破門而出」，黨的機關報刊、大小軍區、省委平日都兢兢業業，唯恐「站錯隊」，一見這邊的「風頭火勢」，誰肯吃「跟中央不緊」的眼前虧？於是紛紛響應，進而「層層加碼」：你在北京打「周揚」，我在各地揍「小周揚」，紛紛都祭起前些日子收藏起來的「正統馬列主義」法劍，殺向離經叛道的文藝界。就不完全統計，光是十一月份，全國被批判的作家有二十八個，被點名的報章雜誌十六個。久經摧殘已不堪一擊的文化界，又一次被沖得丟盔棄甲落花流水。也許，他們以後不會再相信這些一度以「為民請命」而取信於他們的老「政客」們了，可歎可憐的中國知識份子！

鄧小平一度倒向

老謀深算的鄧小平一直是「改革派」中的均衡人物，一直協調在激進派和溫和派之間。這一次，他却一早倒向了陳雲一邊。在中央會議上，陳雲講了以後，他馬上表態支持。他的明確表態，決定性地堅定了下面大小官員們確認中央反「右」決心的估計，於是更不顧一切，四面出擊了。

前段日子，鄧小平一直在南面、西南地區時，他到過成都部隊、昆明部隊、廣州部隊和福州部隊，在巡視過程中，一直維持到十一月十五日前，他的口風仍然未變：強調部隊要搞好冬訓，要搞好「反精神污染」運動。因此，下面就放心繼續「把運動推向高潮」。

可是這一次，跟風的人吃虧了。興高采烈的御用文人們誰也沒有料到，幾天之後鄧就後悔了，叫前台唱戲的他們大大地丟了臉。

低調的胡耀邦

胡耀邦、趙紫陽在反「精神污染」問題上一直是低調的。儘管他們懾於反「右」的來勢，不得不也表表態，以示中央的「一致」。然而，就算在中國共產黨一貫高度集中的新聞控制下，觀察家們仍然能從報紙的字裏行間中分析出裏面的矛盾。

在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報」周揚的自我檢討中，並不是那麼服氣的周揚明顯地把陳、鄧和胡耀邦分開來：

對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陳的「批評」，聽了

鄧小平緊急剎車

以後「精神爲之一振。」，對中央顧問委員會上胡耀邦的「發言」，周聽了之後，感覺是「對我既有嚴正的批評又有熱情幫助」。

這裏面起碼可以說明兩點：

第一、在範圍大、影響大的二中全會上，胡耀邦沒有專門批評「周」。

第二、在範圍較小，影響較內部的顧問委員會上胡對「周」是「發言」中提到，但「既有……，又有……」，態度和分寸都不一樣。「又有熱情幫助」這六個字真是可圈可點，直是把胡耀邦分了出來。

聯系到前一段時間胡耀邦對白樺的同情，對胡績偉、王若水的分寸，人們逐步得到一個胡耀邦較陳雲等元老們更「開明」一點的形象。

儘管胡耀邦、趙紫陽等「少壯」派目前還一忍再忍以保住目前的位置，然而，他們却知道：在哪裏投下一個法碼，才能恢復這政治天平的均衡？

經濟 | 反彈 |

這個法碼就是經濟。而且同時來自內外。

自反「污染」宣傳機器一開動以來，經濟上的「反彈力」馬上鋪天蓋地而來。國內人心惶惶，國外驚疑不定，中宣部長鄧力群一再安慰外國新聞界也起不到作用。

北京某鞋廠，自經濟開放以來，外銷市場不斷擴大，外銷營業額節節上升，已上升到達了總營業額百分之七十，運動一來，領導班子因精神污染，經營路線崇洋媚外，鞋樣太西方化，因此被作爲「整黨靶子」，進行領導機構大換班。換上來的「班子」自然夠「左」，然而外銷大幅度下降，一度降至零。

福州某木材廠，美國西雅圖一家公司投建，搞木材加工，原來質量不錯。運動一到，中層幹部反對走「美國路線」，工人不能領高工資，因而老板指揮不靈，產量、質量直線下降。公司方面的人回到美國，憤然地說：「長此下去，勢必合同撕毀」。

運動造的聲勢越大，外商的腳步越縮，一度「開放」的經濟又告亮起了紅燈。「十萬火急」的警報頻傳，自是「經濟務實派」冷笑搖頭，「凡是派」蠢蠢欲動。中南海又一次面臨着「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權力鬭爭局面。

事實上，陳雲等人是過高地估計了政權的穩定性和過早地伸出了打擊「激進派」的拳頭了，飽受政治創傷的中國，經不起哪怕是一場小「運動」！

鄧小平在這局勢一觸即發的緊急關頭，又一次充當了「平衡」的角色，除了他以外，事實上也沒有第二個有這種能力的了。

政治這個東西，實在也沒有什麼「禮義廉恥」「出爾反爾」可言，而且對於鄧小平來說，這也不是第一次。

據此間消息靈通人士說，從南面回來後，鄧見勢不妙，當機立斷。不顧自己幾天前的調子，一夜之間，翻過了臉來了，他說：「反精神污染」不能這樣搞，只能搞黃色錄音帶，但這是犯罪問題。文化藝術界搞得太過火了，必須馬上剎車。

總指揮一句話，整個樂隊馬上停住了手，茫然所以。人民日報不知該說什麼好，只好把全部反精神污染的稿子拆下版來，把反精神污染的句子刪去。整個北京的政治空氣頓時凝住了。

當然，全國上下，鋪天蓋地的報章、雜誌、宣傳喉舌，再加上各級黨委、宣傳部門、大大小小的「破門而出」的打手，也不是說一聲停就停得了的，已經被批判、點了名或批鬥了的人怎麼辦？被停辦了的報刊和雜誌怎麼辦？一大堆的對外影響和對內影響如何消除？對驚弓之鳥的知識界、文化界，怎樣安撫，使他們繼續跟黨走？鄧小平這一聲「剎車」，足夠他和他下面的一伙「軍師」們忙的了。



紐約領事館巡禮

本刊記者 余軍

編者按：

本刊第八期發表一則來自北京的快訊「吳學謙：改革大使館」，消息雖短，外交部和駐外領、使館裏裏外外却電話頻繁，議論紛紛。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系統的體制改革已是勢在必行，儘管各方面衡量的角度、立場也許不一致。

把中國大陸內的所謂共產主義的政治思想、制度作風原封不動地搬到國外，自然處處行不通，由此而生的種種後遺症也就特別多。

下面這篇特稿，也許對最近在「反精神污染」運動中「鬥」得昏了頭的各種派別，都有清醒的好處。要是有人看了暴跳如雷的話，那大概只能證明他是頑固派一伙的了。

座落在全世界最繁忙的地區曼哈頓區四十二街上的中國領事館，是一幢外表堂皇嚴肅樓房，然而當你一推開它整日緊閉的大門，迎面撲來的氣氛却和這現代化節奏的門外是何樣的格格不入。

李副領事的苦衷

早上，副領事李振東從樓上下來，他是專門負

責華僑統戰工作的副領事，明天有位華僑請吃頓飯。然而，他得今天先到登記外出汽車的小黑板前面去登記。

在領事館叫車可不比在門外叫「的士」，這裏登記的人是僧多粥少，明天能不能按時叫到車呢？李領事也只好聳聳肩膀。領事館車子不缺，缺的是司機。總領事和副領事們都不會開車，再說會開也不能自己去，最近外交人員叛逃的事件發生太多，信差楊國強在押信途中跑掉之後，押信增加多至五人。國內還有指示外出必須兩人同行，以互相監視，司機就是保安人員。

重重框框之下，可苦了實際辦事的李領事，費時誤事不說，氣喘喘地趕去赴宴，還要受華僑的奚落：「出門帶司機，官沒有那樣大，擺那樣大的架子。」人們又怎麼會看得到李領事站在「叫車牌」前無可奈何的表情呢？

葉劍英孫子的惆悵

和領事館一部份急得團團轉的人相反，白天館裏的乒乓球桌和撲克牌桌邊却總不乏人，熱鬧非凡。這一部份人大都平日無所事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曹桂生總領事看在眼裏，却也無可奈何，這些人有的在國內的後台「大」得很哩！

「葉××」，（這是他的外號，名字就姑存忠厚吧），葉劍英的孫子，以武官處工作的名義派到外國來已經工作一年了，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在校成績平平，出外工作連美國人的話都聽不懂，只好窩在領事館裏，整天談戀愛。可是，誰敢來管他呢？

也許，我們不該光是責怪他一個人吧。有個工

作人員，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畢業，國內有個恩愛的未婚妻，就因為在領事館裏無所事事，把這裏一個女工作人員搞大肚子，東窗事發，在「上級」和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忍痛丟掉了國內的未來妻子。

有人說，罪不責衆。是的，然而，該歸罪於什麼呢？

張穎的煩惱

沒能力的人沒事幹，有能力的人也有沒事幹的。章文晉大使的夫人張穎，就是一個。

張穎，原來是外交部司局級幹部，職別和丈夫一樣高，有一段時間的職務甚至比章文晉還重要。在外交部裏曾和喬冠華的老婆龔澎、龔的姐姐龔普生並稱「外交三女傑」。江青接見外國女記者，書寫「紅都女皇」時，把她找來作翻譯。結果她反戈一擊，和章文晉一起向外交部黨委打了「小報告」。因此，打倒四人幫，她立了一大功，名噪一時。

可是現在呢，她却無職無權，無所事事，大使館、領事館裏沒有一個處是她可以插手的，原因很簡單：「國內有規定，大使夫人不得參與使館事務。」女人不干政，可憐的中國人，五千年來的文明史，吃「女人禍水」的苦頭實在太多了，張穎實在不必自尋煩惱，還是心安理得地只做名符其實的大使夫人吧。

夫人問題

其實，能帶夫人出國，這已經是章大使獨一無二的「特權」了，還抱怨什麼呢？外交部有明文規定：除大使一人外，一律不准帶家眷。這可苦了廣大的外交人員。人有七情六慾，何況有的人一出來就是好幾年哩？

長期以來，人們不知為此上了多少明「奏」暗「摺」，然而，「上面」一直管你嘻笑怒罵，捶胸頓足，我自巋然不動，原因也很簡單：不帶老婆，也逃了不少，帶了老婆，還得了嗎？

當然，與其同來的並發症也就來了。上面提到那個「二外」的工作人員是一個例子，王岩案又是一個例子，前一段時間，有兩起外交人員在外面大街上摸女人大腿，引起外界新聞界的大嘩，更是亂了自己的陣腳。據說，連舊金山總領事胡定一，也有一手哩，我和胡領事沒有什麼衝突，就保留他的顏面吧，何況這並不是本文的目的。

最近，到處流傳着「中國之春」報導的吳學謙外長關於今後外交人員可以帶夫人的消息，大家趕忙追問領導，領導也不置可否，大家也只好抱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了。

偷偷摸摸的精神污染

國內「反精神污染」運動的開展，對於領事館人員的心態影響，是擔心恐懼大於歡迎的。對於這一點，曹桂生總領事心中有數。

紐約CHINATOWN有條CANAL街，此街有間華都電影院，裏面專門放黃色電影，人們時時可以發現一兩個使館的工作人員縮在角落裏，消磨上幾個小時。有一次某個工作人員在散場時發現了另一個工作人員，兩人心懷鬼胎，四目相視不敢對看。回來之後，消息就傳開了。有個領導查不出是那兩個人，氣憤憤地對人說：「哼，『火燒圓明園』他們不看，偷偷摸摸地去看那些！」

看黃色小電影，本來也不是什麼大的原則問題。然而領、使館的條條框框是些政治上的鑑定器，不准看X級R級的電影，不准去跳的士高，不准打「麻將」，違反了就是「精神污染」，政治意識有問題。前些時候，有個副部長級的幹部出國，帶着翻譯逛大街，看了一部黃色電影，翻譯當面不說，回來使館就向上舉報，結果這位大概連電影廣告牌內容都看不懂的「大老粗」高級幹部，回國之後就永遠撈不到出國的機會了，檢討反省自不在話下。

問題的癥結是，越禁越引起慾望，人類本來就是那麼奇怪的動物。

駐紐約外貿中心代表團的幾個工作人員，瞞着上級偷偷去了一次大西洋城賭場，回來給人告發了，受到了公開的批判。這些人在會上沉痛反省，會後却挺胸頓足，指着別人的鼻子：「你們問問自己良心，誰沒有偷偷去過？去過的是龜孫子。」事實上，大部份的人都通過不同的渠道去過的，但是，誰叫你們這幾個不「走運」呢？

值得研究的是，什麼是精神污染？什麼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去掉政治上的重重禁錮控制，不要再搞政治運動，也許才是一條文明的出路，每週一次的「黨、團組織生活」會議是沒有用的。

誰吃了他的工資？

×××，四川省的一位大廚師。現在是新澤西州竟成園餐館的頭廚。他是中國大陸的「勞務輸出計劃」下，來到外國的幾萬名勞務工之一。他來到美國後，餐館老板告訴他，「我為你出的工資是二千五百美元一個月，因此，你的工作必須對得起這個酬勞。」但是，他跑到領事館領工資，每月四十三美元。數字天地對比之下，他自不免私下對人憤憤不平：「誰那麼沒良心，吃掉了我的工資？」

誰吃掉了他的工資呢？文化程度不高的大師傅不用心急，我們來細細開列一些同病相憐的數字：

聯合國發給中國駐聯合國的工作人員的工資平均是二千八百到三千美元一個月，然而，他們個人實際領到的也是四十五美元。

中國外貿機構駐外工作人員每月的工資平均是四十三元。

非長期性的出國人員每天只能領到人民幣一元（折合美金約五角多一點），這五毛錢，到麥當奴買一杯可口可樂都不成。

根據德國的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他們實在的勞動所值去了哪裏呢？中國對外貿易部新聞發言人黃文俊，上月對勞務輸出問題曾經有過與高采烈的回答：「今年一至六月，對外簽訂承合合同九十項，勞務合作合同四十項，……成交金額四億六千萬美元，為去年同期的219%……」。看來，是國家「剝削」了個人。黃文俊之流有沒有因為這而加薪升官，我們不知道。

然而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這種「剝削」之下，苦了駐外的廣大工作人員們！走出領事館門外，就是一副寒酸相：不少人為了省車錢，每日從曼哈頓島的西端徒步走到東端去聯合國上班，也是為了省那七毛半的地鐵車費，不少人徒步走一個鐘頭到CHINA TOWN去買食品。四十二街上的教堂裏的救濟慈善的衣物架旁，更時常可以看到使館人員的熟悉臉孔……。

可惜的是，張大嘴巴在聽着黃文俊口沫橫飛地發佈新聞的中外記者，沒有誰想到這些「偉大勝利」之下苦着臉孔的為四個現代化「奉獻」的人們。有誰願意為這些在物價昂貴的資本主義社會工作，却領社會主義待遇的人討個公道呢？

芝加哥的上空跑了信差楊國強，胡耀邦還在日

本輕輕鬆鬆地說：「中國有十億人口，跑他個一千萬也沒什麼。」如此看來，駐外人員的「精神污染」還會繼續下去，曹桂生總領事也只好眼開眼閉。

代表團長的照相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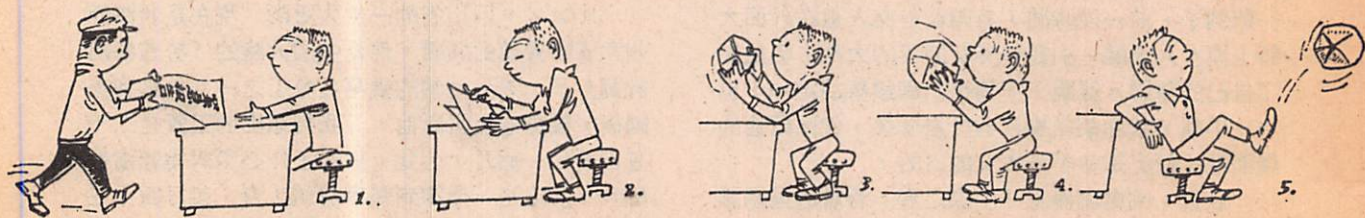
五毛錢一天的工資並不怪，窮就大家都窮點吧，怪就怪在同是五毛錢，却有的人大買高檔商品回國，這就令人眼紅了。

最近，北京工藝美術公司來了一個代表團，在美轉了幾天，返回臨行前，×××代表團長自己逛了一通大街，購買一大堆高檔商品回去，計有一百二十美元的照相機，九十九美元的收音機……等等，美元從哪裏來的呢？真是天曉得。

與此相反，代表團的團員手裏捏着這些五毛錢，不知道該去買些什麼好。在華盛頓，他們跑到地攤市場去，盡挑那些舊衣裳買。一個團員買到二角半一件的連衣裙，歡天喜地到處炫耀。人們說什麼好呢？只能寄予可憐的眼光罷了。

如此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中國的外貿人員向外商要錢要禮物，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問題是「反精神污染」運動來臨之下，人們是怎樣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辦法可多着哩！最常用的方法是暗示商人。要「孝敬錢」的話絕不出自我口，但你要談判生意，總是談不攏。反正老板是「公家」，談不談得成，與我何關？

走出領事館，你可以搖頭嘆息，你可以痛心疾首，堂堂中華民族，泱泱大國的外交人事狀況，原來是這個樣子。可是，你可以改變得了它嗎？！



實用折紙 原載《諷刺與幽默》 王復羊

動亂：“反精神污染”

中國大陸部分公、自費留學生、學者座談紀要

十二月一日，中國之春編輯部邀請了幾位最近從大陸來的留學生、訪問學者，就目前國內反精神污染問題作討論。以下是他們在座談會之談話紀要：

與會者：梁偉實（中國大陸公費訪問學者）

周青珏（中國大陸公費研究生）

黎天華（中國大陸自費留學生）

汪 岷（本刊主編）

劉田剛（中國大陸公費研究生）

汪 岷：最近，在中國大陸開展了一場反「精神污染」運動。雖然，共產黨的領導人不承認這是又一次運動；但實際上，這不但足以稱為一個運動，而且是一個遍及全國，深入到各基層的運動。對於這個運動的看法，我們今天特意請了你們四位離開大陸不久的朋友來，希望能發表你們的意見。首先，請哪一位先談一談反「精神污染」運動的背景和情況。

周青珏：在中國共產黨十二屆黨代表大會以後，提出了要搞三年整黨，第一是反右；鄧小平和陳雲都作了重要的講話，鼓吹反「精神污染」。到現在為止，最少有十六人被點了名批評：胡績偉、王若水、陳登科、周揚、夏衍、流沙河、白樺、蕭軍、劉賓雁、葉文福……等人。胡績偉和王若水已經被撤了職，周揚也作了檢查。最少二十八種刊物被勒令停刊，各人都得做「自我清查」，人們都得談自己在門戶開放政策之後所受西方的影響所犯的錯誤，都是祇談缺點，不談成績。搞人人過關，一如「文化革命那樣。學校裏的政治課和政治討論課增加了，政治輔導員的數目和工作加強了。有些學校還搞了大搜查，如果有鄧麗君的唱片或錄音帶而不主動交出，被搜出了以後，就要開除學籍。凡是代表團，出入境的時候，都經過很嚴格的檢查：一本書一本書地翻，一張一張照片地看，一卷一卷錄音帶地查，如臨大敵；書信檢查更不在話下了。

黎天華：我已經好久不曾收到家裏來信了。

周青珏：有些幹部子女收到家裏來信說，現在千萬不要回國，國內又搞運動了……。

汪 岷：最近，出來點人名的是中宣部出面。彭真，王震，鄧力群都有點別人的名。

周青珏：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就整黨問題上提出了「反右」，提出了不能抽象地談人道主義，要社會主義的人道。不能抽象地談「異化」現象；不能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陰暗面都歸究在「異化」現象裏。中央宣傳部最近還提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存在人權的問題。

黎天華：在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之前，已經有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了：那時，提出了要在社會上杜絕「引誘青少年犯罪，傳播黃色思想」而對刊物、錄音帶、錄影帶進行檢查。但這些檢查祇在工作單位查，也查得不太兇。家裏是沒有查的。陳雲提到：對青少年一代，十分兢心。所謂要清除來自西方的毒素，進而要清除「精神污染」。

梁偉實：這次清除「精神污染」，可說是氣氛十分凝重的。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勢。很多人都立刻感覺到：又要攪運動了。說是不搞，事實上運動不停。他們對報紙上的批判：一切爲了人的提法。一切爲了人，有什麼不對？難道一切不爲了人，就對了嗎？另外，對所謂「異化論」的提法，認爲什麼叫「異化論」沒有講清楚。如果說在社會主義時期，一些幹部的退化變質，難道這些現象還少嗎？而今，一些人

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教條，這又有什麼不對。要搞運動，根本問題是在上面而不在下面。現在很多上層幹部已變質了，要搞就祇有搞他們。我接觸到的一些大使館的人員，也有表示不明白為什麼要搞反精神污染。按照一些傳出的謠言說：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出現了五百人集體舉行裸體舞會的事情。（笑聲，衆人表示不可置信）這些謠言，說出來也不能讓人家相信，特別是在中國科學院。如果說有幾個青年工人一起跳跳舞倒不奇怪。用這類謠言來支持這個運動是很無力的。有些黨員也說：什麼異化論，我不懂，也不感興趣。事實上，這「異化論」是什麼，大多數人鬧不清楚。

劉田剛：這「異化論」，西方有些人翻譯為「疏離性」。在「異化論」的檢查上，周揚作了檢查：「自己在概念化的問題上打圈圈，沒有實際上跟中央保持關係。」

周青珏：陳雲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到了：全黨全民要時刻注意經常與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劉田剛：在黨中央的內部，有些幹部是走得前一點，有些後一點，是不完全一致的。記得去年我在大陸看的電影「越王劍和吳王劍」，演越王勾踐的是一個很有名的演員，名字——我記不清，他就是演「南征北戰」的師長的那一位。故事是說：越王勾踐被吳王打敗，囚禁之後，勵精圖治，爭取了人心，勝利了，打敗了吳王。但勝利之後，又一樣殺自己的功臣。故事裏也有一個妃子，用來影射江青。結果，這部電影挨批判了，說是含沙射影了。

梁偉實：我聽說還有電影「天雲山傳奇」也挨批判了。「人到中年」也挨批。「人到中年」的爭論很大，一般地，知識份子或同情知識份子的人，表示支持。

劉田剛：是，這部電影拍製時就遇到很多困難。拍了又停，停了又拍，直到一九八二年，「落實知識份子政策」時，才使這電影拍完。一些激進的幹部提到，不冒點風險是不能拍得成的。結果，一公演，立刻反影很大：一些人說，人都出國到加拿大去了，還愛什麼國？但在知識份子一方，很多人看了，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有些人說：二十多年沒有看過這麼好的電影了。這部電影是為知識份子說了話。

黎天華：這電影是反影真實的，按照調查：知識份

子的工資收入，食的、住的環境是最次的。非正常死亡，神經失常的比率是最高的。

劉田剛：但這部電影已作為批判電影而挨批了。看了這部電影，知識份子反影良好，但有些工人說：知識份子的收入，每月五十四元半，少是少，也有得發，並且是從一九六八年發到現在，而我們却沒有保證。某些幹部看了，却立刻就說是毒草，是攻擊黨。其實，這部電影內的反派人物祇不過是部長的太太，並沒有直接指責副部長。副部長太太的那幅嘴臉，說不是主治醫生就給副部長動手術，很有意見。這是很尖銳，却又很真實的。至於「天雲山傳奇」…

梁偉實：「天雲山傳奇」一公演，我就聽到一位高級幹部找自己的子女問道：你的爸爸象不象一個為了搶人家的老婆而把別人打成右派的人呢？這樣的電影是要攻擊黨的。

劉田剛：其實這部電影反影的是在反右鬥爭之中造成的一些冤案。受冤屈的右派份子，也是一個共產黨員，還是一個烈士的「紅後代」。冤案以後，又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增加了它的程度。當然，在這過程中牽涉到很多人，其中很多運動中的「積極份子」，他們發現了自己也成了電影裏的反面人物，自然就不高興，就要罵起毒草來了。

汪 岷：這就可以牽涉到異化論的問題了。在中國共產黨的內部，也就發生了異化的現象。

梁偉實：你們有沒有聽過胡績偉和王若水的講話？我當時聽了就覺得很帶勁。他批毛澤東批得很厲害，當時，鄧小平知道了就罵：中央還沒有表態，你王若水算老幾，這麼快就講這些話嗎？我覺得，現在批判精神污染和異化論，就是因為他們恐懼這樣會動搖統治階層的基礎。異化論認為：一種內在主體的力量會逐漸發展到它自己的對立面，而這種對立面又會發展到外在的對立面。也就是說，一種本來是屬於自己的，也會發展到對立的一方去。一些人，也就會從人民的公僕異化到敵對的一方，一些政府也從人民的陣營異化到不再為人民的政府方面去，受壓迫者也會變成壓迫者。本來，這種現象，是有目共睹的。而現在對這種異化理論的批判，實際上就很軟弱無力：批判說，異化現象是馬克思早年向資本主義社會提出的，不是向社會主義社會提出的。請問，當時社會主義祇是理論

，世界上還不存在社會主義，馬克思怎麼提得出來呢？其次，「異化」馬克思早年提得多，晚年祇在資本論略提了幾次。反「異化」論者實在很奇怪：他祇要馬克思的晚年，而不要馬克思的早年。對於毛澤東，就不要他的晚年而要他的早年。毛澤東的晚年提出了黨內有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實質上就是有異化現象。所以晚年的毛澤東就不敢要了。還有一點：就是對待傷痕文學，例如白樺的「苦戀」，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把人權放在主要地位。他的詩：「歡呼光輝的里程，我把人字寫在天上」，就是要尊重人權。提到要一切爲了人，而不能把人當成工具。文化革命中把人類看成有如草芥。毛澤東曾說：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中國人死掉一半，那就更好，剩下的一半就可以在廢墟上建設全世界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什麼話？這是忽視人的價格，人的生存意義。批判「一切爲了人」，主要原因是怕這會動搖特權階層的統治。中國的統治者，包括共產黨人在內，都是最關心本階層的統治。封建統治者不說了，中國共產黨建國以後仍是這樣。劉少奇提到：「要做黨的馴服工具」，這和封建領主把農奴稱爲「會說話的工具」沒有本質區別。

黎天華：最近大搞紀念劉少奇誕生八十五周年紀念，是不是要恢復這「馴服工具論」？（笑聲）

梁偉實：誰都明白，異化論與這種馴服工具論是不能相容的。毛澤東搞文化革命，目的是保持紅色江山千秋萬代不變顏色。他們怕自己的基業不能子子孫孫萬代傳，更怕後人罵他們是中國的罪人。他們做事情出發點不在於爲人，而在於爲他們自己，自己的思想。

周青珏：在批判異化論中，中共中央裏面也有反對的力量，例如周揚，我認爲他的自我批評不是主動的。

梁偉實：那當然，在批判白樺時，周揚是反對的。

汪 岷：周揚在反右時期，是一個打手。在文化革命初期，他也推波助瀾，得罪很多人，後來也被打倒了。前幾年，在廣東的文藝座談會上，他講了兩個多小時的話，最少一小時都在哭。對歐陽山，他哭着對他說：「對不起啊！以前我整了你」，又是握手又是哭。看昆秦牧，也是一樣哭和握手，當時很多人都很感動。我參加了這個會，

也很感動。

黎天華：他不是在做戲吧？在延安時，也曾對被整的人又哭又道歉的。

汪 岷：這一次他不是代表共產黨的黨委來道歉。他說，「我要控訴四人幫，但是在坐的同志不肯相信我，因爲我當時是參與整人的。」

劉田剛：他到底有點良心發現吧？

汪 岷：他的良心發現，他的做法被認爲是右傾走過頭了。變成了反精神污染的靶子了。

黎天華：現在有一些人覺得：現在的反精神污染，就包括了反西方思想的影響，是跟中國共產黨要再次傾向蘇聯有關的。有可能是爲這種傾向清除障礙。

劉田剛：中國共產黨要傾向蘇聯是很有可能的。從五十年代中蘇關係，他們的思想理論基礎來看，中國大陸的整套建制、設備都有蘇式的基礎，一些人提到：中國要能辦得像蘇聯一樣就不錯了。

黎天華：其實，這是很不同的。蘇聯人口才二億，版圖却比中國大得多。人口沒有構成蘇聯的壓力，他們很多資源還不會開發。中國人口多，還在吃飯問題上要解決，抄蘇聯的經驗怎樣行？

劉田剛：親蘇派的本身，是有他的歷史淵源的。在五十年代派到蘇聯去的學生，當時是二十來歲，現在是四十到五十歲了。這些人，現在不少人都掌了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的大權，他們受的教育，他們的思想方法，加上中國的工業，特別重工業的基礎，都是蘇聯模式的。中國現在要提到開放政策，就得吸收、重用各種各樣的人材，親蘇派當然成了很有影響力的一派了。而留美的學者是近幾年的事，要想他們能起作用，能掌握權力，還得等十年以上。所以，目前一階段內，親蘇派是佔上風的。當然，以後在中國的政壇上，由於留學西方的一派人的影響，就大不相同了。

黎天華：事實上，我們如果回去了，想不承認自己是「親美派」也不成了。

周青珏：是啊！你想不承認，人家也認爲你是。將來，中國的局勢在親蘇和親美派系之爭將會上升成爲相當重要的。

汪 岷：你們認爲，異化派，或異化論者是屬於哪一派？

劉田剛：我認爲不能把它歸入親蘇或親美的一派，儘管以後，這異化派被壓下去，他們還會起來，提出更尖銳的觀點。

周青珏：對！所以，要是一些人提出什麼「反共」、「打倒共產黨」等口號時，大多數人，特別是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民是不能認同的，而提出了異化的論點，就會引起各種爭論，這些爭論的結果，很容易就導致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共產主義。

梁偉實：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提的「異化」就是異己，是背道而馳。所以，我認為異化派很可能就是中國被壓制下去的民主運動的一種表現形式。

周青珏：我同意你這種觀點。國內的環境條件不同國外，提出異化論，就是動搖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一些人祇會喊「反共」的口號。這樣空喊，永遠不能把共產黨給「反」了下去的，而且，容易給人以反感。這樣空喊和共產黨空喊「十五年超英趕美」一樣幼稚可笑。有些人要全盤地否定馬克思這樣做也不恰當，馬克思在歷史上是起過作用的。他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者發現了自己的弊病以後，採用一些方法，避免了很多可能發生的事情。這等於一個病人有病，自己不知道，結果醫生知道並且指出來了。如果病人是驕疾忌醫，就是死路一條。病人聽信了醫生的話，採用方法，就可以避免疾病的加深和顯露出來。醫生的作用已起了，病人可不能因為自己沒有發什麼大病，就說醫生不行。對馬克思主義全盤否定，特別是過去的歷史作用是不科學的；問題在於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還死抱着這教條不放，甚至強迫人們去接受，就走向反面了。把它作為唯一的真理，更加大錯特錯了。

劉田剛：歷史上這現象很常見，一方面接受了，一方面反過來罵你的理論。

周青珏：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它在十九世紀起過作用，那就行了。硬要現在還要搞馬克思主義，就是要把歷史拉倒車。共產黨利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論，在貧窮落後的國家裏宣傳：窮人之所以窮，是生產出來的東西都給富人剝削去了。要想不窮，就得奪取政權，取回「剩餘價值」。這對貧窮落後，衣食短缺的國家的人民是很易接受的，所以共產黨在這些窮國獲得成功。成功之後，更加貧窮落後，那却是另一回事了。

黎天華：那些「異化派」就是針對那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出現的問題來提出他們的「異化

理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管在什麼時候：是毛澤東當政時也好，是華國鋒當政時期也好，現在鄧小平當政都好，都是要人們衆口一矢，不准離經叛道，甚至不准有異議。而今提出了異議，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所不能相容的。鄧小平提出四個堅持，是對異化論的反擊。

梁偉實：我覺得異化派是反毛的，從他初始時的言論，反毛的味道很濃。

黎天華：鄧小平雖然也反毛，但他要均衡各派的勢力，保持自己的地位，經常表現出一副不偏向某一派勢力的姿態。他對異化派現在的壓抑，不能說明，他將來不向極左派壓抑的。將來風頭不對，他又會向極左派壓過去的。鄧小平是個政治家。他很懂那一套。

劉田剛：鄧小平不會不反毛，也不可能反得徹底。毛澤東死後，給中國統治階級留下一個相當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從最基層的街道居民委員會到中央的政治局，每一個階層的人都被控制得嚴嚴實實。中國人的倫理關係被破壞了，人與人之間，那怕是父子，兄弟，夫妻，都成了互相監視，互不信任。希特勒不能做到的，毛澤東做到了。鄧小平上台以後，當然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以順應民心，但原來的機器也太好使用了，對他們把這「無產階級鐵打江山代代傳」有好處，他怎會忍心徹底拆散這機器呢？

梁偉實：這就是我們和他們之間最大的不同點，我們希望的是：中國人民要享受到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基礎上，使國家真正強大起來；而他們，就是要保證自己的功業，他們的江山能一代傳一代地傳下去的基礎上，使國家強大起來。

劉田剛：我說鄧小平會批毛，但批不徹底是必然的。他一方面批毛，但異化論批毛，鄧小平又反過來把異化論者給打下去，這好像不合邏輯，事實上是合理的，因為鄧小平考慮到江山能否代代傳，就怕一批得厲害，動搖了他們原來的國家機器，是鄧小平所不願意的。

黎天華：鄧小平這個人最沒有信用，一會兒是永不翻案，一會兒是我復出了，可以繼續批，到頭來還是打擊報復。

汪 岷：這些個人的問題就很難說了。周揚也翻復了很多次，到頭來誰知他會不會又翻過來？但不管異化派的代表人物是誰，我們對

異化派還是採取了肯定的態度。

劉田剛：但他們的目的還是在於鞏固統治。

周青珏：其實，異化理論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在西方國家，西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於蘇聯，這理論都容許。王若水等人提出的異化現象，是把異化理論用到中國的現實問題來。異化論現在是被批判了，但他是一定會以另一種理論形式，在另一個角度再被提出來的。現在的保守勢力，以彭真、陳雲等人為代表，鄧小平為保持地位而傾向他們的一方，向異化派進攻。我認為這是保守勢力的一次有系統，但已是這群老保守派的最後一次進攻了，他們祇是為傳宗接代而作這次反撲的。在中共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對異化論批判；集中在對「一切爲了人」的批判，就是因爲共產黨一向要「一切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而胡績偉、王若水等人再提到「政治要爲人民服務」之間產生了矛盾。鄧小平利用了胡、王批毛，而今又打算把這兩人犧牲掉。

汪 岷：「一切爲了人」，就是要有「人權」嘛！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大陸的「人權，自由」都要成爲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那怕是中國之春提的「人權、自由、民主、法制」，在西方學者眼裏是很幼稚的，但在中國大陸，却仍是很刺

激的字眼。

劉田剛：中國的知識份子，對這「人權、自由」仍很敏感的。

周青珏：現在中共整黨，批異化論，將會使本來不受注意的問題變得受注意了。本來，異化論人們很少去研究，一批，研究的人就多了。今後，我們也要好好地學習這方面。

汪 岷：要請一些有這方面研究的學者作多多介紹。讓大家更多瞭解。

劉田剛：一方面要在理論上多作研究，另一方面要對共產黨今後的做法多作研究。中國大陸目前是一黨專制，但在中共黨內却不是鐵板一塊，我們要從他們之間的矛盾，研究到我們的策略來。

劉田剛：我懷疑毛澤東事實上是不是真的讀過資本論，這東西很不好懂，我的學歷比他高得多，也覺得十分難懂，你們幾位懂不懂？（笑聲）周恩來或許看過點，他們幾位留學法國。至於，鄧小平，他們在外國的學歷都找不到，聶榮臻據說是半工半讀了兩年罷了。沒唸過資本論而做共產主義革命，怪事。毛澤東學歷更低，他看得懂？他祇是一個中國的農民起義領袖。

梁偉實：中國大陸最大的精神污染是封建家長制、個人迷信，和官僚主義，而不是異化論。

徵求廣告



徵求廣告

		全頁	半頁	1/4頁	1/8頁
封底	黑白	\$ 600	\$ 375	\$ 200	
	彩色	\$ 1,200	\$ 975		
封底裏	黑白	\$ 400	\$ 250	\$ 150	
	彩色	\$ 1,000	\$ 650		
內頁	黑白	\$ 200	\$ 110	\$ 60	\$ 30
	套色	\$ 240	\$ 150	\$ 100	\$ 70

* 長期廣告價錢另議

** 彩色廣告要供應分色底片，否則價錢另議。



高、饒案內幕

萬家

關於高崗問題，在鄧小平文選中有這樣一段話：高崗是搞陰謀鬼計的，揭露高崗的問題沒有錯。高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他用拉攏的手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到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劉少奇同志拱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鬼計的方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鬭爭還要肯定，對饒的問題處理比較寬……。

這一段話的意思是說：高崗案件不是冤案，沒有搞錯。其唯一理由是，他反對劉少奇，想把劉少奇拱倒，自己當副主席。如果真是這樣，請鄧小平回答下面幾個問題：

1. 黨章那一條規定，反對劉少奇就是反黨，假如有此規定，那麼毛澤東把劉少奇整死，毛澤東豈不是最大的反黨份子？為什麼你們至今不敢說毛反黨，不敢公開批判毛，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

2. 高崗反對劉少奇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似乎這足以證明他是反黨份子，那麼請問鄧小平，毛澤東反對劉少奇也是首先串通林彪，你們為什麼不敢反對？為什麼不敢說毛澤東進行反黨活動？而是瞠目結舌被毛林整個落花流水，連你自己也險些喪命？請問，你們黨內究竟有幾個標準？你們究竟是馬列主義政黨，還是封建幫會？

3. 你和陳雲揭發了高崗，說明你們忠於黨，忠於毛澤東，為什麼到頭來你倆先後失寵？毛澤東既然爲了保護劉少奇而拿高崗開刀，說明他對劉少奇愛護備至，為什麼十年後劉少奇又遭難？

4. 高崗和饒漱石，一個東北，一個華東，相距幾千里，他倆是怎樣結成了同盟？爲何從來不交待？

五十年文革，把你們黨的秘密揭穿了許多，大量事實說明，你們從來就是勾心鬭角，林彪、康生、陳伯達就是生動的幾個例子。這說明誰想拱倒誰，乃是司空見慣，並不新鮮。毛澤東的原則，從來是利用矛盾，分而治之；只要不反毛，毛從來不追究。爲何單對高崗這樣大的仇視？

上述問題，恐怕鄧小平很難回答，因爲高崗案件，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鄧小平的一段話，完全是爲毛澤東文過飾非，企圖遮掩中共的黑暗面。鄧小平寫「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一個內定不寫的界限，就是彭德懷之前的一切冤假錯案，一律不

予平反，反右運動實在抓人太多，不得不同意改正，但是運動本身不准否定，而咬起牙齒說：定要必要和完全正確。此乃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但是中共並非存在于銀河系，而是在地球之上。如今地球上的一切大事件，已無秘密可言，高崗冤案，也難以保密，據筆者所知：高崗遭毛澤東暗算，與反對劉少奇關係甚微，真正的原因是「高崗實乃毛澤東和斯大林鬭爭中的犧牲品」了解毛、斯關係的人都知道，斯大林從來不信任毛澤東；毛澤東也從來不尊重斯大林，而是和他明爭暗鬭。因此自王明垮台後，斯大林一直想在中共黨內重新扶植代理人，選擇的結果，高崗中選。早在日本投降之前，高崗就和斯大林有秘密連繫，此事自然逃不過毛澤東的耳目。毛澤東將計就計，建國後讓高崗在東北掌握全權，並允許他成立東北人民政府，讓他出任主席，這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目的是讓高崗自我表演，以便將來一起清算。關於這一點，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略有記載，現將記憶所及簡述如下：

「高崗任職東北時期，和斯大林的私人交往甚密，每年「八·一五」，高崗都以個人名義致電斯大林，感謝蘇聯紅軍解放東北，斯大林必回電答謝；同時，高崗慶生日，斯大林以個人名義贈他一部轎車。」

文字雖然不多，但已可看出端倪。高崗怎可越過毛澤東給斯大林拍致賀電？他還把老毛放在眼裏嗎？毛澤東對高崗如此「欺君之舉」，怎能放過？毛澤東過生日斯大林從未贈送任何禮品，居然給高崗贈汽車，這是抬舉高崗，還是公然貶低毛澤東？這才是高崗遭難的真正原因。高崗被清算的時間是一九五四年，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時間上也十分吻合。

或許有人問：爲什麼毛澤東不反斯大林，反而遭斥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呢？

毛澤東並非不反斯大林。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之初毛澤東完全贊成，而當他和赫翻臉之後，才不再支持。後來毛意識到赫反對個人崇拜，已經傳染到中共內部，對他十分不利，於是他堅決反赫，竭力保斯，下令中共全黨，不准再提個人崇拜，並且決定高懸斯大林像片，絕不取下。可見，毛澤東不是保護斯大林，而是保護他自己。實際上他曾多次在中共高層會議上嘲笑斯大林，說斯是神學中專畢業，不懂多少辯證法。

國內經濟仍然不穩

訪程明金碩士

本刊記者 燕 鳴 林 丹

前 言

程明金碩士，男，在中國大陸的一所大學擔任講師。1979年由中國政府公費派出留學美國。1981年下半年獲得理科碩士學位，返國後兩年來，未能發揮所長，於1982年再申請自費留學繼續深造。在獲得一間著名的大學之資助後，1983年10月再度赴美。

本月刊編輯部記者燕鳴，林丹兩次專訪了程明金碩士。相信，從程明金碩士的經歷和觀點，可以給予我們和一切關心祖國乃至個人前途的人以參考。以下是專訪的錄音，整理之後未經程碩士的再次過目。

燕鳴：程先生，你是由大陸派出的公費留學生，在取得碩士學位回國工作之後，又再次獲准赴美留學的人。像你這樣的情況實在不多見。你能談一談你兩年多以前學成歸國的情況嗎？

程明金：我們一回到祖國就很希望把自已所學到的東西都用到祖國的建設事業上。但是，第一個感覺就是發覺一切都變化了。無論別人對自已還是自已對原來的事物，都有了一層隔膜，別人覺得我們，吃了洋水，已經不再是以前的人了。

林丹：不同了，地位不同了，好像當官回來一樣了，是嗎？

程明金：是有一點這樣的味道。這其實也不足為怪。以前，我們一起唸書的初中、高中、大學的同學。都會為彼此之間的文化程度不同而產生了隔閡。

燕鳴：這種隔閡，會不會引起彼此間的歧視？

程明金：這一方面是取決於自已個人，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由自已取決的。就我個人來說倒沒有自以為身價不同，但是很多事情給予我很大的困擾。

燕 鳴：什麼困擾？

程明金：比如說，我回去參加工作以後，發現一些工作上的困難和存在的問題，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提出來嗎，馬上遭到領導和其他人的說：“留學回來了，眼光也高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如果不提出來呢，又說：“咳！你看，這些留學的人，沒有用！可不是跟我們一個樣子的嗎？”所以實在難做。

林丹：能提一些具體的工作上的問題嗎？

程明金：在具體工作上的問題就更多了。其中很普遍的問題是配不上套；某些單位，由於獲得了外匯也就很想提高自已的水平追求“高、精、尖”（高級、精密、尖端）的東西，但這些東

西，往往與國內原有的設備差距很大，自然就不容易配上套，一配不上套，又得伸手向國家要外匯，想要配套，上頭領導的就說了：“已經給了你這麼多錢了還嫌不夠，一天到晚老是要錢。”這除了是國內的人缺乏這方面的經驗之外，還包含有一個制度上的問題；例如，爲了搞研究，成立中心實驗室，這中心實驗室所要研究的項目，就負擔很重，條子一大堆，要填上一大堆表格才能提上去，煩死人了。但是，作爲中心試驗室，本該是要水平很高的人才能勝任，事實上沒有！都是把水平不高的人塞進了中心實驗室去工作的，所以老是做不出成績。加上中國人有個大毛病，儀器一落到自己手上，不論用上用不上，都再也不會放出去；結果這些儀器都派不上用場的多，本來這些設備是很有用的。在我們的那個單位，有一個這樣的實例：有一次買回來的精密儀器落在一個技術幹部手裏，但他只有中等技術學校畢業的程度，要弄懂這儀器，需有很好的技術水平加上良好的外語基礎，才能把那本說明書和資料看懂。他自己沒法看懂，又不肯向別人請教，後來沒法了，才交給了一個退休的老工程師去看。結果，過了一年，這位早已退休的老工程師才把這疊厚厚的說明書翻譯爲中文。他這位技術幹部卻沒看過說明書而胡亂操作了一整年。

燕鳴：真是不可思議，他們是怎麼工作的呢？

程明金：國內的工作都是這樣：比如說，某單位要生產維他命A，他們就派人到一間生產維他命A的工廠去看，學習一到兩個月便結束，回來後往往就大叫：“不行不行，我們的技術設備不夠……”。記得那一次，我們單位派去的人說不行，是因爲他看的那間廠生產時的壓力就是十六個大氣壓，而我們的設備不能達到，就回來說不行了。其實，我們學過化學工程的都會知道：某些生產條件不能滿足，是可以採用其他途徑去生產得到的。被派去的人本身水平太低，這裡學兩個月，那裏學兩個月，哪裏能學得來。

燕鳴：成立中心試驗室不好些嗎？

程明金：事實上，中心試驗室的水平太低，

也不太能解決問題。所以，各個單位都佔着好的儀器，不肯交出來或借給別人使用。儀器的利用率就很低，使得各單位都覺得自己的儀器不夠用；不夠用又向國家伸手要錢再買儀器，害得國家的外匯更加短缺。現在，越鬧越不像話了，同一間工廠，不同車間，一個車間向另一個車間要求技術上的協助，也得算錢，毫不含糊。

林丹：那怎樣算錢？

程明金：例如，我們生產維生素A，要另一車間幫忙一個研究項目，就要收人民幣2,000元了。外單位來，就更更錢了，他們拿一個樣品來，作某種研究就要收他的錢。其實，就是靠這車間擁有這部儀器，才能做這項研究。

燕鳴：爲什麼要這樣做？

程明金：因爲這叫做“經濟效率”提高了。多添了這一筆收入，這車間不是很有成績嗎？這在外國來說，同一個公司之間借用儀器，不會有這種情況吧！這樣做，限制了儀器的效率，而且阻礙了工作的進展；另外，儀器的不配套，也嚴重影響了工作。但這些只屬於技術上的問題，我認爲還不太難解決。

燕鳴：你認爲目前亟待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程明金：是技術上的基礎問題，而不是尖端的問題；尖端科學就像冰山的尖頂，而它的大部分都在水底下。在中國，什麼激光原子物理等等都欠缺有一個強固的基礎。爲了宣傳，一些雜誌常常宣稱這也突破，那也突破了；其實，這只是表面的，最重要的還在於基礎，中國就最欠這個。這涉及到資金的分配，人材的培養方面了；以中國的情況看，工程技術人材應該比研究人材的培養要多得多才行。要攬研究項目，例如楊振寧要來搞原子物理，我看全北京的電力供應給他也不夠用，我們就是沒有這基礎。在培養人材方面，應用科學的人材技術員嚴重的不足。另外，對於哲學人文學和經濟的管理方面的人材不足，實質上也影響到中國的管理制度。其實，中國與外國的差距，不僅僅是在科技上的差距，在其他方面的差距也是很大的。現在，國內的人都在學

物理、化學。沒有人想學農業。其實農業很重要，社會科學都很重要。

燕鳴：那爲什麼沒有人去學？

程明金：學了回去，大都覺得用不上。將來，那些學物理、化學的人，也會有這種感覺。據了解，有些訪問學者，已關心起買些什麼東西回國，將來作爲自己的小家庭用途了；他們到底不同於留學生，比較有目的地爭取一個學位，就算在外國學到東西，回去之後也派不上用場。本來，很多東西在外國是很有用的，回國之後就沒法用。例如，我國的經濟理論，管理方法就有很大的問題：如外國有支票，我們國內就沒有私人支票，這使到每個人都持現款，多了的錢才存到銀行；支票實際上能起的作用，在國內却達不到，使國內的資金，鈔票的流通大感不便。又如股票國內也沒有，股票往往使資金集中派上用場。而中國人民普遍連對股票是啥東西都不知道，一些人說中國科技水平差外國20年，其實不止此數，其他方面的差距更大。

燕鳴：爲了刺激生產，中國共產黨不是採取了一些措施了嗎？

程明金：是的，要刺激生產，其中一個重要的做法是要有資金。現在，國內已發行了公債，吸收外國資本以發展……

林丹：那麼，中國已不再是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了。

程明金：大家都知道：那個怪名堂沒有實際的好處。按照一些國內的經濟學家分析：以中國的情況，如果發出一億元的鈔票就該有六億元的貨物，如果貨物不足這個數目，就會引起通貨膨脹，貨物漲價。先前，爲了提高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除了略略提高基本工資之外各單位還自己巧立名目去增加收入。什麼洗理費囉……以前是沒有的，現在是作爲剃頭，個人清潔之用的；什麼單車修理費囉，每個月三元人民幣；保健費每月十元八塊不等，獎金也十元八塊的，巧立名目，增加收入。但這樣一來，物價馬上就提高了，以前北京賣的黃瓜，每斤一到兩分錢，現在每斤一毛多，漲了十多倍；西紅柿每斤由兩分錢漲到一兩毛錢。魚、肉都大大漲價了。收入表面增加

了些，實際上生活還不以前。發行公債就想把資金回籠，抑制通貨膨脹。同時，由於前幾年的經濟發展效果不好，就進行了調節……

燕鳴：這樣一調節，不會增加失業人口了嗎？

程明金：當然了，就業問題本來就很嚴重。現在推行的節制生育，要二十年後才生效的。目前的年青人一天比一天多，我們那個單位，五十個人就夠了，已安插到100多人，鼓勵上山下鄉，到大西北嗎？誰也不願意去。年青人沒有了出路，就業問題解決不了，犯罪率就立刻提高。嚴刑峻法有什麼用，根本問題解決不了，殺一大批，關一大批只能暫時鎮壓一下，太長期就完全行不通。

燕鳴：那上山下鄉已不搞了嗎？

程明金：上山下鄉本身就沒解決問題。一方面年青人本身不願去，另一方面是農村搞分田到戶，農民怕知青來了分薄了他們的地，減少收入，故此都不肯收。所以，這成了一個很怪的現象：一方面人口分配不出去，另一方面一些企業單位大叫技術人員不夠，老是向政府要人，把一些不懂技術的人塞下去，這些單位當然不肯……

燕鳴：爲了解決就業問題，不是採取了一些措施嗎？

程明金：是的，是准許一些人辦一點私人企業，多少有些效果，但這仍不能太多解決的。而且，國營企業和私人企業之間也有了競爭；國營企業之間也存在競爭。

林丹：政府對這些競爭怎樣處理？

程明金：那就採用了“承包責任制”，例如，一些旅館，就推行了這制度。

林丹：旅館怎麼包呢？

程明金：例如，某旅館有200個床位，上級令他們每天上繳300元，多了你們就可以提高工資。最初，大家很高興，到處想辦法，四處拉客人，服務態度也好了。但是不久又發現了：你們這個月多掙了錢，上級領導又提前了指標，每個月上交漲爲400元；你收入多一點，他又要求上交多一點。搞來搞去，職工得不到好處，只有領導人獲得嘉獎，升了官；職工們一氣，都

不幹了。所以，辦來辦去辦不好。

燕鳴：也有辦得好的嗎？

程明金：有，就是那些老師父，帶幾個徒弟開開食物店之類的。他們又齊心合力，又能搞地方特色的食物，都很受群眾歡迎，很能賺錢。有些人說了：共產黨管農業，搞什麼公社化，搞得一團糟，現在不管了，農業就好多了。這些小企業，如果沒有共產黨人去管，那就好多了。電影演員趙丹臨死前，不也說了這一類的話嗎？（笑聲）

林丹：剛才你所提出的一間工廠之內，車間與車間也得算錢，這大概是農業上的包產到戶運用到工廠裏來了？（笑聲）

程明金：也可以這樣說。在農村推行包產到戶以後，農民的反響普遍良好。農業生產，農民生活都有了提高。但這樣一來，城鎮的工礦企業，工人都希望他們也能來個包產到戶，一些工廠推行了，也獲得一些成績。但是，很快就形成了一般歪風，這裏也想包那裏也要包。有些鐵道局也想分段來包，（笑聲），這怎麼行得通呢？你那一段運轉快了，多拉幾個車皮，另一段不配合，也等於零嘛！事實上，很多東西就不能包：郵局就不能包，學校也不能包。

燕鳴：記得，這就是陳雲的所謂烏籠經濟了。那怕籠子再大，鳥兒仍然在籠子裏，要想經濟達到真正的自由化，你認為用這“包”的方法行嗎？

程明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三十多年，它的經濟體系已經建立起來了，要改變可不是那麼容易。我覺得，可以說它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這一點說，它是已很“完美”了。你看他的什麼“化工部”“石油部”……科委，計委……等等名堂怪多的，互相聯系，也互相制約，要改變已不容易了。同時，中國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對將來無法估計，現在推行的政策，將來何時，怎樣改變也不知道。這便得要進行經濟制度的改革更不容易進行。現在，國內要把大局扭向左、向右兩方面的力量都很大，鄧小平一閉眼，就看看誰先動手的问题了。

燕鳴：你認為，中國如果要改革的話，會

怎樣改革？

程明金：現在，中國要改革，都會考慮到採用西方模式或者蘇聯的模式。而中國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接近程度比跟西方國家的接近程度大得多。所以，傾向於採用蘇聯模式的人比起來多得多，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是一個藤上的兩個瓜。在中國共產黨人的眼光來看：蘇聯不失為一個成功的例子，雖然，蘇聯人民的生活程度比不上西方國家。但蘇聯的軍事力量，科技水平是不錯的，中國共產黨的很多領導人都認為：中國能搞成蘇聯這個樣子就很不錯了。因此，中國傾向於蘇聯的危險性是很大的。

林丹：那麼，老百姓的看法怎麼樣？

程明金：中國老百姓當然是最關心的先是吃和穿的。解放三十多年來，這個問題至今尚沒有解決。他們對西方國家生活的富裕，自由都很向往，但是，中國的領導階層很清楚地知道：蘇聯的領導階級都享有特權，中國的領導階層的人絕不會主動放棄特權的，這也是他們傾向蘇聯的一個重要原因，目前，經濟上放鬆了一下，是因為長期的專制導至了國力不振，但他們永遠不能放棄專制給他們本身帶來的特權，也就是因為他們不放棄特權，他們就利用特權來安排好自已的“皇親國戚”到重要的、條件好的部門和崗位工作，而把其他有能力，有學問的人排擠在外面，沒法發揮他們的所長……。

燕鳴：你自已回國之後，也遇到過這種情況嗎？

程明金：講起來也笑話，在國內，不少共產黨的領導人連碩士，博士那一個學位高都弄不清楚，你說，這些人掌了權，還能妥善安排工作嗎？（笑聲）其次，這些領導都喜歡用他熟悉的人，他不喜歡任用新人，還有一點，就是怕你回來以後，幹得太好了，自已的位置會被你取代了。我也為自己的工作跑過，但很快發現：到頭來，跑來跑去只等於毛遂自薦沒有意思，而且這只能解決我自己個人的問題。

燕鳴：那你在本單位不也能發揮作用嗎？

程明金：你別忘了，要發揮作用，除了你有

技術之外，還得有政治本錢，政治地位也決定了你的工作能力。例如，你要搞一個研究專題，你一般都要有兩三個助手，有一份研究的經費吧。有助手，等於你有了一定的權力，錢，可不容易弄得到的；所以，你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才能辦得到。一般地，你應該是個黨員，要與領導的關係熟悉，有私人的感情，否則，你就困難多多，那白你拼命死幹，只能有小小的成績。我國和外國不同的是：儀器本身不足，大家都等着去使用，經費也不容易申請得到，藥品也不足，你要我怎麼去研究嘛！如果你是一位政治高的人，申請資金、人手，都容易得多；我們不能以某一兩個學者，專家的境遇來說明問題，我剛才提的，都是中國社會的普遍現象。在中國，有技術的人材用不上自己的技術的現象仍很普遍，我們單位也有一些技術人材，因為政治條件不夠而打雜去的。一方面是人材不足，另一方面是浪費了人材。剛才提過的中心實驗室，本來是希望充分使用人材。其實，對中心實驗室的一些技術人員要求也太高了，要他們什麼都懂，事實上是是不可能的，工作做不好又挨風言風語，以為這些技術人員沒本事。結果也影響了他們的積極性，增加他們的思想負擔；另外一些不懂技術而有良好政治地位的人也塞進了中心實驗室，這些現象在全國都很普遍。所以，說到頭來，歸根結底，都是政治的問題。中國大陸的人民沒有講話的權利。如果中國人民有講話的權利，就能對這些現象提出批評，可以減少這些弊病。

燕鳴：現在中國共產黨立刻就要展開「整黨」，你認為有好處嗎？

程明金：我認為這次整黨不會有太多的好處，也不會成功。現在中國共產黨有四千多萬的黨員，有一個試點的單位……

林丹：什麼叫「試點」單位？

程明金：「試點」，就是中國國內的一向做法，即在開展一個運動之初，先在某個單位試一試，做個樣本，以後運動一開展，就以這試點的經驗來擴展這個運動。當時，這個試點單位就是要黨員們都來登記。其實，做什麼手續是很次要的，總的來說，就是要把異己排除出去。

林丹：一般的異己是什麼？

程明金：這次最可能挨整的是文化革命上台的壞頭頭在文化革命期間入黨的，就查清歷史，參加了什麼派別。據說，全國四千多萬黨員，就要整去一千萬，即四分之一。其實，這樣做是不會有什麼好處。以前不久才說過不再搞政治運動，現在又搞起了來，這使黨內外的人都對領導失去信心。我們大家都可以看到，以往的一切政治運動，都給以後帶來了後遺症：什麼退賠啦、平反啦、等等，就是要彌補以前的運動的後遺症。現在，新的運動到來，又會搞出多少後遺症，我們可以拭目以待。要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搞運動是不行的，我認為只有來個制度上的徹底改變，使人民都有說話的權利，才能對領導起監督的作用，人民的才智才會發揮，中國才能趕上世界的先進水平。



嘴的通病
王景峰（安徽）

再致鄧小平

—— 方丹 ——



尊敬的鄧小平主席：

開筆我已為難，是稱呼您「主任」好還是稱呼您「主席」好？「主任」是您在黨內的職稱，「主席」是一個雙稱；您既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主席」；根據中共「滄指揮黨」的歷史，經過三思，我覺得還是應該稱您「主席」為妥，因為只有這個職稱才能真正表示出您在中國大陸的身份、地位、和權力。

不是說笑，八三年從世界政局的形式（而不是形勢）來看好像形成了一股「致信熱」：各種不同的人通過給世界各國有影響力的政治領袖寫信，表明自己的政治要求和希望。轟動世界的莫過於美國女童莎曼泰史密斯給蘇共黨魁安德羅波夫寫的一封信，之後又是蘇俄小童致美國總統里根的一封信，後來又發表了中國民運領袖林希翎致您的一封信，還有很多，不再贅述。我在年初發表在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的《致鄧小平的公開信》（下簡稱《公開信》）就成為「致信熱」中的一個小小的浪花。

不知您老人家是否已看到我致您的公開信？我相信您是應該看到的，因為據大陸新近來港的一位友人說，她的一位朋友親自把我致您的《公開信》（一份影印）送到您的女兒鄧林手中，我想鄧林一定會轉給您。

政治形勢的發展是不以領袖意志而轉移的，領袖的意志可以暫時造成某種「政治形勢」。

但當今的世界任何一國的政治形勢都受世界整個政治形勢的制約。由於「跨國公司」的經濟發展，把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間的距離縮短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結構。任何一國的政治行為不但要保護本國、本民族的經濟利益；而且必須以不損害與它結成「經濟聯盟」的第二國和第三國為前提，資本的國際化，「跨國公司」的國際化，使「勞動階級」也「國際化」了。

我在此不用「無產階級」，而用了一個「勞動階級」。因為根據我在自由世界生活近十年的考查，我發現在當今的先進工業國，根本就不存在「無產階級」，許多勞動者，身兼二職，既擁有房產，或是股東（資方），又出賣勞力（專業技能，知識）；而當今的「勞動階級」多數是有專業知識的人才。工業的飛速發展，已分不出體腦勞動的差別，也分不出複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差別；政府通過稅收，平衡貧富。在西方：不是「鄉下人」往城市鑽，而是城裡人往鄉下跑，分不出城鄉差別……世界趨勢與馬列主義的預言正好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在這種國際背景和世界形勢的前提下再來看中國的政治形勢，看中共大陸的政局就容易冷靜和「擺正」了。

自從我發表致您的公開信後，便想從此「收山」，不再發表關於中共政局的意見；但是我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封信在海外造成極大影響，現已翻成英、法、日、西班牙四種文字，廣為流傳，這是我作夢也沒有想到的。致您的「公開信」發表先後，中共大陸發生了幾件大事：首先是六月四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下簡稱「六屆政協」）接着在六月六日召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簡稱「六屆人大」）。兩會開完本打算在七月份召開「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下簡稱「二中全會」）但是迫於形勢無法召開，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從七月推到九月才由胡耀邦總書記向日本記者透露出「二中全會」的召開日期。但後來我得到的「情報」，說「二中全會」在十月份也開不成又延期，而因胡耀邦事先已透露出開會日期，如果在十月開不成會，等於把黨內不可調和的矛盾暴露出去；所以「二中全會」完全在保密的情況下，只用兩天時間就閃電閉幕了，「新華社」在發佈「二中全會」召開的消息同時也就是大會閉幕的消息時。全世界為

之愕然！

「六屆政協」和「六屆人大」結束後就有不少報刊約我論「兩會」以來的大陸政局，但被我推辭了。因為這是兩個毫無意義的大會，是一種愚弄人民的政治擺設，凡在大陸長期生活過的人心裡都明白，「政協」和「人大」是個什麼東西。在大陸，決定國家和人民命運的是中共，而不是「政協」「人大」；只要需要，中共在任何政治藉口下，可以一夜廢除「憲法」和「國家主席」，「政協」和「人大」形同虛設。所以我對「六屆政協」，和「六屆人大」無意置評，因為「兩會」向世界發出的「音響」和「銀幕圖像」都是不真實的，是被歪曲的香港和海外許多「政評家」出於一片好意對「兩會」發表了不少宏論，已被中共的政治發展擊得粉碎，再次損傷了他們的一片「愛國」之心。

半年多來的中國政局，震盪而嚴密，所以，使我遲遲不敢下筆。直到中共出版您的《文選》，直到「二中全會」召開並公佈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下簡稱「決定」）之後我才看清大陸政治的路向和滾滾的暗流，才敢再寫一信，向您「上書」，希望您能正確把握大陸政局，不要再走老毛的死路，搞得大陸「天怒人變」、「怨聲載道」。

您不是太宗我不是魏徵，魏徵是什麼人？打個比方，魏徵就是大唐立國時期的「林彪死黨」，唐太宗可以重用一個千方百計出謀劃策要暗害他的「林彪死黨」，說明你和中共的一些政治領袖不如一個封建帝王的胸襟和政治海量，文章寫到這裡，我不得不對天長嘆：人類歷史，人類的文化，到底是在前進？還是在倒退！

政治形勢的發展殘酷無情。我在給您寫「公開信」時大陸人民已對您很不滿，從尊稱您「鄧大人」改口「鄧矮子」；目前從大陸出來的人說：人民群眾在暗地裡已叫您「獨夫民賊」了！我聽到這種仇恨的語言，想起世界上許多政治家的遭遇，我真為您難過。政治是不講感情的，政治只講社會效果，但是政治難道是沒有人性的嗎？

我既無魏徵的膽識，又無「林四死黨」的野心；既不是「紅衛兵」，又不是「造反派」；目前我對共產主義已毫無信仰，但是，我尚存一息「愛國」之心，我的信是用血寫的，希望您能看到。

「君非君，臣非臣」
大陸政局，雜亂無章，災難紛呈。一會兒是殺

女嬰，一會兒又是殺罪犯；剛剛在叫水荒突然就開水災；一會擾香港，一會兒又在向美國打台灣牌；剛剛宣判了美特羅羅乎，指責帝國主義要顛覆大陸，突然自己的陰陽特務也在巴黎露了相；胡耀事件了，又發生六勇士專機投奔怒海，天災人禍，眼花撩亂。

在一片混亂中勉強召開了六屆政協和六屆人大給世人作出一個安定團結的假象，但是兩會很快就被二中全会擊了個粉碎。在雜亂如麻的大陸政局中怎樣才能抓住要領，縷出一個頭緒來呢？這就必須從中共二中全会入手。而二中全会的核心又是以您為首，所以，要想洞悉中共大陸的政治路向，就必須從您的文選入手了。在未評《鄧選》前，余先從中共中央的架構寫起。

在公開信中，我已呼叫您注意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天理；並指出：大陸幹部在您的胡耀邦之中不知所從的痛苦心態，連人民日報也不得不替您不在其位也謀其政的行為辯護。但是，這樣一來在大陸就形成了兩個中央，一個是以您為首的不在其位也謀其政的顧問中央；一個是以胡耀邦為首的，在其位謀其政的書記處中央；實際上還有一個以陳雲為首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中共表面上看是一個中央，實際上是三個中央，在三個中央中，權傾中央的就是以您為代表的顧問中央；唯一可以與您較量的，權力幾乎不相上下的是以陳雲為首的檢查中央；胡耀邦表面上是中共的黨魁，是總書記，實際上他在黨內的威信和權力既不可與您較量，也不可與陳雲較量，胡耀邦夾在您的陳雲之間，如果說胡耀邦在您的陳雲兩大派中更傾向和投靠您的話，那麼趙紫陽正好相反，他在您的陳雲的權力抗衡中選擇了陳雲。

六屆政協和六屆人大後，又產生出一個國家主席；但是，在大陸人民和全世界新聞界都明白，李先念這個國家主席實際上毫無權力，只是一個傀儡而已：原先，國家主席是要兼共和國軍委主席的，但這一次您把它們分開，國家主席你不當，卻死死抓住軍權不放，您把中共中央軍委的大權和共和國軍委的大權都搶到手，不許任何人染指軍權，說明您決心要走老毛的舊路，表面上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槍指揮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句話不管放到什麼國家，什麼民族都是一條永恒的真理。

我在公開信中已指出中國政局從華國鋒的輔弼坐政轉化到胡耀邦的垂簾聽政時代，總之，無論是輔弼還是垂簾，都是傀儡政治，都是極不正常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局面；這種政治是不能順天應人的，是違反天地自然的。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家無二父，這就是順天應人；反之，逆天叛道，天下大亂，這不但是中國，也是世界各國歷史早已證明了一條定律，不管是什麼國家，什麼民族，只要出現國有二主的時代，一定是大亂的先兆。中國古代歷史發展到三國時代已總結出歷代治國安邦的經驗，這些經驗都集中反應在古典小說《三國演義》之中：我在公開信中已引過其中的幾句，如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現在我再引用其中一句叫：中

帝非帝，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這是一首民謠後來被收進中國預言巨著《推背圖》之中，改成君非君、臣非臣，始艱危。我並非一個迷信的人，我相信，無論是編民謠的人還是著《推背圖》的人，都想千方百計把治國安邦和如何才能國泰民安的道理告訴歷代統治者，警喻統治者不要重蹈覆轍。

中國大陸政局不幸走入君非君、臣非臣的政治格局中，您表面上看是臣，實際上是君；胡耀邦、李先念表面上是君，實際上是臣。您變成了當代的董卓、曹操。然歷史告訴我們，一旦出現君非君、臣非臣的政局，中國必大亂，更加不幸的是，這種君非君、臣非臣的政局又適逢甲子年；這又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最忌的一年：莫要忘：黃天當立、歲在甲子的教訓，也莫要忘北伐發生在甲子年；我不是利用封建迷信恐嚇您，但是歷史上已經發生過，並一再證明的經驗，是不能不加以考慮的。好漢過不了甲子年。願我引用的話不要成爲事實，因爲大亂只能給百姓帶來災難。

二中全会後以決定形式把君非君、臣非臣的政治格局規定下來，爲未來的動亂增加了陰影。

「三中全会」是禍源

無論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簡稱《決議》）還是二中全会的決定都一再宣稱肯定中共十一屆二中全会以來，我們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路線，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連您自己在《鄧選》中也再肯定二中全会，並發展到以三中全会劃綫、定調、培養接班人；您甚至在起草《決議》時出謀劃策指出：三中全会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見《鄧選》第272頁）對三中全会給以極高的評價；但是無論是您還是中共的任何《決議》、決定，還是其它首領；越是要肯定三中全会，等於越在否定自己。不知您自己是否覺察到這個嚴酷的現實沒有？您要利用三中全会，還是您被別人利用了？總之三中全会不但是今後人們清算您的一個理論根據。而且成爲您百年之後大亂的一個禍源，謂予不信，請看下列事實：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下簡稱公報）共有五大章節，但是中心思想是：①肯定華國鋒的正確領導。②爲鄧小平正式翻案。③爲一大批中共委員翻案。④成立了中紀委。⑤強調民主法制。⑥制定了七九、八〇年兩年的國民經濟規劃。⑦以法律形式保護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強調：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爲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⑧肯定外交工作。

三中全会的公報莊嚴地寫着：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決策。華國鋒同志在會上着重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他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全會完全同意並高度評價華國鋒同志的提議，認爲這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誌。

華國鋒同志關於「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和「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的號召，已深入人心。……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爲首的黨中央周圍，爲根本改變我國的落後面貌，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

三中全会是在華國鋒主持、領導下召開的，不管輔弼的是何人，三中全会的公報以文字形式肯定了華國鋒的政績，但是不知何因您在八〇年底突然把華國鋒搞下去，其罪名是左了、個人崇拜和冒進。你作爲黨中央副主席既然在三中全會上舉手通過了公報，爲何後來又把制定正確路線和主持三中全会的人趕下台，另換一個傀儡胡耀邦呢？您怎麼能一方面肯定三中全会，一方面又否定主持並制定了三中全会路線的黨主席？

三中全会規定的農村政策，實際上已被您的責任田否定了。三級所有，隊爲基礎名存實亡。責任田實際上是分田到戶，這雖然否定了三中全会的公報，但這個政策是符合大陸農民心願的，實際上是耕者有其田，這對調動農民的生活積極性起了很大作用，使勤者富，懶者窮，這才是按勞得酬；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但是，中國農村有一個很大的特色，也算一個國情吧，就是自然村多依姓氏、宗族發展而成，在過去早就在宗族文化的形成中，帶有很強的集體觀念，比如：修宗堂、修橋、築路、都是族人的義務勞動，而且在族內向有以富濟貧的傳統，宗族村社有封建、黑暗的一面，但也有光明面。所以，公社化之前，農村表面上是共黨領導，實際上還是以姓氏、宗族爲領導的自然經濟。合作化，初級社並未破壞這種人際的和協關係。農民以姓氏、宗族自由結合起來，搞集體生產，推選社長（實際上是德高望重的族長）實行民主辦社，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很高，但後來中共越來越左，從自願入社發展到強迫入社，初級社還未鞏固就搞高級社，高級社剛鞏固起來，就一傢伙吃飯不要錢搞起人民公社，破壞農民以姓氏、宗族自願結合的初級社、破壞了人際關係、破壞了祖祖輩輩形成的農村文化。農民的自私在藐視公平的生產關係中惡性膨脹，農民普遍喪失生產積極性，農民在土地上創造的價值僅夠維持自己最低的生活水準。

但是，山區的自然村，不管中共法力有多大，終不能破壞其姓氏、宗族的生產連結。偏僻落後的山區在中共的苛政之下反而比較容易得到喘息。山區農民表面上不得不打起公社的旗幟，實際上在隊爲基礎的分配原則下，又恢復了以姓氏和宗族爲核心的生產關係，退到初級社階段，農民在這種情況下又產生了生產積極性。這是我在大陸參加三、四清從山東到江西總結出來的經驗。我參觀過山東黃縣的下家生產隊，是個山區，以姓氏、宗族抱成一團，表面上是集體，實際上是集體生產，不過凝聚這個集體的力不是什麼共產主義（雖然他們嘴裡也這麼對外講！）而是姓氏和宗族的聚心力，他們開山、引水、整石造田，數十年如一日。我在一九八二年入獄時，湊巧在王府井碰到一何黃縣幹部，我

問他下丁家的情况，他告訴我，下丁家農民L黨性很高至今不願倒退搞分到戶，因為，他們已嘗到集體生產的甜頭，要大幹社會主義哩！L言下之意，您的L分到戶——責任田變成了L封建倒退L。我聽了只是笑，因為和我講這話的黃縣幹部其實身在基層，並不了解農民。我如果不是三次L四清L，也搞不清農村的事。黃縣幹部那裡知道，農民也學會了L打上紅旗保自己L的一套政治把戲，這都是中共反反覆覆的政策把農民逼聰明了。下丁家的農民抱成一團，靠姓氏宗族的力量創出富裕道路。據說他們的年生活水準早就超過了一千美元。家家存款都在五千元人民幣以上，山區不實現L水利化L，而且用上了電！自己造了發電廠！

L責任田L顯然否定了L三中全会L，但責任田又是一個進步。然而責任田的發展究竟有個限度，靠責任田要想使農民普遍富裕起來是根本不可能的。日本、台灣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實際上是搞農會（自己組織）實行聯產生產，把生產和商業的供求掛起鉤來國家對參加這種帶有合作社農業生產的人在遇到天災時進行補貼，保證農民的基本利益。這是農村推行和機械化、水利化、電器化、化學化（天然、化肥等）的一個前題；大陸責任田，發展到一定階段發展不下去時，會不會有人跳出來拿L三中全会L的L公報L對您進行清算？這都成了一個L人心怕變L的因素。因為您和中共一方面在肯定L三中全会L，一方面又在破壞和否定L三中全会L，幹部和農民憂心重重。L責任田L從目前來講是對的，從長遠來講又大有問題，但是，責任田發展不下去時本應鼓勵農民按照中國農村實際，任由農民按姓氏、宗族組織L農會L也好搞L合作組L、L合作社L也好，不再用黨的力量干與農民的生產組合。我想這才是一條出路，要儘防有人利用L三中全会L否定責任田，走回頭路。

文章寫到這裏，連我自己也不知是該肯定L三中全会L還是應該否定L三中全会L了！鄧主席，這個矛盾，這個禍源怎麼解決呢？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對農民的政策正確與否決定着國家的根本命運，毛澤東的失敗，就是忽視了農民的要求利益，您現在之所以可以在中國大陸呼風喚雨，要殺就殺，要抓就抓，最根本的一條是您的L責任田L得到農民擁護，農民從中得到實際的利益，萬一責任田發展到一定時候發展不下去了，農民的怨氣又會從四面八方襲來。農民不但想富，並且怕富，怕變，因為農民對您和對中共信心不大，怕政策變，農民已經發現：責任田雖好，但與L三中全会L的公報不符，現在，您一方面在搞責任田，一方面又在肯定L三中全会L，人民不知您要幹什麼，要麼您否定L三中全会L，要麼您否定責任田，因為L三中全会L是肯定L責任田L的，農民夾在L三中全会L和責任田的矛盾對立中，痛苦難名；L三中全会L的L公報L像幽靈一樣每時每刻困擾着農民，使農民進退維谷。

此外，L三中全会L經過L討論L，L同意L的七九、八〇年L國民經濟計劃安排L為何在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L中央工作會議L上又被說成是L左L的錯誤呢？如果這個計劃在L貫徹L中發現L左L了，是完全應當糾正的，因為不管是什麼社會制度，任何一國的經濟政策——但發現與社會實際脫節，都必須立即改正否則整個國家的經濟要崩

潰。修改計劃，修改政策是很正常的事情，這也就叫做L實事求是L吧！但是，這次L中央工作會議L本身好像是一個陰謀大會，在會上搞了突然襲擊，雞蛋裡挑石頭，嫁禍於人，等於在反L左L旗幟下，把華國鋒的大權奪走了。華的主要罪狀是經濟L冒進L，但是：L三中全会L經L討論L，L同意L的七九、八〇年經濟發展規劃，是每一個中央委員都有責任的；而貴為副主席的您以及在L三中全会L進入L政治局L的胡耀邦更是責任重大，把錯誤推在華國鋒一人身上，合理嗎？實事求是嗎？讓人心服嗎？奇怪的是，制定L三中全会L經濟計劃的L真正冒進人物L余秋里不但沒有罷官，反而青雲直上，步步高升，現在又穿上軍裝掌握L總政L大權。在大陸高層已傳出這樣的L內幕消息L說余秋里在L三中全会L提出的冒進計劃是在您的暗中設計下搞出來的，目的就是要L誘導華國鋒犯錯誤L，如果黑幕果然如此的話，那麼這就證明，在中央確實有一個以您為首的L小艦隊L；證明江青對您的L政治經驗L不但不是詬謫，反而變成L現實L了，誰都知道余秋里早在L長征L時已與您結成死黨毛澤東久攻L大慶L不克時，就是您L點將L、把余點成L總指揮L的。從此余就成了L石油幫L的L幫主L，靠L大慶L走入L中南海L，成為您在中央的一員L驍將L；目前，由余秋里掌握L三軍L總政大權——人事大權，您坐鎮L三軍L軍委主席，當然是L穩坐釣魚台L了。但是，由於余秋里在L文革L中的劣跡——他是L中央L的L造反派L，他在中央的威信並不高，而且樹敵過多，像李先念、葉劍英這些人在L文革L的L中南海L中都受過余秋里的批鬥，您一面要打擊L紅衛兵L小將、打擊L造反派L，一面又重用中央內部的L紅衛兵L、L造反派L，人民群眾服嗎？

L三中全会L規定的L經濟計劃L被您否定，批判了。L三中全会L法定的農村L三級所有L，除為基礎的經濟被您的L責任田L否定了！L三中全会L對華國鋒的肯定被您用胡耀邦取而代之，L三中全会L的路線名存實亡，您既然認為L三中全会L的路線錯了，您本可堂堂正正提出來，為什麼可以採取這種表面上肯定、實際上否定、陽奉陰違的作法呢？您如果繼續肯定L三中全会L是正確的話，那麼等於在否定您目前所作所為是錯誤的，是反L三中全会L路綫的您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自相矛盾的決策？這就不得不使人想到：您也許覺得現在自己在中央提出否定L三中全会L的議案引起中央的分裂，所以只能採用這種兩面手法。這也就等於告訴世人，您在中央的權力並不像人們想的那麼大，您不能，實際上也沒有毛澤東那麼大的權力，您在中央的阻力很大，所以要借L整黨L奪權，掃清阻力。

是L三中全会L的路綫最後否定你還是你在謝世前正式否定L三中全会L，那就讓歷史作結論吧！

弄巧成拙

《鄧選》成為全世界研究中共問題的一個大熱門，因為它是人門研究和預測中共今後路向，並會引發什麼社會問題的一個思想依據。

《鄧選》已被中共L二中全会L以L決定L形式規定為中共的L整黨L教材，也就是說《鄧選》成為整黨的L指導思想L，中共要把黨、黨員整到

《鄧選》的水平和基礎上，《鄧選》就成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代名詞；就像過去《毛選》取代馬列主義地位一樣；《鄧選》在中共取代了毛澤東思想，取代了馬列主義。這就再一次證明了我在八年前講述的一句話：L在中共，誰有權，誰掌握槍桿子，誰就接近了馬列上帝；誰有槍桿子，誰就有權解釋馬列，誰就是馬列主義的象徵，就是正宗；馬列主義永遠掌握在黨內鬪爭的勝利者手中。黨內的是非之爭、主義之爭，永遠由槍桿子裁定。L我批評毛澤東的話，不幸又被您的政權再次證明，這既是我的光榮，（因為說明我有眼光），也是我的痛苦；因為我不希望我的話一再被中共的社會現實證明。

《鄧選》出版後一直成為政論家們的讀物，關於《鄧選》的研究和評論翻天蓋地，我因為最近才買到您的書，所以未能趕上評《鄧選》的浪潮。我看了世界上一流政評家評《鄧選》的文章，從中學到很多東西。本來也不打算再寫什麼了，但L二中全会L後，我決定非把我的L學習心得L寫出來不可，因為，我覺得，《鄧選》暴露出來的問題，不但您自己疏忽了，而且許多人至今未引起注意。鑒於《鄧選》決定着大陸人民今後命運這個大事，我覺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來，供您參考。

評《鄧選》可以寫一本十來萬字的書，但是我只能在此粗線條地提出一些問題。

首先要證明的一件事，就是：《鄧選》的出版是您個人的主意還是由您身邊的L奴才提出？我得到的L情報L說：這是您的L奴才所為，您並不打算過早出《鄧選》，但是您的近臣們非逼您出不可。所以，您是被迫出版自己的講話文稿的。如果我得到的L情報L屬實的話：那麼您就被近臣利用了。

出版《鄧選》，從黨和L國家機密L的角度來說，等於是一種嚴重的洩密行為。因為世上所有政治成熟的國家，都不會、也不允許將自己還在行使國家權力的L總統L講話，印出書來發行。這很容易讓敵國掌握一個國家、一個政權、一個政黨的L最高決策路向L。美國總統只有離任後才能出版L回憶錄L，目的就是：他卸任後，已成為一個歷史人物，他過去在任內的所作所為已成歷史，只要不涉及國防機密，他的言論已不再影響政府。

毛澤東出版《毛著》都是出版四九年前的《講話》，（多是在中共中央和政治局的L講話L），中共在大陸建政後的L內部講話L，直到七五年我到香港前還聽說他反對康生L出版L《毛選》第五冊是在他死後由華國鋒和您出版的。不管毛澤東有多狂，但在出版自己的L內部講話L方面，他還是一個相當謹慎和清醒的政治家；我曾不止一次地聽接近他的人和他的親戚王曼非講：毛澤東認為四九年之後的L講話L、L文章L都在L實踐L之中，有許多錯誤的東西還要通過實踐檢驗、反覆檢驗，不成熟的東西拿出去——害群眾，二害黨，三害自己；毛說：L一印成書就不好改來改去了，出書雖然不是拍電影，一公映就不能補頭了。但是領導人出書要特別小心。L

您在出版自己的L內部講話L這一點上，遠不如毛，您把最近一兩年的L講話L公佈出來，等於把自己交給了敵人，害群眾、害黨、也害您自己，在這點上，您不但不如毛也遠不如資產階級的美國

總統；當然，若站在反共的立場上來看《鄧選》，那就是求之不得的寶物，因為，不但您把自已，也把黨中央的底牌給暴露了。

您的近臣們說的當然很有理：黨已進入了新時期；進入新時期就需要新思想，過去的一套都舊了，甚至連三中全會規定的老毛《論十大關係》的路線也不能堅持了！L轉移時期是以您的思想為轉移的，所以，您的思想不但中央已經瞭解，而且有必要印成書，讓全黨瞭解，全國人民瞭解，否則黨和人民很難瞭解中央，黨和人民需要新思想，而這就成為出版《鄧選》的理由！

果真如此嗎？也許您是這麼想的，但是您的近臣和中共的幹部們又怎麼想呢？從大陸出來的朋友告訴我：中共的高級幹部拿到《鄧選》後後發狂，歡喜若狂，他們在暗地里對知已說：L這下就不怕矮子攪辮子了，我們可以放手大干了！否則，口說無憑，現在有了《鄧選》就有了依據，就是他死了，我們跟着他走，最大不過是路線錯誤，《鄧選》就是我們今後向群眾交待的依據。

我想這也許是（您身邊那些L忠臣們）迫使您出版《鄧選》的真實原因。他們目前可以放手跟着您大幹了！他們已利用出版《鄧選》為自已準備了後路：因為不管今後什麼人上台，什麼派上台，什麼主義執政，您現在身邊的左右都會拿《鄧選》出來作擋箭牌，說明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根據您的指示辦事，L罪魁禍首是您，而他們只是L協從而已。因為他們是黨員，黨員必須聽黨的話，黨又必須聽您的話嗎！

反正現在全世界都進入L賭博時代，中共也不例外，昨天跟着老毛賭的人目前把老毛都給賭光了；坐牢的坐牢，殺頭的殺頭，誰能保證目前跟着您賭的人今後的下場就一定比鬍鬚老毛的賭家好呢？就一定會變成L大贏家呢？

是您利用《鄧選》要鞏固已在黨內的權力還是您的忠臣們要利用《鄧選》為自已開脫，準備後路呢？

縱觀《鄧選》

《鄧選》共收入鄧小平的重要講話、談話四十七篇。多數是未公開發表過的，這就成為我們研究和透視中共在過去幾年來已發生的黨內鬥爭和今後政治路向的一個「電眼」。許多迷霧被《鄧選》解開，許多L內幕L暴露出來。

四十七篇講話是從一九七五年開始收編的。七五年之前的講話L檢討L都未收進來。比如您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L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L以及一九七五年初二次復出前寫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檢討L以及您在第三次復出前於一九七七年寫給黨中央和華國鋒的信，還有許多未公開的講話，這對研究您的人來說顯然是一個損失。編者雖然故意把以上幾篇重要著作攔截了，但是，四十七篇講話已完全可以反映出您的基本形象。四十七篇文章表面上看好像互不相關，但是，我這個編輯出身的人還是可以從中纏出一個頭緒來的。

四十七篇共分四個階段四個部分，第一個階段收錄了您在二次復出之後的八篇講話。主要反映了您又要工作，又被L四人幫L困擾的險境，八篇講話的基本核心是L整頓L二字，你大膽地抓了L知識分子L問題，但也反映出，您在老毛還健在的情況

下，基本L調子L也是L左L的。您與L四人幫L的矛盾是L左L與極左L的矛盾，並不是左與L左L的矛盾。所以第一階段的L八篇講話L按照左的觀點來說依然是L左L的，因此只可批判地吸收，而且都已過時，根本不適合當今大陸的社會實際。

《鄧選》第二部分是打倒L四人幫L之後，到L三中全會L共收入十四篇講話。這是您痛苦掙扎的時期，您一方面已部分復職，但沒有取得中央用L文件形式L平反的憑據。您一面參加黨和政府工作，一面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L凡是派L鬥。可以看出，您是小心翼翼地，陽謀、陰謀一齊使用，您的基本調子是要強調L民主L並利用L民主L，掀起全國性的L民主運動L，想借群眾之手在中央為取得徹底平反、復職、復位、復權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文章忠實反映，並紀錄了您在此時的行為。

第三部分是從L三中全會L的講話開始到L十一屆六中全會講話L為止，共收入十六篇講話，這個時期，您已取得黨中央徹底平反的L文憑L。您雖然不是黨主席，但已權傾中央，您與華的鬥爭，使華和L輔弼派L節節敗退，您通過兩張牌就把華基本上打倒，這兩張牌一張是打倒「凡是派」，一張是L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L。在《鄧選》第三部分可以看出您呼風喚雨的架勢。您的基調已從L放L漸漸要L收L了，因為L放L是要利用L放L打人，把大權奪到手後，再鼓吹L放L就等於自已和自已搗亂，自已和自已過不去了；所以您提出要L堅持四項基本原則L，這就是您的拿手好戲，要利用L四項原則L來L收L。但是，您真正把華國鋒打倒，扶出胡耀邦還是利用了經濟問題。在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L中央工作會議L上早已把華搞倒了。華在這次會後已失權。但您與華的最後攤牌是由於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關於這方面的詳細情況我還不甚清楚，但是從《鄧選》中已可看出這才是您與華派最後決裂的根源，什麼L兩個凡是L，L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L以及經濟L冒進L都成了次要問題，我現在急需要弄清的：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華國鋒和華派到底提出過什麼意見？拋出過什麼文字方案？鄧小平如果自認L真理L在手的話，何不將華國鋒的L錯誤意見L附在你的L意見L之後，以供讀者判定是非呢？

在第四部分，《鄧選》共收入九篇講話。這是在L六中全會L之後到L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L為止。實際上L六中全會L就是L十二大L；後來召開的L十二大L不過是對L六中全會L的追認；等於L走過場L罷了。

您在這個歷史時期，正式選中傀儡，在大陸推行L垂簾聽政L的政治，大陸從L輔弼聽政L到L垂簾聽政L都是一種反常的L君非君、臣非臣L政局，您在中共其它派子的夾擊中，要鞏固已到手的權力，不但要L收L，而且開始抓L思想戰線L工作，通過批《苦戀》向作家、文藝家們L拋石頭L了。你從被整的地位發展到整人的地位，你在重蹈毛澤東的老路。

「整」字當頭

《鄧選》最大的一個特色是從頭至尾貫穿了一個

L整L字。《鄧選》的從總的方面來說，第一篇文就是《軍隊要整頓》。第四篇是《加強黨的領導，整頓黨的作風》。第五篇又是L整軍L提出《軍隊整頓的任務》。第六篇是《關於國防工業的整頓》。第八篇乾脆來了個《各方面都要整頓》——以上還是在L四人幫L時期，上有太上皇毛澤東，下有L太后黨L，在這時，您已經不畏風險要整這，要整那，從整軍、整經濟、整鐵路、整鋼鐵、一直發展到《各方面都要整》，把L四人幫L整的狗急跳了牆喊出要和您L對着幹L，老娘拼了這條命，也要和你這個專門整人的矮子鬥L！結果，把您踹倒，把您的L整頓狂L批了個稀巴爛，但是您從此就得了整人的精神病。L你不讓我整，我就偏要整L，打倒L四人幫L後，你大整了一頓L四人幫L；這還不夠，又反過來整L紅衛兵L，整L造反派L，最後發展到整黨、整軍，把大陸整個底朝天。《鄧選》忠實地紀錄了你L整L字當頭的歷史。

L整L不但是《鄧選》最大的特色，而且是您的一個基本思想，這與您在黨內一直從事整人的工作有關！L總書記L的工作是什麼工作？就是專門整黨員的工作。所以L整L是您的一個L人生哲學L，您靠L整L起家，靠L整L吃飯，離了L整L不能生存，你什麼都想整，什麼都要整，不整不舒服，不整手癢，您得了L整L字病，變成了L整L字狂。這是《鄧選》導制整黨的一個根源！你必把大陸整得L天下大亂L！

《鄧選》的第二大特色從L書L的角度來說。是L對比L強烈。L對比L就把你的畫皮剝下來了，這是編輯的L功夫L。從內容來說，您今天的講話否定昨天的講話，在黨內的講話否定在黨外的講話，背地的講話否定公開的講話，對內講話否定對外講話，……。編者用你自已的文章揭露你自已，用你自已否定自已，這就是《鄧選》的又一大特色了。

《鄧選》洋洋數十萬言，其實可歸納出如下幾個核心問題，也就是您最關心的幾個問題。①反派性，抓團結。②L知識分子L問題。③L林彪L四人幫L問題。④L整軍L。⑤L接班人L問題——接什麼班？什麼人接什麼人班？——靠什麼L接班L？您實際上要培植自家的L接班人L；當然，您和老毛一樣，打着黨和國家，無產階級的招牌選L接班人L，但選來選去都是首先要選擁護您的人，說實話，如果真是為黨，為國家不是為自已而選L接班人L的話，理應從L紅衛兵L、L造反派L中選一批人，在他們之中不乏精英，他們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他們中也許有人反對您，但他們確堅定的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願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L文革L中我險被L紅衛兵L打死，我們全家遭到L紅衛兵L和L造反派L的迫害，我親愛的母親就是死於L造反派L的酷刑，我並不認為：所有的L造反派L都不好，目前共產黨不是也清查出許多大貪官、大色狼、大兇手嗎？共產黨裡都產生出這麼多壞蛋，要求L造反派L和L紅衛兵L不出壞蛋可能嗎？並且把L造反派L、L紅衛兵L中少數敗類，少數壞蛋的罪行誇大成整個L紅衛兵L和L造反派L的罪行，似乎也不公平，似乎又重複了中共的L殘酷鬥爭，無情打擊L。

不打自招的反黨自供

《鄧選》要探討的方面很多，我只能抓出一些我認為最重要的部分進行分析。這樣就是在「縱觀」了一番之後，抓出幾個大問題向您討教了。

過去，我一直認為您是一位襟懷坦蕩的政治家，但是我錯了！您近年來的所作所為，使我大失所望。大陸人民把您罵作「偽君子」、「陰謀家」，我真是難過極了！因為過去我曾用最美、最純潔的詞贊美過您。

我不想用「陰謀家」這種字眼來說明我讀了《鄧選》後的感受。但是我可以毫不隱瞞自己的感情對您說：《鄧選》是一部不打自招的「反黨自供」。這種悲劇，使我想起江青。江青在大權到手後，情不自禁地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在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就暴露出她在一九六五年背着黨中央軍到上海搞反黨串連的黑幕——世上許多「內幕」都是由初造「內幕」的人自己揭出來，叫做「忘乎所以」吧——江青說：「真正解決戰鬥的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評上海漏網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承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著重點係筆者所標）對誰保密？對中央保密。但是，您剛審完江青。您就犯了與江青同樣性質的錯誤。暴露出您也是個善搞陰謀的人，我的根據是：您在中共「三中全會」前是一個人，在「三中全會」後又變了一個人。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您在中央奪了華國鋒大權之後又變了一個人，您的「講話」畫出了您在各個階段的形象。

但是最能揭露您自己面目的一篇「講話」就是您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廿四日和「兩位中央同志」講的《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見《鄧選》第三十五頁。）你講了許多道理，我基本上同意，但是，仔細一想，不知您這篇文章是在什麼場合講的，是在黨中央？中央工作會議？擴大會議？還是在政局講的？因為這實際上是一篇帶有指導思想、綱領性的文件，文字不多，但是意義重大，在《鄧選》中這是唯一一篇記述了您與「凡是派」鬥爭始末的文章。成爲您與華國鋒鬥爭的起點：經我仔細查找，才在《鄧選》第三十五頁找到一行「注」，這一個注太重要了，完全把您的陰謀暴露出來，而且像一把鑰匙打開了我讀《鄧選》的大門。從這個「注」引導我在《鄧選》中找出許多鄧小平反對鄧小平的言論：「注」寫道：這篇講話是鄧小平同志同中央兩位同志談話的一部分。還不是全文！這就使人警覺起來，和您談話的「中央兩位同志」是誰？這兩人目前在中共的政治地位如何？顯然：「注」中所提示的「中央兩位同志」就是您的「死黨」這兩位中央同志，在聽了您的這席講話後在中央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是在中央會議上公開講、公開活動？還是背着中央在背地裡講、在背地裡活動？這兩位「中央同志」，您和他們講話的時候，是否已是「中央同志」？這就成爲考查您的這篇講話，是否是一種明謀反黨活動的「試金石」！

此外，回過頭來看您的這篇講話是在什麼歷史背景下出籠的吧！

「『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這篇文章是您在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背着黨中央，

在屋裡「秘密召見」中央兩位同志「講出來的。當時以華國鋒爲首的「輔強中央」還未給您平反。中共一方面緊張批「四人幫」一方面還要應付因反「四人幫」而掀起的反共高潮，北京群眾利用「紀念四·五」在天安門重演了「花園革命」；這一次，文章作在「擁鄧反華」之上，群眾利用「紀念」壓中央；要您出來工作，群眾借放映電影「甲午海戰」之機把您喚作「鄧大人」。您看到了「民意」，在這種背景之下您腰桿硬起來，利用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提出的「兩個凡是」之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要挾中央，您在「秘密召見中央兩位同志」的談話中公然反對黨中央的領導，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爲我平反的問題。」顯然，您把「兩個凡是」作爲中央爲自己徹底平反，復職的「攔路虎」。你的意見很好，也很對，但是爲什麼不敢堂堂正正在中央會議上講出？或者因爲未復職還不能在中央講話，但您完全可以用一個黨員的名義給中央寫信表明您的政治態度！因爲毛澤東雖然罷了您的官，但毛並未開除您的黨籍嘛！您爲什麼要搞這種非組織活動？這與「四人幫」反黨、反中央的陰謀活動有何不同？試問，在您大權獨攬的今天，倘若發現類似您召見「中央兩位同志」的活動，您會不會把人家逮捕起來，宣佈成立「反黨集團」呢？這使人想起您在《鄧選》第257頁中的另一段話：您把高崗找您串連反對劉少奇的行爲當作是反黨陰謀，有野心。但高崗反對的不是「黨主席」，高崗反對的只是與自己在黨內地位相同的副主席；您在背地和「中央兩位同志」反對的確是「黨主席」；「反黨主席」不算陰謀，反黨的副主席反而變成「反黨陰謀集團」，而且不能翻案，公平嗎？合理嗎？我懷疑您目前是否已經老了？否則，爲什麼會把自己的陰謀活動也在《鄧選》中給您披露出來了。我懷疑您是否校對過自己的著作？我甚至懷疑您是否看過《鄧選》？否則怎麼會出現《鄧選》揭露鄧小平陰謀的事實！

您和「中央兩位同志」背着中央反黨主席的行爲，按照中共歷來黨內鬥爭的範例應該定什麼性？是反黨？非組織活動？還是宗派小集團活動？還是「陰謀策劃」？

這種「不打自招」，《鄧選》揭露、反對鄧小平的地方實在舉不勝舉，比如：人們一直以爲《毛選》五卷是華國鋒在「輔強派」的縱容之下爲了用《毛選》壓您和壓中央一批幹部不給平反、不許復職，那裡知道，您也是一個積極建議出版《毛選》五卷的人（見《鄧選》第四十頁），當我在《鄧選》中看到您說：「我建議，除了做好毛澤東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論工作的同志，要花相當多的功夫，從各個領域闡明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我立即感到，中共把華國鋒出版《毛選》五卷說成是「搞個人崇拜」是欠公平的，如果說出版《毛五》有什麼錯誤的話，那麼您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過去，人們一直以爲此《苦戀》是華國鋒等軍人「左」派搞的，但看了《鄧選》後才知道您是完全支持「總政」批《苦戀》的。不但支持批《苦戀》，而且批了《太陽和人》，批了新疆烏魯木齊市文聯籌備組負責人，您大發雷霆說：「有許多話大大

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您至今認爲「反右派」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的錯誤而已。否認整個運動是「挖出洞的陽謀」——而這是毛澤東自己講的。不管是陰謀也好，陽謀也好，其目的是「害人」，以「害人」爲目的的運動不是錯誤而只是「擴大化」嗎？過去，我和許多人都以爲阻擋「反右」徹底平反的可能是華國鋒、章國清等人，現在看了《鄧選》才恍然大悟，不許爲右派徹底平反的原來就是您。你在「右派」問題上不但得罪了國內被錯劃成「右派」並已平反了的人（他們看了《鄧選》後，又心有成竹地心裡想：中共會不會根據《鄧選》再把「右派」帽子重新戴在他們的頭上？）而且您也得罪了海外正直人士，因爲在許多親大陸親中共的「友人」中，早已認爲：「引蛇出洞」、「陽謀」是連「資產階級政客」都不容使用的卑鄙政治行徑，您繼續肯定「反右」是對的，等於堅持「引蛇出洞」的「陽謀」是對的一樣。這使您的政治形象大受損害。

過去，人們一直以爲：阻擋高崗平反的另有他人，但《鄧選》告訴人們，阻擋高崗平反的不是他人。而是您！不過您不認爲高饒構成「路線錯誤」，這比毛前進一大步。實際上高饒事件在秘密情況下和幾位中央同志講了幾句宗派言論，搞了點非組織活動。根本構不成路線，這是您的一個貢獻。但是您繼續阻止高崗平反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從《鄧選》公佈的材料來看，（見《鄧選》第二五七頁）高饒的活動就係您與「中央兩位同志」的非組織活動一模一樣。他的活動範圍僅在中央高層進行，若不是您和陳雲打小報告出賣了高崗，老毛怎麼會清洗高饒呢！《鄧選》把迫害高饒的迷解開了。《鄧選》告訴全世界：鄧小平和陳雲是出賣高饒的元凶、禍首；在清洗「高饒反黨集團」中把西北幹部一網打盡，逼得多少老紅軍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啊！

這裡產生一個疑問：您爲什麼要在《鄧選》公佈您和陳雲一起出賣了高崗？緊緊把陳雲的政治命運和自己綁在一起？您是不是要通過《鄧選》告訴陳雲、和擁護陳雲的幫派：「我和陳雲是一條繩上的兩個蚂蚱，如果我們要借高饒事件來整我，等於把陳雲也整下去。」

妙在，《鄧選》發行後，陳雲對您和他一起出賣高崗的事，不與置評，至今保持沉默，既不肯定，又不否定，反而對高饒事件又蒙上神秘色彩。

憑高饒對中共的忠誠，對中共的貢獻，爲何至今不給他們平反？高饒事件提到中央討論了沒有？如果中央因爲您個人的這個意見而不敢也不能在中央討論高饒事件是否應該平反的話，說明您在高饒事件上還有重大陰謀，您必須一手遮天，在高饒問題上捂蓋了！人們反而在想：高饒事件可能並不像您在《鄧選》中說的那麼簡單。

從《鄧選》中可以看出一個很大的特色。那就是：在中共過去的歷史中，凡是由您參加的重大案件，涉及到您個人切身利益的地方，百計的爲自己開脫，要維持「原制」。否則，平反、翻案等於否定自己，您的這種毛澤東似的行爲只能把擁護您的幹部和群眾一個一個逼到反對您的道路上去，因爲：您自己把毛加罪您的「一切不切實際的謬誤之詞」都改了、翻案了、平反了。因爲毛死了！毛的「繼承人」也被您打倒了，您大權在手，愛怎麼幹就怎麼幹、愛怎麼翻就怎麼翻、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什麼黨內民主、法制對您已變成廢紙。高饒問題，反右問題為何不作為一議案提交中委討論？由中央定奪是非？您不是要搞民主領導嗎？您的所作所為是民主領導還是獨斷專行？還有民主領導嗎？

鄧陳體制

《鄧選》另一個特色是您幾乎在所有的講話中都不忘提陳雲。而且經常引陳雲的話，為自己的政治目的開路，給人留下深刻、強烈印象，這說明：您要想在中央站穩腳跟就必須緊緊拉住陳雲，否則在中央休想作任何事，事實上也是如此。陳雲是唯一可以在中央與您一較高下的實力人物。論資歷、論能力、論計謀、論權力（幹部），陳雲與您不相上下。從《鄧選》中披露的事實來看，您與陳在政治上結成聯盟似乎始於反高饒。

陳雲在延安出任組織部長，王鶴壽在延安不過在陳雲手下作個科長而已，凡在中共作過組織部長的人，都會形成一個自己的山頭。胡耀邦之可以攀黨魁寶座，也和他出任組織部長大量平反起用老干部有關。您雖然沒作過組織部長，但您在做總書記時已為自己在中央營造了山頭。您越是要專權，迫得中委們越往陳雲那邊靠。陳雲的厲害您當然知道。在《鄧選》中提陳雲、或引陳雲講話之處不下七十餘條。您每引陳雲之處倍加推崇之意，足見您心目中最大政敵不是別人，正是陳雲。

《鄧選》在收尾時還在如何選好接班人的問題上說要堅決貫徹陳雲同志講的幾條（見《鄧選》第三五五頁）。這是您故意恭維陳雲嗎？不是，您是要把選接班人的這個最易得罪人的條款推在陳雲身上。足見您的足智多謀，您不願意在選接班人的問題開罪老一輩幹部，您把這個刺刺踢給了陳雲。您對陳雲的策略是奉、拉、利用。這在《鄧選》中表露無遺。

過去說的鄧胡體制是根本不存在的。胡耀邦最新的表現是：他夾在陳和鄧之中。胡胡裡緊跟你，暗裡投奔陳雲。他在走鋼絲，趕緊開始就是陳雲的人。在政治局，鄧顯超不講話，李先念和稀泥，葉劍英稱病，彭真傾向陳雲。這就是中共最高層的素描。

一「放」一「收」

不知是您自己搞錯了，還是編者的特技，在《鄧選》中最能揭露您出爾反爾、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莫過您的兩篇講話，這兩篇講話的題目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另一篇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妙在這兩篇一放的講話緊緊編排在一起，一前一後，形成鮮明、強裂地對照。人們從這兩篇講話不但看出您個人的政治品質大有問題，而且看出，您和毛澤東一樣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

同樣的情況在《鄧選》中比比皆是，鄧小平打鄧小平、鄧小平否定鄧小平的場面實在數都數不過來，除了上述兩篇一放一收的奇文外，還有兩篇類似的傑作：一篇是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的《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見《鄧選》344頁下簡稱《談話》）另一篇是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見《鄧選》179頁下簡稱《祝辭》）

您的《談話》把《祝辭》完全推翻了。您在《祝辭》中說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並鼓吹「衙門作風必須拋棄」但是您在《談話》中完全變了一個人，殺氣騰騰，批《苦戀》、批《太陽和人》、批了大堆人。硬說人家是同黨唱反調，作風不正派，思想路線不對頭，許多話，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一句話，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如果說：您在一九七九年在文代會上《祝辭》時在黨內還沒有站穩腳根，華業派隨時可以把您搞倒，您還必須以一個民主派領袖形象出現，那麼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六中全會之後，您已覺得文藝家沒用了，不但不會幫助您，而且會成為您搞個人獨裁，個人崇拜的阻力。所以一改前顏要整一整文學藝術家，要把他們整服、整怕。

把《談話》和《祝辭》放在一起讀覺得又可氣、又可笑、又可悲。這簡直是兒童遊戲，這裡像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行為？「君無戲言」，不管什麼時代，什麼國家，什麼民族，都是一個定國安邦的真理。

《鄧選》中為什麼會出現兩個完全不同的鄧小平呢？

人們要問：是您在中央的地位和權力有限，被迫作了前後矛盾的講話，還是您本身就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派？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下簡稱《解放》）是您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據《鄧選》註釋說：「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即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時，中央還未給您公開平反，您也未拿到平反文憑。您在幕後活動下，已與中央達成基本交易，那就是，中央不再堅持兩個凡是，而您也就接受了平反。但您和許多中央首長最擔心的還不是中央能給您平反，你們最擔心的乃是將毛、林、四分子會利用中央給您平反挑起重毛，而這種情況一直到現在並未解除，因為您在中央，一直是個問題領袖，您在暗中把中央平反的問題搞妥之後，您立即制定並導演了一場《解放思想》，發揚民主的政治戰，您要利用《解放思想》，發揚民主在群眾中造成擁護反華的聲勢，為您重新復出和權傾中央造輿論。所以您在《解放》這篇講話中一再宣揚《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並說，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思想解放，強調：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您不但說「現在敢出來說話的，還是少數先進分子。」您拼命煽動群眾要「敢講話」，甚至：「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並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現在黨內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這是對長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種懲罰。」您簡直是一個民主與解放思想的天使！您的講話，您的思想，在當時自然贏得了黨內外廣泛的擁護。您講話中強調的民主對象和《解放思想》的對象無疑是指毛澤東，而這

正迎合了當時人民群眾的心願，所有阻擋和遏制這種潮流的人都成為人民群眾的大敵，都被群眾推倒了！您是踩着民主與《解放思想》的風輪重入中南海的。北京之春——中國之春就在您的煽動下像雨後春筍一樣發展起來，您利用了北京之春和中國之春；北京之春、中國之春也利用了您。因為：沒有您推波助瀾；民主和《解放思想》的風刮不起來。同樣沒有北京之春、中國之春把您當作民主和《解放思想》的教皇，您也許壓不住反對給您平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

但是，三中全會（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後不到四個月，您就變了一幅面孔，於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這時，您已成為中共的精神領袖，大權在手，中央已從輔政派手中易手，您就成為股份最大的中央董事長。您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再不收山，繼續鼓吹民主繼續為《解放思想》煽風點火，那麼自己也很可能變成民主與《解放思想》的革命對象。您製造了一個緊箍咒，要把這個緊箍咒套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頭上，這個緊箍咒就是四項基本原則。

什麼是四項基本原則？您說：①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②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③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④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當然，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來說，這四項基本原則的確是維護著共產黨基本利益的。這是毫無疑義的。丟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也就丟了共產黨。但是人民群眾要問：為什麼您在三中全會之前不敢提四項基本原則而專提民主與《解放思想》呢？如果您認為：在三中全會前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施政綱領》會把自己重新孤立起來，並影響自己平反復出的話；那麼至少也可在您大權未到手前將民主及《解放思想》的策略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時提出，表明您的《施政綱領》是一手抓「民主」，一手抓「專政」好讓人民和黨對您有個全面的認識嘛！人民和黨在選擇自己的領袖時不會再上當受騙嘛！顯然，您利用民主和《解放思想》就玩了人民和黨，民主和《解放思想》在您的手中不過是一張牌而已。

民主、《解放思想》是一張牌，對您這位橋牌大王來說：四項原則也是一張牌，在您的眼裡，民主和《解放思想》是右派思想，而四項原則又是左派要求，您一手高舉民主與《解放思想》的牌，另一手高舉四項基本原則拉住左派，您想同時打兩副牌，平衡黨內外左右勢力。但這是不可能的，民主與《解放思想》的牌被您的四項基本原則給吃掉了。

由於您在打政治牌，所以四項基本原則也是一張牌，您並未真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事實也是如此。您在大陸的實際社會生活中所推行的幾乎全是與四項基本原則背道而馳的：比如您在責任田的幌子下搞了分田到戶，等於二次土改不過這一次土改的對象不是黃世仁，而是公社、造反派；分田到戶我認爲

不管是什麼「主義」、什麼「道路」都是正確的，對目前的農民有好處，但中共黨員認為這不是「社會主義道路」。

您重用「知識分子」，提出「科技也是生產力」等於說「知識分子」也是「無產階級」，這是您在全世界「無產階級」政治家中最偉大的貢獻，也是最「科學的社會學」，但是中共的部分黨員認為：您把「知識分子」搞成「接班人」是「出賣無產階級專政」。

您重用「知識分子」，提出「第三梯隊」，大搞「文憑幹部」，中共部分「中委」認為這是「專家治黨」「專家治國」，您「出賣了共產黨的領導」。

您大搞「開放」、大搞「特區」、大搞「引進」，把工廠、礦山、土地都在「責任制」之下「化公為私」刮分了！您的「改革」被大陸人民譏為：「五七一改革」，因為您現在的「改革」都是林彪在「五七一紀要」中提出來想做而來不及做的事。您大開殺戒、藐視法律、踐踏法制，搞得大陸「天怒人怨」，早已「背叛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您的「改革」被您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定了！是您要利用「四項基本原則」平衡大陸黨內外的左右勢力；還是黨內的「左派」利用「四項原則」反過來把您吃掉？這就只有讓中共今後的歷史回答了。

與《解放》形成強烈對照的文章除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外，還有最厲害的一篇，如果不是編在《鄧選》中，我絕不敢相信這篇文章出於您手，這完全是一篇老毛的講話，這篇文章就是《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是在您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年之後又發出一聲怒吼！在這篇文章中您撕下一切偽裝，殺氣騰騰說：「『西單牆』」的許多東西能叫它生動活潑？如果讓它漫無限制地搞下去，會出現什麼事情？」（見《鄧選》216頁）您把您自己煽動起來用「民主牆」當作「反革命行為」，「犯罪行為」。而且您鼓吹要對您自己煽動培養出來的「罪犯」堅決採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軟「批評」：「現在還有少數地方、少數同志對這些人手軟，一部分地方對這些人採取措施很不得力，下不了手。」（見《鄧選》217頁）

您把反對您、和給你貼大字報、揭露你的群眾打成「反革命」下令抓了魏京生和傅月華，這還不夠，您在《目前形勢任務》（下簡稱《形勢和任務》）中乾脆把言論出版自由、集社自由給取締了：你厲色指出：「絕不允許宣傳什麼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內的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絕不允許任何人背着黨同這些人發生聯繫。」（見《鄧選》218頁）你還懷疑「民辦刊物」有後台，神經質地問：「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麼漂亮，那兒來的紙？哪個印刷廠印的？他們那些人總沒有印刷廠吧。印這些東西的印刷廠裡邊有沒有共產黨員？支持那些人活動的有一些就是共產黨員，甚至於還是不小的幹部。對這些黨員要講清楚，他們的立場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見《鄧選》218頁）

你明明在「收」，而且知道這種「收」不但否定了你自己的《解放》，而且不能自圓其說，但是你偏偏要自圓其說，結果就只好要無賴，你自問自答：「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不是又在『收』了？在

這樣的問題上，我們從來就沒有「放」當然也談不上『收』。（見《鄧選》218頁）人們要問：《解放》是「放」還是「收」？

你剛在「文化會」上講：「對寫什麼、怎麼寫，不要橫加干涉」（見《鄧選》219頁）可是話音剛落地就批《苦戀》你根本無法也沒有說清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就下令取消「四大」，您把「四大」作為妨害民主與法制、助長動亂、妨礙「四化」的禍根，反對「大鳴大放」，並說「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你瘋狂命令黨中央，要把憲法中有關「四大」的條文，「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決議，把它取消」（見《鄧選》221頁）你比老毛還專斷獨裁，你連遮羞布也不要了。

人算不如天算。您顯然沒有想到，您自己已被《鄧選》出賣了，否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形勢和任務》完全否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出現了鄧小平反對鄧小平、鄧小平打鄧小平嘴巴局面。我不知您覺察到這個嚴酷的事實沒有。如果您不立即下令把《鄧選》收回來，我看，人民和黨員越學就越要否定您，《鄧選》否定鄧小平就和《毛著》把毛否定了一樣。希望您懸崖勒馬。

自毀「方舟」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您在「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發表了《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在這個講話中拋出「三項國策」，全世界為之轟動。接着廖公打出「一笑泯恩仇」的「牌」對台灣「統戰」，一翻手又打出收香港的邪牌。我在致您的「公開信」中已基本上表明了對港台政策的基本態度。讀完《鄧選》才發現，我的認識是粗淺的。

細讀您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選）第203頁）中關於國內外形勢的分析，發現您的思想和認識基本上是「左」的，您吹牛說要在八十年代「做三件大事」：①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②是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③加緊經濟建設。就是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您提出，在三項「國策」中最根本的「國策」是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並說：「我們從八十年代的第一年開始，就必須一天也不就誤，專心致意地，聚精會神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搞四個現代化的建設這個總任務，我們是定下來了，決不允許再分散精力。」但是大陸人民和世界人民從一九八〇年一直看到如（一九八三年底），看來看去。看到了什麼呢？中共是否真的在「專心致意地，聚精會神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非也，人們看到的第一個不「專心致意」的舉動，就是：您利用經濟建設中的工作失誤，把華國鋒搞倒了。表面上看，您在「調整」的幌子下整頓全國經濟；實際上是利用「調整」把華國的幹部從重要崗位上撤下去，換上自己的人。

由於「調整」，「整頓」的目的不在經濟，而在「政治目的」，所以，經濟越搞越糟，赤字龐大，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弄得您不得不發「國庫券」（公債）渡難關！

由於您提出《解放思想》，把全國弄得大亂，又不得不提出「整黨」「整風」。否則，不但壓不住群眾也壓不住幹部，但是這樣一來，您又違背了您在

接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向世界人民宣佈的「不再搞政治運動」的許諾。您說，「人民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對大規模的運動厭煩了，凡是這樣的運動都要傷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經常搞運動，實際上就安不下心來搞建設。」（見《鄧選》第308頁），這是多麼冷靜多麼清醒的頭腦。但是您的話早已被您的大屠殺，「整黨」的現實粉碎了。

「二中全會」的「決定」說：這次整黨不發動群眾，是黨整黨；不許群眾整，是閉門整風，「閉門打狗」。謝絕群眾插手。但是這就發了一個很大的「技術性」問題。參加生產的工、農、兵黨員和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如果「脫產整黨」的話，幹部的工作說停也就停了，反正是「大鍋飯」，本來就人浮於事。問題是，現在大陸各行各業都在搞「責任制」基本工資外，還計時、包工、多勞多得、不勞不得，請問，「工人黨員」、「技術員黨員」、「工程師黨員」脫產去「整黨」，他們的機器，他們的科研工作由誰代替？假如他們的機器，他們的科研技術工作可找「待業青年」臨時「頂班」的話，那麼他們脫產整黨的「工資」是否照發？工資是由政府發還是由黨費裡支？如果由政府發工資，而又脫產「不勞而獲」，這不等於是在要非黨工人、非黨技術員、非黨工程師去養「黨員工人」、「黨員技術員」、「黨員工程師」嗎？這能創造物質財富嗎？這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行得通嗎？「社會主義」中國為什麼窮？就窮在一部分人要養活另一部分人。這是「整黨」無法避免的一個尖銳的群眾矛盾。所謂「專心致意地，聚精會神地搞四個現代化」不是等於放空炮嗎？

您在國內不能「專心致意地、聚精會神地」搞四個現代化，瞎折騰，那是你們的事，但是在國際上也不斷興風作浪，就更不能「專心致意地聚精會神地」搞國內「國化」，您在香港問題上掀起一個惡浪又一個惡浪，在台灣能不能買美國武器的「原則問題」與美國打「詭詐牌」「打險牌」，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台灣問題上製造出來的糾紛，不但暴露出中共的虛弱，而且使中共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大受損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您把毛、周在世界人民心目中苦心經營的正直，莊嚴的國家形象全部抹黑了！您在香港和台灣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不但是左傾冒險主義的產物，而且等於在自殺。

香港和台灣是中國人民的「方舟」——這本是上帝對中國人民的一種「偏愛」，所以用台灣、香港普渡大陸眾生。香港不但普渡大陸也普渡台灣的中國人，過去普渡過國父孫中山，周恩來張國燾等人，今後也許可以普渡鄧小平、胡耀邦——以及鄧胡派幹將。但是：您和您的謀士們缺乏長遠的政治眼光，要自毀「方舟」，並在「愛國主義」和「民族大義」虛偽的面紗下，置南沙、西沙、置釣魚台麥馬洪綫以東及中俄邊境條約、北外蒙主權於不顧，「捨遠求近，捨大求小，要收回九龍主權，您們在香港問題上不能自圓其說的拙劣表現，自己撕下了自己虛偽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假面具，受到世界人民的嘲弄。

提出在「八十年代」要做三件事這個「時間」大限，本身就是「左」的口號。政治目標怎麼能和經濟目標一樣用數字來規範期限呢？不知您出於什

麼「情報」，什麼「根據」，可以很有把握地提出在「八十年代」就一定可以實現中國「統一」呢？如果在「八十年代」大陸人民仍未看到中國的「統一」，中共的威信是不是一落千丈進一步喪失呢？中共是否還能再經受一次喪失「信心」的打擊呢？

令人費解的「國策」之戰

「三項國策」的思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選》第203頁）中提出，但見「國策」二字則是在八二年「六中全會」之後，今年「六屆政協」和「六屆人大」之後，您的「國策」思想已被「兩會」認同。但令人費解的是：在「二中全會」之前，在中共又唱出另外的幾項「國策」來，形成「國策」之戰，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似乎又集中在「國策」的分歧之上？各個權力中心都提出了自己的「國策」，利用得人心的「國策」拉山頭、拉黨心、拉民心、拉軍心、大打「國策」牌！

這絕不是我要故意標新立異，或別出心裁，而是有事實根據的：

八月二十七日，新上任的國家主席李先念首先行施「國家主席」大權。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日本眾院副議長岡田，在談到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時，李先念說，我國政府現在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在總結以前的經驗教訓，並全面研究國際關係的基礎上確定的「是我們的一個基本國策」，李先念在您的「三項」國策中又加了一項「對外開放的國策」。在這之前不久，彭真和您先後接見了希臘、丹麥議會團和其它外賓。在這些會見中，彭一再強調：中國的「國策」首要任務是經濟建設，是改善人民生活；在「國策」問題上公然與您分庭抗禮，李、彭通過這種方式等於把中央的分歧告訴了國內外人民群眾。「改善人民生活」的國策就成為第五項「國策」；妙在：李、彭的「開放國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國策」墨蹟未乾，香港一家親共報紙立刻發出一篇「北京特訊」，用大字標出：「中共決策，確保建設，資金物質正集中，改善民生將放緩」把李、彭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國策擊了個粉碎。

當時，我看到這種關於「國策」的分歧，就想

寫點什麼，但我沒有想到這種分歧會帶來什麼後果。顯然，從打「國策」牌爭取群眾的角度來說：李、彭的「開放國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國策顯然比您的「三項國策」更迷人，更有吸引力，也更切合百姓的實際。

也許您認為李、彭這種妄提「國策」的作法與您一合二巽，使您大為光火，所以，在此後中共的一系列文件中就出現了「要與中央保持一致」的提法。「中央」何言？「中央」就是您的代名詞；你認為李、彭的「國策」與「中央」不一致，離了譜，但是，他們一個是國家主席，一個是立法的委員長，不是要黨政分家嗎？不是說「黨不干涉行政」嗎？怎麼李、彭的講話與您稍有不一致您就暴跳如雷？而且在「二中全會」的「決定」中特別寫上一條：「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表明，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是奪取革命和建設勝利的條件。」「決定」要求黨員要「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的基礎上同中央保持一致，這是黨的政治紀律。能否做到這一點，是衡量黨組織和黨員的思想、政治和紀律狀況的主要標誌」。

顯然，李先念與彭真關於「國策」的言論已在「整黨」的「決定」被否定了！他們與「中央」（鄧小平）的「不一致」將會導致什麼下場呢？您是不是要利用「整黨」把「國家主席」和「人大」委員長也整呢？他們在黨內部在你的領導下，「國大」還是「黨大」、「法大」還是「黨大」的爭論不攻自破，至此已毫無意義了，「決定」壓倒一切，「整黨」不但是整人，而且也是整法、整國、整軍、整民——因為：「黨是決定一切的」——「黨是決定一切的」就是「領袖決定一切」的代名詞。

人多不是貧窮的理由

您在《鄧選》中不斷重複一個思想，認為中國貧窮是「人多、地少」。您在批判老毛「人多好辦事」的錯誤時，又跑到另一個錯誤的極端，在「人多，耕地少」就不能富的思想指導下，產生了滅絕人性的、變態的與人恨人、人殺人的災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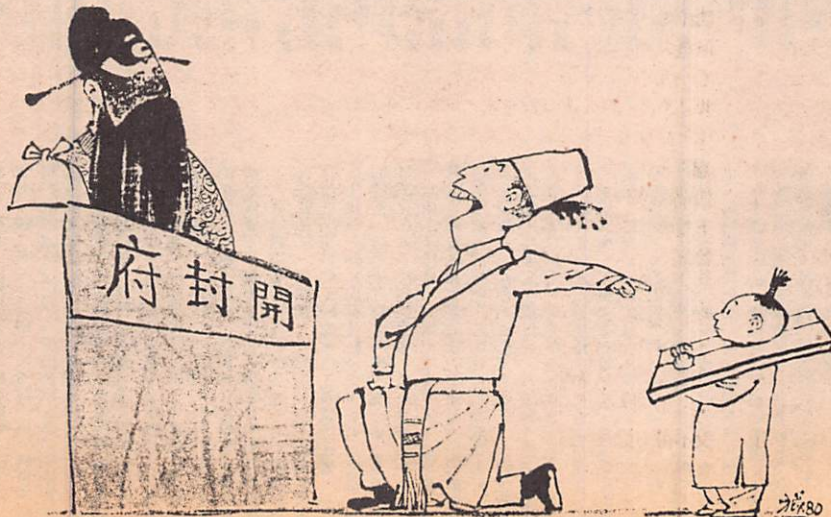
您說：「中國這樣的底子，人口這麼多，耕地這樣少，勞動生產率、財政收支、外貨進出口都不

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國民的增長速度不可能很快。」（見《鄧選》223頁）「我們要經常記住，我們國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長期奮鬥才能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見《鄧選》224頁）。您把貧窮的理由推在「人口多」之上。

中共把大陸搞得一窮二白，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用「階級鬥爭」作為刺激和發展生產的動力，嚴重挫傷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瞎指揮」和言而無信使黨的威信掃地，但是，你和中共的一些謀士們，不願公開向人民群眾承認自己領導無能，竟然把社會制度和主義造成的災難推委到「政策的失誤」上，最後把錯誤乾脆推在群眾身上；你們利用為經濟學家馬寅初平反恢復名譽的機會，硬說造成大陸貧窮的原因是由於毛澤東不聽馬寅初的奉告，把制度主義產生的政策災難推在人口發展超過了生產增長的指數上。好像當初老毛如果採納了馬寅初節制生育的建議，也許中國不會這麼窮。所以，物極必反，在中國制定了只須生一胎的強硬措施，逼得農民和想要男孩的人把女嬰殺掉，用各種殘酷的手段把女嬰殺死而爭取一個再生育的機會。

我早在一九七八年就化名「方君」在香港《明報》月刊寫了一篇「學人的楷模」為馬寅初翻案。在這篇文章中我批判了毛澤東的獨斷專行，也把他的「人多好辦事」批判了，經過這些年來的思考以及對世界先進國家的研究比較我發現：毛澤東的話其實並沒有錯。人多在某種情況下固然會影響人的生活，但這絕不是一個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什麼人」生活在什麼土地上，生活在什麼社會制度中，而不是「人多」。

未完待續



告狀

——他詆譭老毛，說老毛臉黑！

方成

偉大能做的。一切好的東西都歸到上帝那裡去了，頂禮膜拜。這個過程，費爾巴哈把它叫做異化，叫做人性的異化，或者叫做人的本質的異化。上帝哪裡來的？神哪裡的？都是人自己造的。自己拜菩薩自己拜，不認得了，反而倒過來，讓上帝支配自己。修道士為什麼不結婚？因為天國有個新娘，叫聖母瑪麗亞。他把自己需要的，異化成聖母，他就不娶新娘了。修士在天上也有個新郎，就是上帝。天上有新郎新娘，就不要人間的了，異化了。因此費爾巴哈得出一個結論：要克服宗教的異化，人就應該崇拜自己。上帝的本質就是人的本質，在人之上沒有更高的東西，人是人的最高本質，不要相信上帝，要相信自己是人。要崇拜的話，崇拜人自己。要愛的話，就要愛人類。人應該把異化爲上帝的本性收回來還給人，克服異化。

從宗教這種取得突破以後，費爾巴哈和當時的青年黑格爾派就取得許多東西都用異化來解釋了。比如說，歷史本來是人們自己創造的，可是黑格爾卻硬說是一絕對精神創造的。這個絕對精神不也是和上帝一樣，是人的頭腦的產物？人的頭腦的產物倒過來被說成是支配人的東西，這不也是異化？所以，黑格爾的唯心論哲學也是異化。不也是這樣，國家也是異化，政府也是異化。爲什麼呢？官吏、政府和國家機關本來是社會的產物，社會的一部份，是要它來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結果政府、政權、國家的發展，却倒過來凌駕於社會之上，統治了大部份人，這是異化。無政府主義思想就是這樣來的。無政府主義者認爲，政權、權威、政府都是壞事。原始時期，人是最自由的。那時，沒有政府，沒有官吏。後來異化了，社會一部份人即統治者，轉過來統治了人，人們沒有自由了。因此要克服政治上的異化，應該講無政府主義。

宗教是異化，這沒有錯。但是爲什麼會產生宗教的異化呢？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這是因爲社會本身有了異化，社會本身分裂了，出現了剝削階級，所以人就受苦。受痛苦，就需要安慰；需要安慰，就創造一個上帝。宗教世界是人間世界的一種反映，所以，應該從社會的現實生活中去尋找宗教異化的根源。這樣，馬克思就提出了「勞動的異化」。黑格爾講絕對精神的異化，費爾巴哈講人性的異化，馬克思講勞動的異化。這樣就一步步擺脫唯心論，走到徹底的唯物論了。

甚麼叫勞動的異化？產品本來是勞動者創造出來的，杯子是工人生產的，桌子是工人做的，結果生產出來的東西勞動者享受不到，都給人家剝削走了。工人創造出來的財富越多，他自己越貧困；他創造出來的智慧越多，他自己就越愚昧。資本家爲甚麼能夠剝削工人？因爲他佔有生產資料，佔有機器。機器是誰造的？工人造的。工人自己的產品變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着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商品是人創造出來的，貨幣是人創造出來的，結果倒

爲人民謀福利，並且卓有成效，這樣人民才會擁護你。因此最首要的是領袖忠於人民。我們強調的「忠」，是個封建的東西。外國人講領袖，喜歡說誰誰是人民的兒子，中國人不講，一說誰誰是誰的兒子，這是罵人，一定要說是父親。萬物生長靠太陽，毛主席是太陽了，人民離不開領袖就像萬物生長離不開太陽一樣。領袖是有他的作用，但是人民不是絕對不能離開領袖的，而領袖是絕對不能離開人民的，應該說人民是母親。當然現在說他是母親，但歸根結底應該說人民是母親。毛主席呢？他是黨的締造者之一。但是，沒有黨也就沒有後來的毛主席，沒有人民也就沒有毛主席。毛主席在共產黨裏面，在人民當中，經過鬥爭鍛煉成長起來的，成熟起來的。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宣傳個人迷信，把這關係顛倒了，把領袖當成異己的力量，異化了。革命的勝利，推翻三座大山，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這些主要的功勞是人民的。恩公移山，怎麼移的？是感動了上帝。上帝是誰？毛主席說上帝就是人民。億萬人民一塊拋山，把三座大山挖掉了，這是人民的功勞。可是後來是一切榮譽歸於領袖。不管幹了甚麼好事，別人一表揚，就說：「不要感謝我，應該感謝毛主席。」毛主席那裏知道你幹了甚麼好事呀！這樣，在抬高領袖的同時，貶低了人民。智慧的泉源，力量的泉源，一切一切的來自高於一切的領袖，而不是來自人民，這還不是顛倒了嗎？結果自己吃苦頭了。這個事情也不能完全推給林彪、「四人幫」。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那個時候是出於熱愛，的的確確是出於熱愛，也宣傳了迷信。講這一套當時不覺得會吃苦頭，現在倒過來吃苦頭了。一講神容易送神難。一旦個人迷信造成了異化，你要破掉它，就得付出代價，慘重的代價。異化了，不由自己支配。異化就是這樣意思，本來是自己創造的東西，或者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它發展的後果，成爲一種異己的力量，超出了人們的控制，結果反過來支配自己，壓制了自己。現在批判個人迷信，是爲了重新肯定人民羣衆的價值，人民羣衆的力量。智慧的源泉是人民羣衆。毛主席首先是人民的學生，然後才是人民的先生。文化大革命不宣傳這個，宣傳四個偉大的先生。偉大的導師，但是他同時也是該是人民的學生。首先應該向人民學習，然後才能做導師；不向人民學習，怎麼做導師呢？

爲人民謀福利，並且卓有成效，這樣人民才會擁護你。因此最首要的是領袖忠於人民。我們強調的「忠」，是個封建的東西。外國人講領袖，喜歡說誰誰是人民的兒子，中國人不講，一說誰誰是誰的兒子，這是罵人，一定要說是父親。萬物生長靠太陽，毛主席是太陽了，人民離不開領袖就像萬物生長離不開太陽一樣。領袖是有他的作用，但是人民不是絕對不能離開領袖的，而領袖是絕對不能離開人民的，應該說人民是母親。當然現在說他是母親，但歸根結底應該說人民是母親。毛主席呢？他是黨的締造者之一。但是，沒有黨也就沒有後來的毛主席，沒有人民也就沒有毛主席。毛主席在共產黨裏面，在人民當中，經過鬥爭鍛煉成長起來的，成熟起來的。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宣傳個人迷信，把這關係顛倒了，把領袖當成異己的力量，異化了。革命的勝利，推翻三座大山，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這些主要的功勞是人民的。恩公移山，怎麼移的？是感動了上帝。上帝是誰？毛主席說上帝就是人民。億萬人民一塊拋山，把三座大山挖掉了，這是人民的功勞。可是後來是一切榮譽歸於領袖。不管幹了甚麼好事，別人一表揚，就說：「不要感謝我，應該感謝毛主席。」毛主席那裏知道你幹了甚麼好事呀！這樣，在抬高領袖的同時，貶低了人民。智慧的泉源，力量的泉源，一切一切的來自高於一切的領袖，而不是來自人民，這還不是顛倒了嗎？結果自己吃苦頭了。這個事情也不能完全推給林彪、「四人幫」。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那個時候是出於熱愛，的的確確是出於熱愛，也宣傳了迷信。講這一套當時不覺得會吃苦頭，現在倒過來吃苦頭了。一講神容易送神難。一旦個人迷信造成了異化，你要破掉它，就得付出代價，慘重的代價。異化了，不由自己支配。異化就是這樣意思，本來是自己創造的東西，或者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它發展的後果，成爲一種異己的力量，超出了人們的控制，結果反過來支配自己，壓制了自己。現在批判個人迷信，是爲了重新肯定人民羣衆的價值，人民羣衆的力量。智慧的源泉是人民羣衆。毛主席首先是人民的學生，然後才是人民的先生。文化大革命不宣傳這個，宣傳四個偉大的先生。偉大的導師，但是他同時也是該是人民的學生。首先應該向人民學習，然後才能做導師；不向人民學習，怎麼做導師呢？

是否光有思想上的異化？我看政治上恐怕也有。這個問題在《法蘭西內戰》裏面，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已經提出來了。當時他們沒有用異化這個詞，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他們提出要防止國家機關由社會的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其實就是防止異化。階級也是這樣產生的。由於生產的發展，有了分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家了，需要少數人操勞勞動，來管

是否光有思想上的異化？我看政治上恐怕也有。這個問題在《法蘭西內戰》裏面，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已經提出來了。當時他們沒有用異化這個詞，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他們提出要防止國家機關由社會的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其實就是防止異化。階級也是這樣產生的。由於生產的發展，有了分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家了，需要少數人操勞勞動，來管

殊化。差別允許，搞特殊化、特權，不行。這樣就使得那些投機分子感到當領導沒有甚麼意思，辛辛苦苦，任勞任怨，到頭來沒有甚麼好處，他就不奔這個險。

政治異化是當前主要危險

二十多年來我們一直說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當然現在還要反修、防修，但是的確確應該考慮一下：主要危險究竟來自何方？可能我們的主要危險還是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老爺。大家可能考慮主要危險是在這裏。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央全會上就提出來了：我們要勝利了，因爲勝利，驕傲的情緒，貪圖享樂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的情緒，可能滋長。這是作爲警告，敲響鐘吧！我覺得經過三十年回頭來看，我們現在的黨，變成執政的黨，黨的地位起了變化，就可能有些脫離羣衆、脫離人民的危險，可能異化。本來是爲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公僕，但後來脫離人民，變成貴族老爺。不是工人階級了！成了與工人階級對立的異己的勢力。當然也可以說，這就是「變修」了。但是修正主義究竟是一個理論問題，並不是所有壞人、陰謀家都要提出一套理論來修正馬克思主義。現在「四人幫」被打倒了，我們不要以爲萬事大吉了。還會再出林彪、「四人幫」嗎？怎樣才能防止再出林彪、「四人幫」？當然，要說再出林彪的野心家陰謀家，跟林彪、「四人幫」一樣，表現形式一樣，危害之大也一樣，那就不一定。但是我覺得，只是要求不再出林彪、「四人幫」，這個要求太低了。問題應該換一個提法，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如何防止社會的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這個提法就廣泛多了。有些幹部夠不上「四人幫」，但是他做官當老爺，不關心人民的利益，這不該反對嗎？各級領導都有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解決。但現在中央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制定黨內生活準則，廢除終身制，這些都可以說是防止異化的措施。

過去講，羣衆、階級、政黨、領袖的關係，就是說羣衆是劃分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代表的，政黨是由少數領袖領導的。羣衆跟着階級走，階級跟着政黨走，政黨跟着領袖走。這樣，階級專政歸結爲黨專政，黨專政歸結爲領袖專政。批評在共產黨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批評國產黨裏的反對派。這些人提出一個問題：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還是羣衆專政？他們的錯誤，是把黨和階級、領袖和羣衆完全對立起來了。針對這種錯誤，列寧講了上面的意思，這是對的。但是現在確實有這個問題，就是不一定在任何條件下，任何時候，黨都代表階級，領袖都代表羣衆。存在着這種可能，領袖做的事情，或領袖的思想脫離了人民的利益，他不代表黨的利益，不反映階級的利益，不反映人

過去講，羣衆、階級、政黨、領袖的關係，就是說羣衆是劃分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代表的，政黨是由少數領袖領導的。羣衆跟着階級走，階級跟着政黨走，政黨跟着領袖走。這樣，階級專政歸結爲黨專政，黨專政歸結爲領袖專政。批評在共產黨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批評國產黨裏的反對派。這些人提出一個問題：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還是羣衆專政？他們的錯誤，是把黨和階級、領袖和羣衆完全對立起來了。針對這種錯誤，列寧講了上面的意思，這是對的。但是現在確實有這個問題，就是不一定在任何條件下，任何時候，黨都代表階級，領袖都代表羣衆。存在着這種可能，領袖做的事情，或領袖的思想脫離了人民的利益，他不代表黨的利益，不反映階級的利益，不反映人

過去講，羣衆、階級、政黨、領袖的關係，就是說羣衆是劃分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代表的，政黨是由少數領袖領導的。羣衆跟着階級走，階級跟着政黨走，政黨跟着領袖走。這樣，階級專政歸結爲黨專政，黨專政歸結爲領袖專政。批評在共產黨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批評國產黨裏的反對派。這些人提出一個問題：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還是羣衆專政？他們的錯誤，是把黨和階級、領袖和羣衆完全對立起來了。針對這種錯誤，列寧講了上面的意思，這是對的。但是現在確實有這個問題，就是不一定在任何條件下，任何時候，黨都代表階級，領袖都代表羣衆。存在着這種可能，領袖做的事情，或領袖的思想脫離了人民的利益，他不代表黨的利益，不反映階級的利益，不反映人

一些問題，因此還會陷入某種不自由的狀態。據我看，在這些問題上，毛主席有發展。毛主席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這個提法就比較科學，符合唯物辯證法。

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除了思想上、政治上還可能出現異化以外，經濟上也可能出現異化。當然這種異化同資本主義的異化是不同的，主要不是剝削造成的，而是由於不認識客觀經濟規律造成的。此外還有官僚主義的問題，體制問題。前不久報紙上批評的甘陽的「西水東調」工程，不就是一種經濟上的異化現象嗎？結果不但得不到好處，還成了一個大包袱。自己辛辛苦苦造一個大包袱給自己，這不是異化嗎？再比如雲南森林的大火，毀林開荒，類似的問題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裏也講到。過去把森林燒掉，要它的荒地，從近期的效果看是有利的。因爲自己有一塊地，可以種地了。但是大家都這樣搞，長遠的後果，人要吃它的苦頭。因爲破壞了生態的平衡，破壞了森林，氣候條件又改變，最後這個地區成了一個不毛之地，這是自然界的報復。人就倒過來吃苦，這就叫異化。有的事情我們往往注意第一個效果，眼前的效果。近期的效果我們可以預料到的。但是長遠的後果，有時往往預料不到。而長遠的後果，它可以使人類控制住，轉過來危害人。像工業污染也是例子。搞個化工廠，搞個甚麼廠，這也是好的啊！結果，它產生了污染，倒過來危害人。這也是一種異化。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的需要，這應該是很清楚的吧！然而社會主義也可以出現這種現象，片面地追求高速度，片面地發展重工業。高速度之所以好，是因為它能高速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才是好的嘛！犧牲人民的生活水平去追求高速度，去追求重工業，爲重工業而重工業，爲高速度而高速度，結果人的幹勁越大，就越是大吃苦頭。勞動的結果不是對人民有利，反而使人民吃虧，這也是異化。由於這種唯意志論，不認識客觀經濟規律，還帶着很大的盲目性，因此經濟上也會異化。剝削只是異化的一種，承認是很重要的一種，但不是唯一的。所以我們可以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看社會問題，許多社會問題可以概括爲異化。現在我們要克服異化，就是要認識客觀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

現在提出異化問題來，聯繫到我們實際當中很多新的問題，大家有重新學習的必要。過去對馬克思的早期著作，我們注意得不够。原因我想有兩個，一是覺得不重要，二是覺得太難懂。難懂是事實，但並非不重要。現在看起來他的關於異化的思想很深刻。其實，晚年馬克思也講異化，儘管講得少了一點，但他從來沒有拋棄這個思想。當然，這個問題理論界可能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志認爲不那麼重要。今天我講的是個人意見供同志們學習參考。

現在提出異化問題來，聯繫到我們實際當中很多新的問題，大家有重新學習的必要。過去對馬克思的早期著作，我們注意得不够。原因我想有兩個，一是覺得不重要，二是覺得太難懂。難懂是事實，但並非不重要。現在看起來他的關於異化的思想很深刻。其實，晚年馬克思也講異化，儘管講得少了一點，但他從來沒有拋棄這個思想。當然，這個問題理論界可能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志認爲不那麼重要。今天我講的是個人意見供同志們學習參考。

現在提出異化問題來，聯繫到我們實際當中很多新的問題，大家有重新學習的必要。過去對馬克思的早期著作，我們注意得不够。原因我想有兩個，一是覺得不重要，二是覺得太難懂。難懂是事實，但並非不重要。現在看起來他的關於異化的思想很深刻。其實，晚年馬克思也講異化，儘管講得少了一點，但他從來沒有拋棄這個思想。當然，這個問題理論界可能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志認爲不那麼重要。今天我講的是個人意見供同志們學習參考。

異化就是異己化

異化這個概念在歐洲已經流行好幾十年了，討論得非常熱鬧。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不管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都參加了討論。南斯拉夫對這個問題很重視。蘇聯理論界長期對這個問題避而不談，要談也是抱否定態度，說這是馬克思的早期思想，沒有什麼價值；但後來也勉強強講異化，甚至產婆答承認他們那裡也有異化了。美國也比較落後。前年我去美國時，聽他們說，他們現在也重視起這個問題來了。我們國家在一九六四年周揚同志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報告時，講過一回異化的問題。但是，後來有一個很長時間沒有進行研究了。經過「文化大革命」，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現實意義突出起來了。

馬克思一八四四年寫了《經濟學—哲學手稿》，那時他還只是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這篇手稿一直沒有發表，一九三二年才發表。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講了異化的問題。在這之前，黑格爾、費爾巴哈也講過這個問題。究竟什麼叫異化？打個比方說，一個母親生了個兒子，她很心疼，很愛，辛辛苦苦把他培養大，教育大。可是這個兒子慢慢長大後，成了一個逆子，不僅不受母親管，倒過來管他的母親，欺侮或者虐待母親。兒子不認他的媽，把母親當外人甚至敵人。母親也覺得兒子不像他的兒子，成了家庭裡面的異己分子。這個過程用哲學的語言來講，就是異化。異化，就是異己化。這個概念是從黑格爾那裡來的。我們講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黑格爾的哲學是倒過來，講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黑格爾也承認，先有自然界，然後有人，有人的精神。但是他認為自然界之前還有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叫做理念階段，或者叫做邏輯的階段。這個階段變出了自然界，這就叫異化。

從宗教異化到勞動異化

費爾巴哈把這個概念接過來解釋宗教。以前十八世紀唯物論批判宗教還比較淺淺，光說宗教是愚昧無知的產物。人怎麼會信上帝啊？這是愚昧無知，不懂科學！這種批判很簡單。費爾巴哈用異化解釋宗教的起源，就比以前深了一步，進一步，聖經說，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樣創造了人，創造了亞當、夏娃。費爾巴哈指出來的却正好相反。他說，是人按照自己的模樣創造了上帝。不如此，人還把自己的本性也放到上帝裡去了。上帝有無比的智慧，這智慧是什麼東西？是人的本性。上帝愛世人，愛是從哪裡來的？也是人的本性。上帝有意志，意志是從哪裡來的？也是人的本性。所以，人把自己本性的賦予自己創造的上帝，並且把他無所不能，成了個上帝。但是在創造出上帝之後，卻跪倒在上帝腳下，向他哀求：「偉大的上帝啊！你創造了我！請你救苦救難。我什麼都不是，我是卑微渺小的，你是

談談異化問題

王若水

編者按：最近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被撤職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一九八〇年六月在人民日報新聞業務學習班上講課，提出了社會主義異化問題。

過來了，好像是金錢萬能，金錢成了神，人甚麼本事都沒有，得靠金錢。金錢本來是死的東西，倒過來把人統治住了。物把人統治住了。馬克思把這個叫做勞動的異化。馬克思就按照這一條思路，研究政治經濟學，寫了《資本論》。並且得出結論：要消滅異化，就要消滅剝削。經濟的異化是其它一切異化的根源，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異化問題解決了，宗教問題也解決了。那麼這個問題發展到現在，為甚麼又引起大家這麼大的興趣呢？我想這個問題也是社會主義實踐提出來的，現在有它的新的意義。就是社會主義還有沒有異化？社會主義應該消滅異化，但它究竟是不是已經消滅了異化，沒有異化呢？我想我們應當承認，實踐證明還是有異化。不僅有思想上的異化，而且有政治上的異化，甚至經濟上的異化。

對迷信是思想異化

首先，個人迷信，現代迷信，是思想上的異化。宗教主義是異化，教條主義發展到頂點，就成了個人迷信。本來領袖是人民當中產生的，是人民擁護的。就像周總理講的，人民是土地，是土壤嘛！在土壤當中把他培養大的。離開人民這塊土地，領袖就沒有甚麼力量，不會有甚麼作為了。領袖和羣眾的關係應當是這樣嘛！宣傳個人迷信的結果，領袖脫離了人民。倒過來了，好像人民的一切都要依靠領袖，這不是跟上帝一樣了嗎？文化大革命中宣傳的四句話是典型的了：「一切聽毛主席，一切為了毛主席，一切服從毛主席，一切緊跟毛主席。」一切為了毛主席，一切服從毛主席，毛主席為誰呀？應該是毛主席為人民，一切為人民，這是基本的道理。結果倒過來了，人民為着領袖，一切為了毛主席。「一切服從毛主席」，毛主席需要不要服從誰呢？毛主席是一個黨員，他得服從黨呀！他得服從人民的意志。他並不是至高無上的，高於一切的，如果這樣，那把人民放在甚麼地位？宣傳「一切服從毛主席」，不就是在宣傳一言堂嗎？不是顛倒了領袖和黨，領袖和人民的關係嗎？這就是異化。這種異化跟我們國家封建思想的影響有密切關係。文化大革命中跳「忠」字舞，走「忠」字路，「最忠、最大、最忠、一、二三忠於四無限」，要人民忠於領袖，却不說領袖要忠於人民。首先領袖要為人民服務，

一個公社，或者一個集團的公共事務。他們應該為大眾服務的，但是後來他們掌握了權力，同時由於生產的發展，也可以剝削，逐漸就把這個權力用來為自己服務。這樣就產生了階級，產生了國家。權力應該是用來保護共同利益的；但如果把權力去保護自己的特殊利益，那麼就由人民的公僕變成了人民的主人。這就是異化。這種危險，甚至於到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還存在。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導言中說過一段話，他講到巴黎公社的時候，說：「公社一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除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消除全部舊的、一直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以宣佈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以國家的特徵為甚麼呢？社會起初用簡單分工的辦法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來保護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後來，這些機關，而其中主要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從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三三四頁）請注意，恩格斯講的是工人階級要「防範」自己的官吏，而不是甚麼「無限忠於」、「無限信任」。我們的幹部，我們的領袖，他們的權力是從那裏來的？是人民給的。毛主席也講了，「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羣眾給的。……人民給了領袖以權力，給這個權力幹甚麼？是要為人民服務。但這個權力一旦給出去以後，就有這種危險：自己有一部分人把這種權力不為人民的服務，而為自己服務，結果就把這種權力不為人民的服務，轉過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這好比母親辛辛苦苦生了個兒子，指望他長大以後養老，結果成了個逆子。政府變成了老爺，不受人民控制了，變成了異己的力量，這就是異化，政治上的異化。怎麼解決這個異化問題？當時提了兩條辦法，一條是普選制，一條是低薪制。我們現在取它的精神，一個是普選，隨時可以撤換，人民還是有權力的，不是把甚麼都交出去，除了言論自由外，還有選舉權和罷免權。誰不好好為人民服務，就把他撤換。另外一個低薪制。當然現在要像巴黎公社那樣，領袖幹部拿普通工人的工資，也行不通。但是我們要取他的精神，要反對特

違背經濟規律造成經濟異化

所以問題比較複雜。不是說公有制一建立，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原來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好像一切的異化的根源都是私有制，好像只要社會一旦掌握生產資料，異化就消滅了。恩格斯下面這段話的實際意思就是這個。他說：「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就是異化。本來產品是生產者生產出來的，結果倒過來統治我們。這種異化消除了。下面恩格斯又說：「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着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却受到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己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直到現在都如同異己的、統治着人們的自然規律一樣與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我們熟練地運用起來，因而將服從他們的統治。……一直統治着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三二三頁）歷史本來是人創造的嘛！但是，人不是自覺創造的。人們有這個活動，那個活動，各有各的目的，各種行動的總和形成一種盲目的力量轉過來支配了人自己，這是一種異己的力量。過去的歷史一直是受一種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統治的，現在，是處於人們自己控制之下，異己的力量克服了。這樣，人們能完全自覺地創造歷史，飛躍到了自由王國，好像異化沒有了，完全自由了。現在看起來，廢除私有制，消滅剝削了，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是不等於這個問題解決了以後，社會上一切問題都沒有了，人就完全進入自由王國。不！還會有異化，因為人們還可能對社會發展的規律不完全認識，還有盲目性，還會產生

是由於有了這個偉大學說的指引，我們才取得革命的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我們仍不能忽視階級鬥爭的存在，仍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但是，階級鬥爭究竟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爲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如斯大林所說，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人民及其需要，即滿足人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選集》下卷第五九八頁)。人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目的。生產本身不是目的，階級鬥爭、人民民主專政本身也不是目的。過去許多同志把這一點忘了。馬克思從他成爲共產主義者的第一天起，就是以全人類的解放爲己任的。關於人的問題，他在早期著作中談得比較多，比較集中，其中有十分精辟的見解，當然也有不成熟之處。後期馬克思集中力量研究經濟問題，關於人的問題談得少一些，但比之早期著作又有新的發展。只有把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後期著作連貫起來研究，既看到兩者的區別，又看到兩者的聯系，才能對馬克思主義獲得完整準確的了解。

二三十年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集中力量研究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寫出了不少著作。與此同時，人道主義思想也很盛行。一個時期裡，我國不少青年學生對現代西方哲學的一些流派頗感興趣。這種現象，我們應該認真引導。我認爲，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才能真正克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

馬克思主義包含人道主義

作爲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亦譯人文主義)，是資產階級先進思想家提出來的，在打破封建主義束縛，揭露中世紀神學和宗教統治方面，曾經起過非常積極的作用。此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社會作用，在不同歷史條件和不同環境下，有所不同，因此也要作具體考察和分析，不能一概否定。在某種條件下，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也可以成爲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軍。但是，必須指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思想體系，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是根本不同的。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觀念去說明和解釋歷史。儘管這種人道主義學說，對舊制度的抨擊，也曾經顯示出某些激動人心的力量；對歷史

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有詳細的論述。後來，他把這個思想發展爲剩餘價值學說。這在《資本論》中說得很清楚。那種認爲馬克思在後期拋棄了「異化」概念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馬克思認爲，私有制下的異化現象，到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了頂點。各種異化現象，都是束縛人、奴役人、貶低人的價值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類解放，不僅是從剝削制度(剝削是異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且是從一切異化形式的束縛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馬克思認爲，共產主義將使「人的本質力量，人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發揮和實現」(《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使「一個性的全面發展代替舊的分工制度下個人的片面發展」(《資本論》)。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共產主義的「目的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第四八六頁)他甚至說，共產主義就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爲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六四九頁)毫無疑問，這是從早期的馬克思到成熟時期馬克思的重要思想。應該說，這個問題是與歷史上的人道主義有着思想繼承關係的。我們都知道，從文藝復興以來，崇尚人的全面發展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基本標誌之一。盧梭在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一書中，就論述過人在肉體和精神上的全面發展的主張。席勒在他的《美育書簡》中更有出色的論述，他要求通過過美育活動，使人獲得解放，「成爲一個全面的完整的人」。(《美育書簡，第二封信》)傅立葉設想在他的未來協作制度中，使人「實現體力和智力的全面發展」。(《傅立葉選集》第三卷第二一七頁)但是幾個世紀以來，先進人們崇尚的人的全面發展的理想，只有到了馬克思主義這裡，才有實現的可能。因爲馬克思主義與以往的人道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找到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理想的現實依據和方法，即改變舊的社會關係，取消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以往人道主義者幻想在人奴役人的社會裡，靠「理性力量」、「泛愛」、「美育」等唯心主義說教，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那只能是一句空話。在這個意義上，不妨說，馬克思主義確實是現實的人道主義。

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經肯定地談到人道主義。不能否認，這個時期他還未完全擺脫黑格爾、費爾巴哈的錯誤影響。一八四五年以後，馬克思、恩

度本身來克服異化的。異化的根源並不在社會主義制度，而在我們的體制上和其他方面的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異化。現在進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將進行的整黨，就是爲了克服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異化。所以，我們的改革是具有深遠意義的。掌握馬克思關於「異化」的思想，對於推動和指導當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義。關於「異化」問題，理論界已經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討，希望這個探討能夠進一步深入下去。在這個問題上，也應當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和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

總的說來，社會主義社會，最有利於人的才能的發揮；社會主義社會新型的社會關係，使每個勞動者都可以平等地受到社會尊重。當然，即使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或由於某些制度不完善，或由於舊意識影響，在某些局部情況下，糟蹋人才，埋沒賢能，侵犯人格尊嚴的情況，並不是不會發生的。人的尊嚴、人的價值，理應受到重視。我們要教育青年建立科學的價值觀。把人的價值抽象化，用實現「人的價值」來裝扮自己的極端個人主義是不足取的。應該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創造性勞動中，爲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獻身的奮鬥中，實現人的價值，提高人的價值。

在當前偉大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配合全國各個領域改革工作的進行，研究異化問題，在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各個方面，採取正確區分兩類矛盾的方法，克服和消除異化現象，是當前理論和實踐的重要課題。



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周揚

編者按：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周揚要作「自我批評」，這是由於他在今年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時，於三月十六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長篇學術論文，其中對有爭議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了大膽的分析。這裏全文轉載的是文章的第四部分，小題原為「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

人道主義和與此相關的人性論，是關係到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文藝學等的重大理論問題。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是什麼關係？這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探索、研究的問題，也是我國學術界、文藝界近幾年來熱烈討論的一個問題。

需要對人的問題探討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們對人道主義與人的問題的研究，以及對有關文藝作品的評價，曾經走過一些彎路。這和當時的國際形勢的變化有關。那個時候，人性、人道主義，往往作為批判的對象，而不能作為科學研究和討論的對象。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我們一直把人道主義一概當作修正主義批判，認為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絕對不相容。這種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錯誤的。我過去發表的有關這方面的文章和講話，有些觀點是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一次次把對人性論、人道主義的批判，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為他們推行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義製造輿論根據。過去對人性論、人道主義的錯誤批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帶來了嚴重後果。這個教訓必須記取。粉碎「四人幫」後，人們迫切需要恢復人的尊嚴，提高人的價值，這是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否定，是完全應該的。

對人的問題的探討，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完整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許多年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側重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方面。在進行急風暴雨的革命鬥爭時期，我們當然需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正

的認識，也有過片斷唯物主義的見解，但總的說來，未能跳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的歷史唯心主義的框框。作為整個思想體系，未能成為科學。

我不贊成把馬克思主義納入人道主義的體系之中，不贊成把馬克思主義全部歸結為人道主義；但是，我們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包含着人道主義的。當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

在馬克思主義中，人佔有重要地位。馬克思主義是關心人，重視人的，是主張解放全人類的。當然，馬克思主義講的人是社會的人、現實的人、實踐的人；馬克思主義講的全人類解放，是通過無產階級解放的途徑的。馬克思把費爾巴哈講的生物的人、抽象的人變成了社會的人、實踐的人，從而既克服了費爾巴哈的直觀的唯物主義，並把它改造成實踐的唯物主義；又克服了費爾巴哈的以抽象的人性論為基礎的人道主義，並把它改造成為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現實的人道主義，或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異化」概念的改造起了關鍵的作用。

馬克思從未否定人道主義

所謂「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後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或支配主體本身。「異化」是一個辯證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唯心主義者可以用它，唯物主義者也可以用它。黑格爾說的「異化」，是指理念或精神的異化。費爾巴哈說的「異化」，是指抽象的人性的異化。馬克思講的「異化」，是現實的人的異化，主要是勞動的異化。關於「勞動異化」的思想，馬克思在「一八四

格斯都曾對「真正社會主義者」的人道主義囈語進行批判。在他們成熟時期的著作中，也確實不再用人道主義這個詞了，這些都是毋庸迴避的事實。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有一個發展過程，看不到馬克思早期著作與後來成熟時期著作的區別，是不正確的；但是，否認馬克思早期著作與後來成熟時期著作的聯繫，把兩者完全對立起來，認為後期馬克思從根本上拋棄了人道主義，也同樣是不正確的。即使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講的人道主義，也是和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不同的。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現實的、社會的、歷史發展的，這和他後來所講的有名命題「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直觀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是一致的。而費爾巴哈把人看成是抽象的，把人的本質看成是理性和愛。馬克思從費爾巴哈那裡吸取了一些東西，但並沒有停留在費爾巴哈的水平上，他超越了費爾巴哈；馬克思批判了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但從未根本上否定人道主義。後來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的創立，使馬克思的人道主義思想放在更科學的基礎上，而不是拋棄了人道主義思想。

社會主義異化客觀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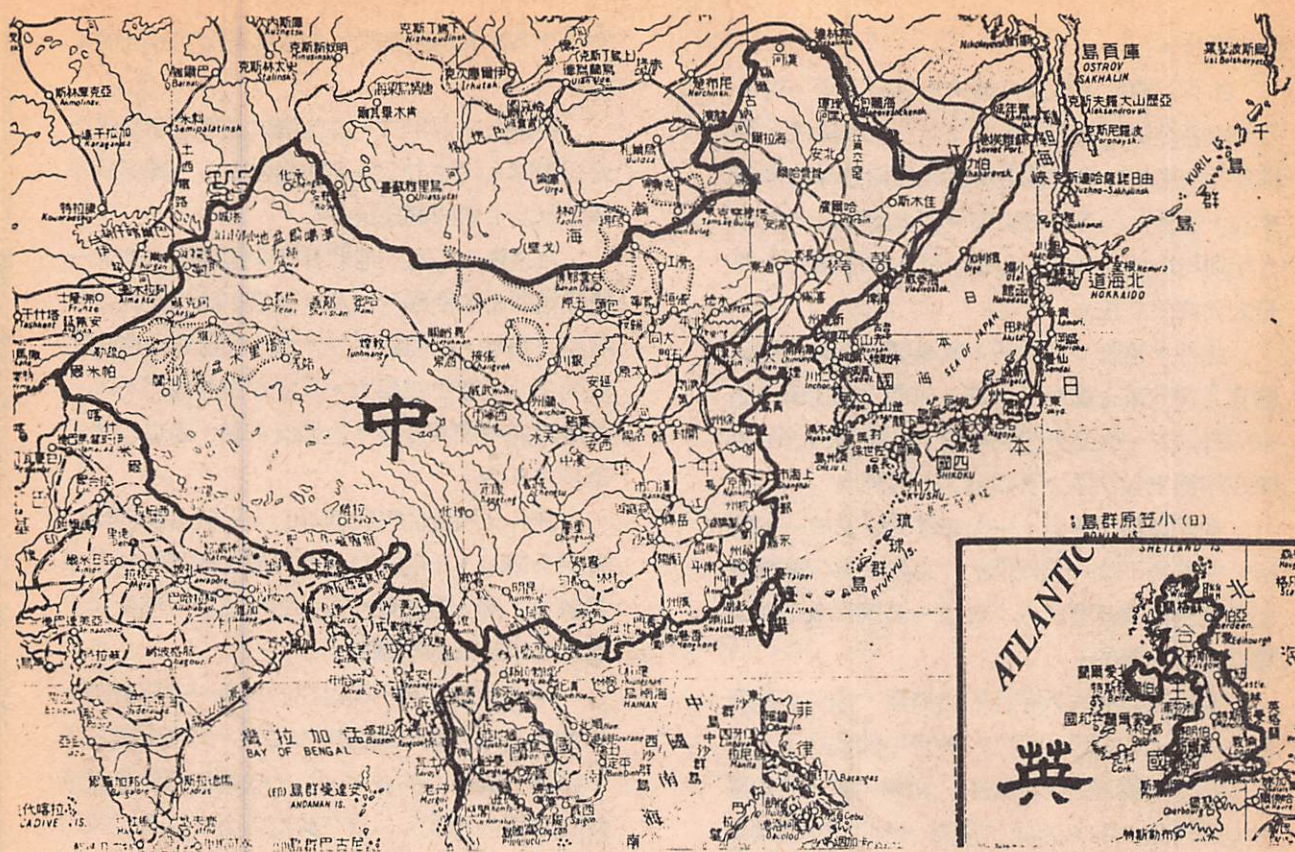
肯定人的價值，或者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那就要肯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異化。承認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和反對異化，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社會主義消滅了剝削，這就把異化的最重要的形式克服了。社會主義社會比之資本主義社會，有極大的優越性。但這並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任何異化了。在經濟建設中，由於我們沒有經驗，沒有認識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必然王國，過去就幹了不少蠢事，到頭來是我們自食其果，這就是經濟領域的異化。由於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會濫用人民賦與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叫權力的異化。至於思想領域的異化，最典型的就是個人崇拜，這和費爾巴哈批判的宗教異化有某種相似之處。所以，「異化」是客觀存在的現象，我們用不着對這個名詞大驚小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當不害怕承認現實。承認有異化，才能克服異化。自然，社會主義的異化，同資本主義的異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們也是完全能夠經過社會主義制



佛導黨

今年五月南京棲霞寺八十歲的志勤老和尚去世以後，寺內弟子要按師父遺囑，照佛門傳統習俗將遺體坐荷花缸火化寂圓。消息被南京宗教事務局得悉後，立即下達指示進行干涉；和尚的遺體也一律要送火葬場火化，不得與俗民有所區別。該寺和尚在苦苦求情而得不到允許的情況下，便偷偷將老和尚遺體運到山上坐缸火化了。這下可觸犯了黨的自尊和領導幹部的面子，於是，他們派人到寺中為和尚開會進行「教育」。嚴厲批評和尚們「無組織無紀律」、「目無領導」，要把當家和尚撤職，追究他的責任。一時鬧得當家和尚和死者胞妹幾乎自殺，搞得佛門聖地上下不得安寧。

實際中共又何必掛着個「宗教事務局」的招牌來監視、限制和尚的行動，不如乾脆在寺中建個黨支部，經常搞點「整風」之類的活動，再將「鄧小平文選」送給和尚人手一冊去代替「真經」，這樣一定會培養出「組織紀律性」和「對黨的深厚無產階級感情」。「宗教事務局」的當政者們然否？（民心·日本）



中英應停止對罵

原載：亞洲華爾街日報

作者：秦家聰（前亞洲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
現正撰寫一本有關中國大陸的書。）

譯者：秋長

一年前多一點，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中國領袖鄧小平同意說，兩國政府應舉行會議，以保證香港的安定與繁榮。

自此以後，港幣跌到空前低點，銀行和地產公司搖搖欲墜，瀕臨倒閉邊緣，股票市價直線下跌，通貨膨脹捲土重來。兩國政府即使聲稱有意地破壞香港的安定與繁榮，恐怕比現在也壞不了多少。

雙方均指責對方導致以下的病患。

英國方面說，香港經濟基本上健全的問題是

人們對中國缺乏信心。後者已宣佈將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

另一方面，中國則指責英國故意操縱外匯市場，使港幣匯率下跌，欲藉此迫使中國就範，由於中國賺得的外匯有相當一部分是港幣，港元幣值顯著下跌是北京的重大損失。

不論誰的說法有理，受害的是香港。香港人夾在兩個死對頭之間，敵對的每一方均顯然不顧及香港的後果如何，寧願堅守其立場。

北京和倫敦處理九七問題時，其實還可以多

用些策略。

就英方而言，從戴卓爾夫人方面來說，對中方的敏感性缺乏尊重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香港是英國用槍口對準國力薄弱兼腐敗的滿清奪過來的，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九龍半島的九十九年期租約於一九九七年期滿後，欲予續約，則是太天真的想法。

此外，也許不智的是，戴卓爾夫人和其他英國官員在此事上羞辱了中國。他們公開宣稱，北京的外匯有一大部分來自香港。亦即強烈暗示中國在經濟上無法失去英國治下的香港。

他們實應了解到，一旦牽涉到國家統一的問題，中國是不惜一切代價的。這就是為什麼總理趙紫陽告訴戴卓爾夫人，沒有一個國家爲了繁榮寧願放棄主權的。

最近戴卓爾夫人招待記者時說，如果不是因爲一九九七年期滿的租約，香港早就獨立了。這又引出了一場怒火。北京對「兩個中國」的敏感性是衆所週知的，因而在談論香港問題時提到獨立這個字眼就難免不招致北京對英國存有意圖的疑心。

中方如此敏感，以致當主管香港事務的英國內閣部長理察魯斯，將香港稱爲「國家」時，立即表示反對。

英國還指出（而且是相當正確地），香港人並不支持北京收回主權的要求。這也觸怒了中國。由於英國的這項椰榆，北京指使香港的左派工會代表熱衷於和祖國統一的言論。左派工會言聽計從。

香港的一般人當然知道，北京怎麼叫，左派工會就怎麼做。然而，由北京發號施令，然後把這些言論當作香港有代表性的民意，那就實在嚇人。他們擔心，這就是一九九七年以後治理香港的方式。

毫無疑問，絕大部分的香港人現在既不願意，一九九七年以後也不願意有任何重大的政治變化。這無非說，香港人願意繼續接受英國的殖民統治，而是因爲，他們對生活在一個極權的共產政府下這個想法感到害怕。

畢竟，香港的人大都是四十年代共產黨風捲

殘雲時逃離大陸的難民，或者就是這些難民的子女。

在過去三十年內，這些難民把香港建設成今天這個偉大的城市：亞洲的金融中心，國際貿易樞紐以及主要的製造業中心。

在這幾十年內，他們目睹中國經歷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的衝擊，以及以政策不斷反覆爲特徵的派系鬥爭。他們眼看着，爲了服從政治路線改變的需要，歷史被顛倒，事實被歪曲。他們將這一切歸因於中國共產黨，他們沒有錯，因爲中共的確是主事者。

此外，香港的居民還擔心，一個封建習俗仍未完全驅除，十億人口中有八成是農民的國家也許難以了解，治理像今天的香港這樣一個極其複雜社會所涉及的複雜性。

中國雖然自稱已從以往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小小的香港却經受不起任何的錯誤。只要走錯一步，這個名爲信心的弱不禁風的機構即可能受損至無從修復的程度。只有在具有信心，以及全球均對其具有信心下，香港才有可能繁榮。

香港的人並非懷疑中國的誠意——有些人是有懷疑，不過也有人是不懷疑。他們害怕的是，中國並不了解，使香港運行的是什麼。中國領導人曾指出上海的「繁榮」和深圳經濟特區的「成就」，這只有更加深這項憂慮。如果上海和深圳就是中國衡量繁榮的標準，那末香港的前途的確很黯淡。

這再加上，中國官員們說，香港大多數人是「愛國」的，以及所有真正的「愛國者」都希望香港早日與中國統一，就更疏遠了香港的華人。知識份子他們覺得自己的愛國心不亞於大陸上任何一個人，然而不願意將愛國與支持中國共產黨合而爲一。

不少香港的華人心情矛盾。他們不願意活在共產主義下，然而，他們的民族感情使得他們不願意表示寧願受英國統治。不過，若在兩者中被迫作一選擇，他們很可能認爲，受英國統治可能是兩害之中爲害較小者。

直到今日還不清楚中國是否已了解這點。在中國，往往很難區分宣傳與事實；有時候，甚至

會把宣傳當作事實。一講再講主觀願望使得中國的人很易於接受宣傳。

這是很危險的，因為由此所作出的決定可能並非基於實情。這種現象的一個可能的例子是北京最近慶祝國慶時一位高級官員所講的一句話。

這位官員是姬鵬飛，前任外交部長，照理應該是慣於根據事實而非幻想處事的人。可是他那次和外國記者們談話時，據說批評那些說是贊成中國收回香港治理權者並不佔香港人口的多數的人。「那些人都是說謊者。」

一個負責的外交官通常不會使用這樣強的語氣。這句話出自姬先生的口，尤其令人憂慮，因為他是北京的港澳辦公室主任。一個擔任他這份職務的人對香港的了解理應較他這句口沒遮攔的話所示為多。

如果姬先生真的相信，香港的人正如中國宣傳所說的，對北京治理香港迫不及待他的孤陋寡聞實已到了不稱職的地步。如果他並非真心相信這項說法，而只是故意做給英國人看的，那末他亦犯了欺誑之罪。不管真相如何，結果都是更削弱了香港人對北京的信心。

為了使香港獲得真正的安定與繁榮，中國和英國均應停止對罵當作一個政治表態，受害的總是香港人。中國應該對香港人作出保證，他們的生活方式、自由、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均將保持不變。

這類保證應該較籠統的一般性保證為具體。必須在憲法內和以其他方式明文規定，英國人退出後，北京將不會干涉香港的事務。並且使這項保證制度化。

英國一方則有責任訓練香港人迎接未來的自治政府。他們遲早是要退出的。如果他們留下權力真空的局面，北京就不得不介入以防止出現混亂。

應逐步建立一個具有民主形式的政府，而且事不宜遲。英國人所可以留下的最佳遺產就是一個有能力在中國的主權下實行自治的井井有條的社會。在北京和倫敦的合作下，香港是可以繼續繁榮，使每個有關的人都受益的。

姓名：英文
NAME
地址：
ADDRESS

中文

零售：每本 1.50
訂閱：（每六期計算）
普通訂戶：9.00
學生訂戶：7.00
贊助訂戶：30.00 以上
學校機構：30.00
海外訂戶另加郵資
航空：12.00
平郵：4.80

支票請寄：CHINA SPRING

（美國）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定價（零售） 美國：1.50 美元 加拿大：2.00 加元 香港：4.00 港元

評習仲勳關於 香港的談話

—— 徐 煊 ——

讀了「爭鳴」刊載的「北京的權威性回答——習仲勳就香港各界青年團反映的意見向該團發表的談話」一文，似乎中共當局無論英國同意與否，都要收回香港、九龍和新界主權，談話中習仲勳首先申明：

「我將要說的話——並非是我自己的意見，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接着又說：

「去年九月，撒切爾夫人談這個問題時，所用的話選擇得並不好，特別是提及三個不平等條約，包括香港、九龍和新界，這是中英在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到了八十年代，這個問題應該是解決的時候。如果我們不提出解決這個問題，英國人如果是明智，都應該主動提出。難道要把香港保持為殖民地？當香港的中國人是什麼人？鄧小平和趙總理去年九月跟撒切爾夫人談得很清楚，主權問題十分明確，主權問題沒得談判。過去中國在什麼情況下訂立這些條約？是在鴉片戰爭，完全是不平等的條約。

鄧小平說得很清楚，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問題，我們的政府就是清政府，而我們就是李鴻章。你們同意嗎？（會場中沒有人不同意）沒有中國人會反對這一點，開明的外國人也不會反對。」

作為一個中國籍的中國人，我反對習仲勳的說法；他說沒有中國人反對這一點，這是武斷的。反對的理由是習仲勳的這段談話內容選擇不當。

不錯，中英南京條約是在大英帝國武力脅迫之下，大清帝國被迫簽署的喪權辱國條約。這項條約記載着滿清王朝腐敗昏庸的恥辱，但是這一恥辱不屬於推翻清朝統治的中國後一時代的政權即中華民國政權，更不屬於一九四九年才取得中國大陸地區統治權的中共政權。南京條約不僅是歷史上的中國政府恥辱的記錄，也是歷史上的英國政府進行無恥的骯髒的侵略的記錄。但是當年以保護販毒活動為藉口發動侵華戰爭的英國政府不等於當今的英國政府，當年發動鴉片戰爭的侵略者的恥辱顯然也就不



屬於當今的英國政府。南京條約雖是腐敗無能的戰敗者的恥辱，也決非不正義的戰勝者的光榮，歷史的恥辱與當今明智的中英政府之間，不存在繼承關係。

鴉片戰爭和隨之而來的三項中英條約改變了中英兩國的版圖，香港島和南九龍半島由大清政府割給了英國；新界地區以一九九七年為期租給了英國這是歷史的事實。既然條約上寫得明白，有中英兩國當時的合法政府的簽署，這就是事實（fact），而不是習仲勳所謂的問題（problem）。

中共當局要把明明白白天下皆知的事實說成是問題，然後又說：「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問題，我們的政府就是清政府，而我們就是李鴻章。」這就成了自尋煩惱，中國人未必儘然贊同。

香港及九龍半島是中國在歷史上長期擁有過，但是後來又喪失了的領土；是失土而不是目前中國仍然享有主權的領土，這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同樣，新界的從來主權屬於中國，只是暫時地租給了英國人這也應該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人不可以無條件地對過去的失土提出主權要求；其它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也都不可以這樣做。這道理很顯然，在人類歷史上各民族各國家之間曾經就領土主權進行過長期不斷的紛爭，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土範圍在歷史上都不是固定不變的。如果現代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宣稱某一個民族某一個國家有權無條件地恢復這個國家在某個歷史時期的疆域範圍，把歷史的既成事實當作今天的問題，按照這些政治家或者這些政治家所能代表的民族和國家的主觀願望去謀求解決，這是給人類出難題，其結果往往導致新的民族糾紛，甚至戰爭，給人類造成災難。

以中國近代歷史為例：中國現在的新疆省和西藏地區在明朝時代是長期獨立於明帝國之外的，但是到了清帝國時代就被兼併侵吞，納入清朝疆土；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曾經是清帝國的一部份；現今蘇

聯海參威一帶大片國土是清朝統治民族滿族人的故鄉。

如果中國現今的政治家主張中國人有權利和義務恢復大清帝國失土之主權，就等於對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等等國家提出主權要求；如果中國的漢族政治家主張按大清帝國強盛時期的版圖來確定現今中國的疆域，那麼中國的另外一些漢族和非漢族的政治家就可以類似的理由要求按中國歷史上其它朝代的形勢建立一系列并存的中華國家。由此一來中國跟鄰國的領土紛爭就失去了解決問題基礎；比如越南的政治家就可以說既然中國人可以要求按清朝強盛時期的版圖收回失土主權，我們越南人為什麼不可以收回秦始皇當年強占去的江山呢？由此一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各自提出的統一中國的理論也都是失去了基礎。西藏獨立、台灣獨立等等政治主張就因收復失土主權的理論的成立同時取得合理性，因為西藏和台灣都曾經是主權國家。

根據上述理由顯而易見在處理國際關係的事務中，尊重歷史事實，不承認前朝失土主權是必然要遵循的原則。這個原則跟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以及中共前總理周恩來參與制定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該是不相衝突，並且是同理呼應的。」尊重領土主權就不能承認失土主權。

話題又說回來，香港、九龍半島目前由英國擁有并且有效地行使着的主權可不可能發生變易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在下列兩種情況下都可能發生主權的變易：第一，其它國家以戰爭或非戰爭手段迫使英國放棄港九主權。第二是港九居民以公民投票方式表示多數人意願脫離英國，並且此項意願獲得英國國會的認可。

如果出現第一種情況改變香港主權，必然首先毀滅香港的繁榮；毀掉香港這座溝通東西方文化的橋樑；毀掉這個亞洲太平洋地區金融和商業貿易的中心。這是中英兩國的政府和人民都不能答應的，也是日本、美國、澳洲、西歐以及阿拉伯等許多在香港有投資的國家所反對的。在目前這種國際環境下，這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將來出現第二種情況使英國放棄港九主權，其前提之一必然是香港居民已經有能力建立更有效率的民選政府，以取代英國委任的非民選政府。前提之二是香港居民已經制定出一套比現行法律更加完善的法律。前提之三是香港居民已經享受到了遠高於目前的繁榮，并且對前途充滿信心。前提之四是香港居民確信脫離英國之後港人治港、港法治港有着安全的國際環境。

在以上四項基本前提之下實現港九主權轉易中英雙方都應該感到光榮，因為上述四項前提的實現

，必然是中英港兩國三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習仲勳接着又說：「香港的主權問題並不是先決條件，主權沒得談判，主權問題有什麼好談？香港是你們的家，但也是中國的一部份，不光是今天，永遠是這樣。大家都是中國同胞，這點是毫無疑問。」

習仲勳講的這段話，前後自相矛盾，不僅疑點甚多，而且有點像趙高當年那樣指鹿為馬。既然承認香港的主權問題不是先決條件，主權沒得談判，怎麼可以又馬上接着說「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份，不光是今天，永遠會是這樣。」呢？且不說永遠，永遠時間太長筆者不敢判斷，我們只說今天。今天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嗎？香港掛着英國的國旗而不是中華民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由英國任命的政府而不是中華民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委任的地方政府統治着，習仲勳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不光是今天」有起碼的事實根據嗎？

習仲勳所謂「大家都是中國同胞」，如果「大家」二字僅僅指習仲勳本人和李鵬飛為首訪問團，那或許是對的；如果「大家」二字包括所有取得香港永久居住權的人士，就未必儘是中國同胞。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士之中就有華籍華人、英籍華人、英籍英人、英籍巴基斯坦人、新加坡人等等繁多種類，不一列舉，試問香港人都是中國同胞嗎？

自李唐帝國崩潰之後中華民族建立的國家，國勢一代不如一代，中國同胞這個名詞在世界上如今并不怎麼吃香，身為中國人似應對中國內政外交多作反省，與其勉強地向香港人派發中國同胞這個頭銜，何如徹帶自珍省下些氣力去整理那歷經浩劫的敗宇頹垣？

所謂「我們不解決這問題，我們的政府就是清政府，而我們就是李鴻章。」這種煞有介事的執心是多餘的。中共政府與清政府區別實在太明顯，試列幾點對比如下：

甲、大清帝國政府跟世界各國打交道時以中國中央政府資格出現，中國境內沒有第二個政府與清朝分庭抗禮。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中共政府只是中國境內兩個對立的政權之一，目前中共將台灣省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特區的努力尚未成功，中華民國剿匪亂的光復大業亦正在努力，中共目前雖然控制着中國的絕大部份國土，但是內戰狀態尚未結束，鹿死誰手尚無定論。任何中國人只要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完全取代中華民國，就只能將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個政府都看作是中國的地方政府。

乙、清王朝政府受命於天，皇帝是真命天子，家族獨裁，帝業傳於子孫。

中共政權受命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是馬列冊封的先鋒隊，一黨專政，現在第一代的中共官僚無法放心將全權移交給第二代中共官僚。

丙、清王朝控制下的中央集權政府在政治上專權，但是許可士農工商各界人民百姓私有財產，糧食無定量配給，人民各自謀生求業，城鄉人口遷居流動不受政府管制。

中共政府壟斷工業、農業、交通、商業（目前商業上略有改變）、教育、文化出版以及新聞事業。人民食多少飯、如何嫁娶、何時生孩子都由政府統籌管制。人民沒有飯吃可以直接上書最高統治者，例如福建省窮教員李慶霖供養不起年青力壯的知識青年兒子，就由毛澤東主席恩賜人民幣三百大元，聊補無米之炊。（但是上書行為本身有不軌之嫌，故旋遭拘控判刑。）又如北京城的女孩子李爽未經鄧小平批准私自以身許配洋人，即被警察抓入勞改營。

丁、清政府以強權統治各族人民，但是不管制人民衣食住行等民生基本問題，人民不滿意政府之時就以暴力求推翻政府，故前有太平天國、捻軍、白蓮教之造反，後有孫中山黃興之革命。

中共不僅以政治之專權更復以經濟文化之壟斷控制人民，故人民離開中共政權無處吃飯；四川農民過去貼的春聯是「翻身不忘毛主席，吃飯不忘周恩來。」「四人幫」倒台之後，有民謠稱「要吃糧，找（與趙字同音）紫陽。」當時趙紫陽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中共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寫入憲法，令萬民遵循，故五七年的右派份子在鄧小平青天恩准之下，只稱錯划而摘帽子，不得否定反右本身之合法性。於是鼓吹中國應該把政治現代化列為第五個現代化之魏京生，炮制李一哲大字報的民間馬克思主義者王希哲，以及宣稱放棄醫業獻身中國民主運動之中國留學生均因與法定指導思想衝突而順理成章地成爲刑事犯。

由於中共政權之專制遠比清政府深入而且全面，因而在一九六〇年大陸水腫病大大流行，千里赤地，餓殍遍野的大災難之中人民依然溫馴服貼，不敢生洪秀全、楊秀清等人的非份之想；在一九六六年之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大動亂之中人們奉毛澤東之命造反，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就是後來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人民聚眾鬧事，連毛澤東也要反了，但是人們的口號是「我們懷念周總理」，沒有人敢說共產黨的不是。

中共政權鎮壓人民效率之高決非清政府可比。

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清初是帝國主義擴張

政策，中期是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到了李鴻章時代是「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賣國政策。清政府交出大量金錢和國家領土主權予英俄德法日美意列強以求苟延殘喘，清政府賣國是被迫的、不得已的。清帝國既以天下爲私有家產，就沒理由高高興興地將自家的財產白白送予他國。

中共政府實行的是革命外交政策，服從於中共的世界革命目標，交好在意識形態上與之接近的政權與國家；疏遠在意識形態上與之相反的國家。由於中共意識形態忽左忽右飄移不定，故中共政權在世界上沒有幾個關係牢靠的盟友，中共政府在外交上付出的代價是巨量的金錢和人民的鮮血生命。在國力和國際環境上中共無力進行清初那種領土擴張，但是爲了轉移人民對其內政之不滿中共以不平等條約爲理由對失土提出主權要求，跟蘇聯的邊界紛爭長期無法解決。中共到處支持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極權政府，如出兵支持北朝鮮反對南朝鮮、支持北越兼併南越、支持印尼共產黨奪取政權、支持古巴卡斯特羅政權、支持阿爾巴尼亞霍查政權、支持非洲的埃塞俄比亞皇朝、支持東埔寨波爾布特政權；如果說清政府以國家的資源換取王朝的安全的話，中共却是以犧牲中華的子女玉帛去與他國結仇。在朝鮮戰場上中共以百萬中國士兵的傷亡和巨額軍事開支所欠下的外債爲代價，換取南朝鮮人民的仇恨和聯合國的譴責；中共以巨額物資援助越共，然後再以中越邊境戰爭使「同志加兄弟」變爲仇敵；中共援助阿爾巴尼亞與蘇共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正統，最後換得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霍查同志一頓臭罵。中共將國家資源交予友邦時表情不像清政府那樣悲慘；中共的表情是慷慨激昂的，甚至是神聖的。中共外交失措，四面樹敵，因此背上沉重的防務負擔。

從上面五條對比來看，中共政府與大清帝國政府區別之點實在太明顯，怎麼也不會混爲一談。中國人沒有理由因爲中共政權沒有收取香港主權就將其看作是清政府。中國人民並沒有公舉鄧小平政府去跟英國政府商談改變港九主權；也沒有公舉鄧小平政府去跟英國政府商討新界租約期滿後的問題。過去中共政權在跟印度進行邊界爭論的時候，不是宣佈過不承認西藏地方政府跟英國人簽定的條約嗎？如果中共果真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那麼就得承認中共只是統治着中國大陸地區的地方政府，就不得像當年西藏地方政府那樣背着全體中國人民跟英國政府作秘密交易。在中國尚處於內戰局面的情況下，英國人即使主動將港九主權移交中共，也不是對中國人民友好的表現。

旅美雜感

· 王魯生 ·

人民日報吹牛

報紙的責任是向讀者報導事實。

前些時「人民日報」評論員在評論香港問題時說：「十億中國人民包括五百萬香港同胞，堅決要求香港歸還中國，要維持香港的繁榮與安定，而且對此充滿信心，這才是最大的民意。」

這位「人民日報」評論員假如不是夢囈就是發高燒，說出來的話全是胡言亂語。大家都知道香港市民多數是躲避共產黨才來到香港的，我們實在找不出「五百萬香港同胞堅決要求香港歸還中國」的根據。

再以十億中國人民來說，他們也不一定堅決要求香港歸還中國。這一點可以由他們不斷地冒了生命危險向香港逃亡得到證明。

豈止中央研究院

在吳大猷先生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長前，美國的中國時報及世界日報上不斷有旅美院士發表談話，對中研院新院長的人選提出建議。首先是二十位院士聯名寫信給有關當局，然後是李卓皓博士發表談話。他們共同的要求是：中研院為學術機構，院長要具有真正學術地位，不可由有政治色彩者擔任。

台灣的學術機構豈止中央研究院？其他不論，至少所有的大專院校也應該算是學術機構。筆者認為所有的校長、院長和系主任都應該以學術成就為優先條件，不可當成政治的犒賞品。但試問今天台灣的公立大專院校各級首腦誰沒有政治背景及裙帶關係？

據說閻振贏教授在一次大專首腦集會中說：「大專校長沒有一個夠資格。」此語一出，震驚四座，各大專校長立刻怒目而視。從此以後，大家便把他當成仇敵，拒絕與之來往。

各大專校長何必生氣？深心捫心自問一番，就知道他這話是真是假了。

要減少人口應先使老有所養

中國人是很愛國的，每人都知道「增產報國」

。其結果是中國人擠滿了自己的國土，假如不立刻加以控制，一百年後大家便無立足之地。

中國人繁殖快速的原因眾多，如其他娛樂的缺少，傳統觀念的牢不可破，及性慾高強等等；但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是恐懼——對老年生活的恐懼。

因為怕年老後無人奉養，所以大家便「養兒防老」；又因為生兒育女就像買獎券，不一定全都長大、成才、與孝順，所以大家便實行「多買多中」政策。

反觀美國，你就知道他們的人口近來不斷下降。下降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個是他們的社會安全福利制度，這一制度使美國人在老年後無飢寒之憂，所以大家不必為擔心老年而生育。

養老制度可說是一舉兩得：一方面解決了老年人所引起的社會問題；一方面解決了人口問題。希望中國的當政者大力推行。

年老無助是一個現實問題，政府必須負責解決。一個主張節育而不推行老人福利的政府一定是個冷酷無情的政府。

請多送行將上任的行政首長到歐美考察

我們不必否認，中國與歐美先進國家相比是顯得貧窮與落伍的；為了消滅貧窮與落伍，所以很久以來中國就不斷送留學生到歐美學習。

派留學生出國學習當然重要，但筆者認為如能把行將上任的政府首長送到歐美學習則更重要。因為歐美的優點現在已經不僅是船堅炮利，他們在政治上有很多優點，祇有親身體驗者才能覺察出這些優點所在。

中國人經常吹牛說：「西洋的物質文明，中國的精神文明。」但由近代各政治首領的表現來說，却適得其反；精神文明最基本的兩點應該是人權與自由，以這兩點為衡量標準，中國近代政治首領都繳了白卷，每天處心積慮地來剷除異己，永遠用慘酷的手段來對待自己的人民的首領絕對談不上「精神文明」。

我們希望共產黨及國民黨經常把接班人送到歐美做長久考察，讓他們看看歐美社會及人民生活的情形。

坐井觀天經常使人感到自得自滿，自以為自己是最好的皇帝。只有看看別人的進步，才能使這些首長感到自己也有不足之處。



回國探親記



江心

今年的初夏，外子做工的餐館關了門，我提議他回大陸旅遊，他因為三十幾年沒回去過，立刻答應了我。

在香港大哥家裡住，順問大哥大嫂有沒有興趣一起去大陸，大嫂說去廣東廣西去得多了，倒想跟我們去華北地區開開眼界。我提議不跟旅行團去，跟了旅行團就看不到想看的東西了。他們都同意這個看法。

先到香港中旅社詢問，有沒有可能自己坐火車到全國各地遊覽。他們說可以，只要一到了目的地就立刻預訂下一程的車票就行了。

我們先計劃好，第一程直到北京，然後是遼寧、西安、重慶，沿長江東下蘇杭。

大哥笑着問我：你要到山西是否想學大寨？」

「香港聖誕節那棵大杉樹是從山西運來的。我想看看山西省是否交通很方便？農村是否機械化？中共爲了搞統戰，討好香港的大富翁。這樣千里迢迢橫跨整個中國運一棵大樹來香港，爲了點綴一下『繁榮』，政府這個做法是否勞民傷財？如此而已。」

中旅社給我們訂的京廣車票是十四天之後才有，而且去廣州這一段車票，因爲大哥大嫂不是外僑，無論如何也不給我們『直通』票。

反正要等兩個星期，我和外子就利用這個空檔先回鄉，因爲我們是外僑，一下子就拿到兩張『直通』票。這樣等級分明，我真不知道『中國人』是怎樣容忍的？

我們是華僑，當然又給安排住在華僑大廈。吃晚飯時，看着餐牌要菜，要什麼都說『沒有』。我就提議到二樓潮州廳去買滴水鵝。買了一碟大的，收費十二塊五毛。晚飯後，街上仍是大白天，我們在旅館門外溜達。看到很多本地人向旅客兌換人民幣，每百元港幣，多換上十塊人民幣。他們說『要

多少有多少』。我們在海關已換了兩千塊外匯票，所以沒有要。外子覺得驚訝問我：『他們要那麼多港幣幹什麼呢？也不怕抓去坐牢？』

「走私呀！當然有大人物在包庇才敢幹啦。你看他們拿出來的鈔票數量，跟他們的衣着相配嗎？滿街的人都看得到，難道公安人員全是瞎子？」

走着走着，過了解放北路，那兒路燈很暗，路兩旁的屋子外，又加搭了很多用破木板和竹板造成的居所。大樹下也有塗了脂粉的女人向過路的男人搭訕。我看形勢不對，拉了外子往回跑。心裡一下着急起來就想找計程車，但是沿路張望也看不到計程車的影子。匆匆逃回了華僑大廈。

三樓有夜總會，安裝了震耳欲聾的擴音機，唱歌的人也好像叫到聲嘶力竭，張大喉嚨在叫唱着香港的流行曲。直到午夜十二點才停止，旅館的住客簡直在受罪。

交通很混亂，道路的三份二是腳踏車佔去了，剩下的三份一是汽車佔用。對開的汽車都走中間綫，險象環生，外子驚訝問司機：『你們開汽車也真不容易，沒有交通規則的嗎？』

「這種事沒有人管的，如果有人說一句打倒共產黨，立刻就有人管了！」

「我們在外面的交通例管得很嚴。」

「外面的世界當然跟這裡的世界不同啦，如果能够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短十年命也願意。」

公路兩旁已看不見過去那些語錄牌、大標語了，代之而起的是商業廣告。驟眼看來，這倒很像資本主義的社會。

道路仍是破爛不堪，路旁也有翻倒在田邊的貨車。我們到香港的第一天，就去醫院探望一個親戚。他是清明回鄉掃墓，在公共巴士上給拋斷了脊椎骨。我曾開玩笑對他說：『如果在美國出了這種事，你可以控告公路局賠幾千萬！』

我們鎮上一下子新建了好幾幢大樓，道路兩旁也滿是小販攤子。我差點不認得路回家。

我的弟弟已經不久前出國，表叔來住了我們的屋子，看見我和外子回來，高興不已。我回來的消息也一下子傳開了。很多鄰人和同學來坐，他們也好奇想看看我這個「新女婿」。

我告訴他們，這次回來想見見解放後沒見過的同學和老師。他們告訴我，關同學最近才去了香港，這是他的丈夫捐了十萬塊港幣弄他出去的。他們設法給我找到了那些我想找的親友、同學的地址。

一知道能找到我唸書時的童子軍教練——我唯一能見到的老師時，我就急不及待，拉了外子飛奔而去找他。正巧他在家，坐在門口的小木櫥洗鞋子的泥巴。我出其不意站在他前面立正行了一個童軍禮。他有點措手不及，怔怔望住我老半晌，「是誰啊？」

我報上了名字，他才驚喜無限說：「不認得了！」

我們相對都有點熱淚盈眶。我介紹了外子與他認識。我說：「你過去是高頭大馬的，怎麼現在矮了？」

「我老了！六十五了。你以前沒長大，就覺得我高嘍。唉！過去真是不堪回首！」

「喂！我們現在趕着到別的地方去，晚上來找你慢慢談。別出去嘍！」我知道他一定有很多話想傾吐。

「好的。好的。來吃飯吧！」

「不必客氣了。」放下這一句，我和外子又回到家。

表叔帶着我們在鎮上巡視一番。在路上看到一個普通人騎着摩托單車。表叔說，要付兩千塊港幣才准考駕駛執照。表叔又指着一幢新建的大樓說，這是有冷氣房間的旅館，房租與東方賓館相近，是供海外僑胞和出差高幹入住的。他又指給我們看那幾幢新建的住宅大樓。分層出售，每個單位四萬塊港幣。

外子覺得奇怪，問他：「為什麼中國地方，開口閉口都說港幣？」

「我們中國是這樣了。總之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人民最好不要過問。唉！其實這些樓宇都是租給幹部居住的，房租很便宜。你們想住啊？出得起四萬塊港幣嗎？」

鎮上有百貨商場，裡頭有不冷藏的美國罐裝可口可樂，英美出品香烟、肥皂出售，但是要憑外匯票才能買到。路邊小攤販，却也有同樣貨色出售。但是標價貴得厲害。

外子不免又問：「為什麼這些不用外匯票又可

以買呢？」

我悄悄在他耳邊說：「這是私貨嘛！所以廣州市這麼多人收購港幣。」

去到郊外，在一個碼頭附近，表叔指給我們看：「那是家海鮮餐館，其實裡頭賣的都是臭魚臭肉，專門欺騙過路的旅客和華僑。那些巴士司機和守關員，帶了旅客進去吃飯，他們自己吃多少都不用付錢，吃完了臨走還拿走香烟和汽水。你們回台山，路上小心上當才好。」

晚上電燈倒已有了。但在晚飯時間時明時滅，表叔說，那些有海外親人回來的，一窩蜂用電飯鍋，因為電源不足，他們常常吃半生不熟的飯。

路燈仍沒有，我們帶了手電筒去老師的家。

老師家裡，有師母和他們兩個已近中年的兒子。還有一個我不認識的黃老師。教練老師給我們介紹認識了。

談起過去事，他們一籬筐的倒出來，他們越說越激動。教練說，我們的校長和國文老師，都在一九五八年拉去北大荒勞改，死在那裡。他說自己沒有去，真是奇跡。

黃老師舉起一雙顫抖的手給我們看：「你們看，我瘦成這個樣子，都是給鬥爭折騰造成的。」

「你犯了什麼罪？」外子問。

「他們說，家父和我都是中山大學畢業，一定是國民黨人。我說如果是國民黨，我們早就逃走了。但是他們不相信我說的話，硬逼着我承認。我鬥得過他們嗎？爲了免受太多刑辱，我把心一橫認了。他們把我收押起來，逼我交代。他們調查了一段長時間，又再次審問我，說經過調查我不是國民黨，爲什麼要冒認。你們說呀！有沒有見過這樣野蠻的政府！既然判錯案，就應該放人了，還審什麼呢？哼！這一次，我一句話也不說，以沉默作抗議。他們拿我沒辦法，不了了之把我放了。但是找無辜被鬥，身心所受的傷害，政府能夠補償給我嗎？」他說到聲音高昂，雙手不停地震顫。

「我們在外面看報紙，常常看到什麼工宣隊、軍人進駐學校之類的報導，實在是怎回事？」外子又問。

「政府派了軍人或者工人到學校管行政嘍！我們當老師的靠邊站，一切事得聽他們的。他們指我們行就行，站就站。」

「慘！難怪這十多年，大陸出去的人被人叫作（大圈仔）。那些老粗怎懂得教育青年孩子？」

「哼！那些老粗態度傲慢得離譜！」教練說：「一天到晚坐到那裡抽烟，專門做雞蛋裡挑骨頭的事，找着我們一點的渣子，向上頭報告，我們就大禍臨頭了。」

「唉！做大陸人真不容易。」我搖頭。

「喂！」教練忽然想起來問我。「你逃得真快，連你什麼時候走我也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嘛。那時候呀，你們都去廣州市（學習）回來，你們是滿腦子的主觀理論。而我們呢，包括那些做小生意的人，我們不懂理論，我們只憑客觀的現實，覺得不好就是不好，無法生存下去就走嘍！那時候的報紙，滿是唯心論唯物論，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忽然有人敲門，師母問清楚了誰開了門，進來的是弟弟的同學。小時候我是認識他的，後來他長大了我不認得他了。他進來說，是表叔告訴他我們在這裡。

我問師母：「我們在這裡大聲談話，會不會有問題？」

師母說：「不用怕。這裡的人我們是熟悉的，大家同聲同氣，平常都習慣了偷偷地罵。」

弟弟的同學到來也是向我們吐苦水。他說：「你弟弟出去的時候，我仍是熱心愛國的，當時我不同情他們出國。過去我是狂熱地崇拜毛主席和共產黨，但是這兩年，我變得很厲害！」

「前一次回來，我也相信老鄧是個好領導。」我打岔了他的話。

「經過這兩三年的觀察，我失望了。當初滿以為打倒四人幫後，鄧小平會剷草除根，把國家來一次大革新。使以後會一切好轉。誰知，只是失望了一次漫長的過去，又再失望到現在。我們是失望到底了！」

「唉！沒辦法啦！誰叫我們是中國人？慢慢等吧！」我不知找什麼話來安慰他們好。

「我的一生都過去一大半了。在鄉村當了十多護士，想要求調去廣州市多學習一點知識，都是不批就是不批。」

「這一代不好，希望下一代好吧！」

「下一代會好？我們現在已經兩代不好了。中國如果不改，再過三代都不會好！」教練說。

「我們想好。最好的辦法就是逃出去。逃出去賺到錢，人家會把我當菩薩拜了。我真想逃。」

「你這次回來看見，覺得比早幾年好很多哩？」教練以詢問的眼光看我。「外面好像很繁榮。你知不知道這繁榮底下有多少見不得光的骯髒事！」

談着不覺夜深。我們告辭回去。他們一路送我們。教練撫着我的背說：「叫同學們回來看看我們。我們不能出去啊！」

第二天大早，一個當幹部的親戚，硬要拉我們去他家裡吃飯。他們一家四口，三個人當幹部，住在新建的樓宇裡，而且佔住着兩個對開門口的單位

。他們的職位不低，出差都有小汽車坐的。

他們的家全套新沙發。有七彩電視機和全副音響，有吊電扇。有通花窗簾。雖然仍有美中不足，但已經看出來是拼命向資本主義看齊了。

飯後，他們全家圍着我和外子詢問：台灣和美國是怎樣的。又問我們，外面的選舉制度是怎樣的，是否真的言行一致？外子都一一據實相告了。最後，他們說，希望我們能把他的小兒子弄到美國去。我告訴他們，我們不是直系親屬，沒有這個可能。他又說，可不可以介紹個女孩子給他兒子。我說：「你們環境這麼好，出去幹什麼呢？」

他說：「有很多事你們不知道的。我希望兩個兒子都到外面去，我們兩老怎麼樣也無所謂了。」言外之意，不難想像得到。

搭不到回台山的直通車，在台城轉車時，外子去擠車票，我守着兩大袋行李。忽然闖來兩個青年人，不由分說各自拉了我的行李往外走。一個向左，一個向右，我左右兩手死拉着不放。他們說替我抬行李，我說不要。糾纏間，外子回來了，他們才走了。

記得香港一個鄰居對我說過，他回中山鄉下，在巴士站遇到十幾個人向他圍攻，說懷疑他檢了他的手表要搜查他的手袋。因為他態度強硬才免於被搶。我也把剛才的事對外子說了，嚇得他捏一把汗。

因為外子離鄉三十幾年，這一次回來也引來了一屋子的人，也請了一次客。

飯後那些農人又來圍着我們，猛抽美國烟。一個農人問我：「呀嫂，上次回來，跟現在有沒有不同？」

「有很大的不同。哪！有電燈了，可惜仍是時明時滅。我一路回來，留心看到公路兩旁，連樹陰下，連毛坑邊，都種滿了菜和果樹。因為包產到戶，所以吃的飯沒有沙子和草籽了。」

「為什麼呢？」

「過去一切歸公，你們懶得打理，讓禾田裡生滿了什草，說不定打谷的時候，狠狠地撒幾把沙子下去。」

「哈哈！不得了，給你穿穿了我們心裡的事。還有沒有什麼不同呀？」

「還有，很少說粗話了，因為有飯吃，心情好了。人民的衣服好了，很少破衣襤褸。」

談着談着，有人說鄉村風水不好。又說請風水先生看過，請巫婆看過，都說不好。要把村子拆建才好。

我說：「好吧。建設鄉村改善教育，我們是很樂意捐錢的。最好不要講迷信。人家都在太空造城

市了，你們新中國的人却在宣揚迷信，有沒有搞錯呀？』

外子在背後扯我一把。

上到樓上就寢之前，我仍是難免嘀咕：『真奇怪！回來鄉下到處都在講神說鬼。共產黨一切都是開倒車的！』

『發什麼牢騷啊？有膽去北京對鄧小平講……』

外子這次回來，有心想看看整個台山，於是找人用腳踏車載我們去遊覽。那個來我家跑腿的青年人阿牛，爭着要載我，另外一個親戚載了外子。

我看見阿牛一身整潔的陸軍制服，我問他：『牛叔，你是不是退伍軍人呀？』

『是，前年退伍的。前次你回來沒有看見我。』

『做軍人好光榮，福利又好。哪！你家門楣上是光榮軍屬。然後兩旁的對聯是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

『你怎麼知道的？』

『過去我常常回來的，最後一次回來，你或者才穿開襠褲子。』

『好什麼呀？初入伍，每個月七塊，到退伍才加到十五塊，想寄錢給父母，不用想了。』

『退伍之後肯定很多福利的！』

『回鄉落戶嘍！又是耕田仔一個。連間屋子都沒有，住在父親的破屋裡，想娶老婆也沒人肯嫁我。』

『你父親曾經去過香港的。』

『這才蠢得可憐呢！他說自己是貧僱農，所以從香港走回來。否則現在一定去了美國。他們這麼多人搞難民紙去了！』

我們回來在廣州海關調換的外匯票，全是五十元的大鈔。後來用這些大鈔在鎮上買東西，小販們都說不要，所以我們都把外匯票找人拿去換成人民幣，還多換了幾百塊美金的人民幣。

回廣州時，預算帶着一二百塊人民幣够支消了，把餘錢都分贈給村裡的親友。

在華僑大廈吃晚飯，我又上二樓買了一大碟滷水鵝。但是這次服務生却收我六塊五毛。我再問這是不是大的，服務生說，最大的就是六塊五毛。

嘿嘿！前後才一個星期，前次那個服務生也貪污得厲害！

吃完飯付錢，他們不收人民幣。我說：『中國地方不用人民幣，請問那裡才用？』

他說：『就是這樣了。不要就是不要。』

『如果我身上沒有外幣了，那怎辦？』

『你自己想辦法嘍！』

『爲什麼剛才我到二樓買東西，他們又要？』

他顯得有點光火了，鐵青着面說：『我不管人家的事，我們這裡就是不要！』

討了個沒趣，我只好坐着當人質，叫外子到外面拿美鈔換外匯票。

到樓上去付房租，他們也是不要人民幣。身上的二百塊人民幣怎樣處置呢？又不許帶出去。後來只好拿去送給附近的朋友。回到旅館睡在床上，我忽然跳起來學着以前那個上海太太，大叫：『沒道理！沒道理！』

回到香港，跟親友談起在大陸用鈔票的麻煩，他們就說：『中共全國上下亂糟糟，搞來搞去不知搞出個什麼鬼。行了（特區）政策，肯定麻煩更多，特區肯定用外匯票。但是住特區的人，即如外僑旅遊一樣，沒可能永遠不出區外跟本地人有買賣的。比如一般小販和賣農產品手工藝的人和小吃店，他們那裡來的外匯票預備找贖呢？他們找給你的一定是人民幣。那麼你們用外匯票的人，把人民幣送去那裡掉回本幣呢？』

『特區是統戰計劃之一，老鄧無計可施，想到用這一個絕招來欺騙台灣人和香港人，暗示我們共產主義和你們資本主義沒有分別，你們放心歸順吧！等到一朝得逞，特區是真正的特權階級的住宅區了。』

『我最憎的是見錢眼開。他又不矛盾。把民間的小資本連農人的生產在內，全部扼殺。看見我們資本主義會賺錢又垂涎欲滴。整天叫海外僑胞回去投資。當年不殺絕自己的人民，今天就不致窮到見鬼了。廣州市中山六路開辦那間泰林電器行，幹足兩年多，才賺得三百塊。我有錢去投資，也不會送到大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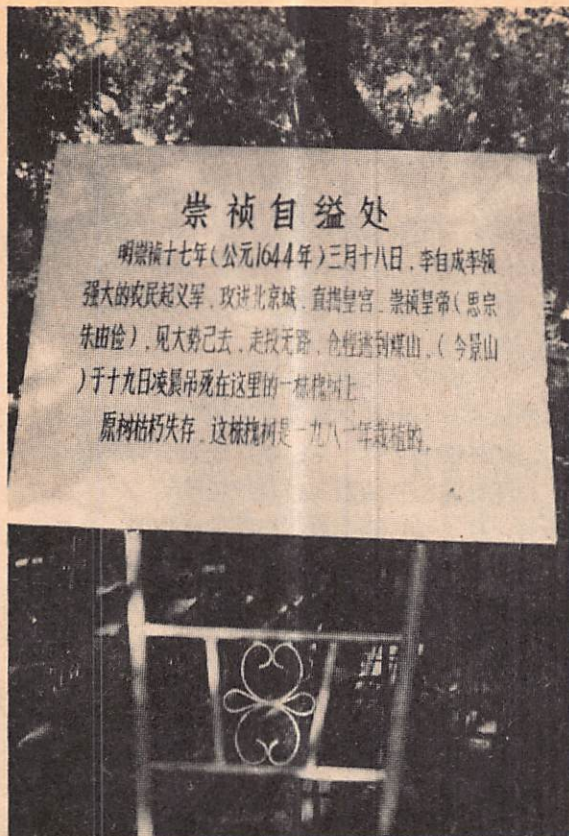
動程去北京前，大哥提議我們要帶够衣服，並且要帶止痛藥和感冒藥，他說在大陸旅途生病，可能買不到藥也找不到醫生。我是最怕冷的，所以帶了八粒感冒丸，並且帶了春褸和一件羊毛外衣。大嫂是胖冬瓜，他說他只怕熱而已。

北上火車是晚上十一點三十分開行。我們一行四人於晚上十時到火車站。車站擠得人山人海，還有幾個婆子手中提着小木橇。大嫂一見就叫：『嘩！這是搭夜車呀，他們是不是帶着橇子上去坐的？』

大哥說：『大概是吧？』

我們進了候車間。那是一間有沙發椅的大廳子，除了我們二三十個海外人之外，其他的搭客都是穿得很體面的公務員。

初夏的廣東，已經熱到大汗淋漓。上了車廂，好像走進烤箱一樣。我們找對了臥房號碼，大嫂亂找亂摸想開冷氣機，大哥說：『看情形沒有空氣調



節的。」

一個女服務生走過，大嫂一把攔住他：「服務生，請您給我們開開冷氣。」

「沒有冷氣的。」

「唉育？我要死了！我回去了！」大嫂說着提起行李袋想下車。

「那麼請您給我們開開窗子好不好？」外子央求道。

「窗子不能開的，開了會有人偷東西。等一下車開了就有空氣進來了！」真奇怪，守衛森嚴的火車站也會有人偷東西！

大嫂拿了毛巾和睡襖跑進洗手間。出來後他說：「不管什麼都好，淋了個冷水浴舒服多了。」

「大熱時候淋冷水，你提防感冒！」我說。

火車開了。擴音機播出這樣的話：「諸位旅客，火車開行了，請大家保持清潔，不要亂扔垃圾。三等車廂裡，三個座位坐四個人。青年人讓位給老人和孩子。軍人把槍枝彈藥放好。所有軍人幹部，不要胡亂跟旅客談話，以免洩漏國家機密……」

依地理推斷，火車路線應是經過粵北地方，英德、連縣、南雄，再進入湖南省。我想看看那些從沒有到過的地方，但是窗外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到。只好安心躺下。

次日早上，服務生進來說，如果吃包餐，可以預訂。我們恐怕買不到餐，依他的話付錢訂了。我

們給他外匯票，找回的都是人民幣。我反正醒來，趕早進漱洗室漱洗，以免人多了擠不下。

進入漱洗室，習慣性地扣上了門。門剛扣上，卡察一聲就給外面的人弄開了，進來一個冰冷面孔的服務員，他告訴我：「這是公共漱洗室，不能關門。」

「哦！哦！對不起。」我口裡是這樣說，心裡却在生氣罵：「你不懂禮貌嗎？門都不敲一下，如果我像大嫂那樣正在淋浴呢？」再想下去，不免心裡發毛。共產主義的國家，好像分分鐘有人監視着你。

車停下來，很多乘客下車到月台那裡洗面漱口。我不禁驚叫：「慘！原來三等客不許用漱洗室的。」

搞包餐的服務生說過，中午一點鐘會來叫我們到餐車吃飯的，過了一點鐘還不見他來，我就說：「大概他忘了，我們自己去吧。」

我們四個走進餐卡，看到裡頭的人正在狼吞虎咽地捧着個大盆子吃飯。服務生擋住我們，叫我們回去等等。

他再來叫我們，進入餐卡都變了另一種面貌。裡頭收拾得干乾淨淨，桌子重新鋪上桌布，坐着的是很體面的公務人員，吃飯的都用小碗。

原來火車的間隔是這樣的：車頭是三等卡，中間隔着餐卡，然後到軟臥卡，最後是硬臥卡。

吃過午飯，我們這些海外客在過道上結識起來。我們隔壁是兩個香港留英女學生和兩個男朋友，分別是朱小姐，梁小姐，小陳和中年的袁先生。那一邊，是岳父母和女兒女婿，岳父姓黃。再過去，是三個中年女人，他們是黃太、謝太和梅太。他們三個都是走進我們房子談話。大哥和外子看見擠滿了女人，就自己走出去了。那個謝太說：「我們房裡住了一個女幹部，整天閉着嘴不說一句話，我們三個也不敢亂說，真悶死人！」

「說了話會洩漏國家機密嘛！」我說。

「有什麼機密這麼了不起？全國都是又破又爛！怕我們灌輸了自由思想給他們才是真的。」

「喂！為什麼你們搭火車？」

「你們呢？」

「想自己去看，不想給人家牽着走。」

「我們也是呀！你們預備怎麼去法？」

「得到那裡就那裡，反正孩子大了，又不用記掛着家。」

「我們也是呀！」

隔壁兩個小姐也走進來了，人一多，氣氛更熱鬧。兩個小姐說，他們從沒回過大陸，今年在英國大學畢業了，想回中國看看清楚，究竟應不應該留下

來。他們的朋友小陳，在香港的大陸貿易公司任會計，老袁是去西安談銀行業務的。他們也是隨便到處看看而已。

我們從前唱過一首歌，歌詞有「九疑山上的白雲，有沒有消？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沒有潮？」又素來知道長沙棉花最有名，我知道火車正在湖南境內，所以老注望着窗外，想看看那些湖南景物。可惜車路所經，都是荒村郊野，看不到心目中的景物，却看到路軌邊有幾個人在修路。其中兩個人，各自在背上馱着一條大鐵軌，鐵軌那一頭連小軸輪也沒有一個，就那麼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死拉死拖。我看見了不禁大叫：「慘！」他們都問我看到什麼，我講了之後，黃太太說：「你少見多怪！大陸的人民做苦工，到處都是啦！說不定那些是勞改犯呢！」

「如果像香港造地鐵那樣，每天有一百八十就不錯。」朱小姐說。

「你們這些劉老老，天真得可愛。」大嫂說。車到岳陽停下來十幾分鐘，我們走下月台散步。

過了長江直至河南，一路上看到農村仍是用牛犁田，公路上也用人力拉木頭車。河南河北一帶很多大平原。但是種植的全是蠶豆和大蒜，間中有些是麥田。一路從南至北，經過衡陽、長沙、武漢、信陽、許昌、鄭州直至北京，只在一處車站看到遠遠的屋子後面，突出了半個「毛」頭。

經過一天兩夜的行程，早上七點半抵達北京，中旅社的車子把我們送去宣武門飯店。

一到，我們立即湧到櫃檯邊詢問到各地的火車行程。但是得到回答是什麼也不知道。我們都像迎頭給澆了冷水一樣，再窮追猛問下去，他們才說，現在不知，晚上回來再問。現在剛有一個四天旅行團開始，叫我們立刻安頓好行李，趕快吃完早餐下來跟團遊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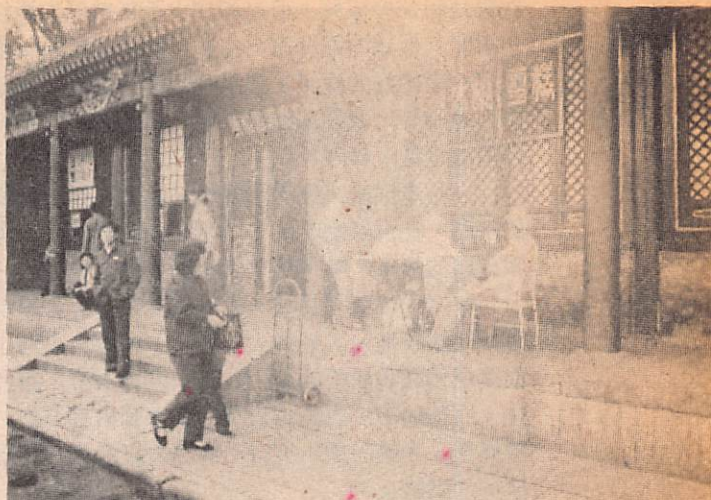
我們都匆匆上樓放下行李，又匆匆跑到餐廳吃了一點東西，到樓下大堂集合。

第一天的行程，是遊覽十三陵、頤和園和北海公園。

這一天剛好是星期天，旅遊區到處是人頭湧湧，那些人差不多是清一色的藍衣服，我們那個導遊穿的也是藍衣服，他又沒有特別的旗號帶引我們，令到我們真正是如假包換的趕鴨子，無論那裡，都是死盯住導遊的背影，一不小心就會離隊失散了。

十三陵，只開放了那個曾經發掘的地下宮殿。除了建築宏偉之外，再看不到什麼了。

頤和園裡，亭台樓榭很多，但是沒有一一參觀，只是走馬看花看看望望而已。



現在北京頤和園的商品部仍然用棉被裹着水棒、雪糕來保冷。

團友第一次進入公共洗手間，個個都大叫骯髒不已。

御花園裡，迎春花和桃花都已委謝，只有疏疏的幾叢牡丹花。到處花前樹下，都是泥塵滾滾。昆明湖裡滿是垃圾，在遊湖船上，一對美國老夫婦對我們搖頭說，地方太髒。

在北海公園的一個台階上，導遊指給我們看，對面就是中南海，外子立即問他：「可以參觀中南海嗎？」

導遊說：「中南海是政府首長的住所，是不許參觀的。」

下午五點回到旅館，我們急急到櫃檯詢問到各地的火車行程。他們的回答是一一如果要頭等票，到任何一地都得等十天以上才有，最快的是京滬綫，五天以上就有。如果去熱河，除了北京遊的四天之外，又要再過三天才有車去，那即是連北京在內，第七天才能動程往遼寧。

二十幾個人在那裡吱吱喳喳，商商量量，又商量不出結果。外子對大陸生活，已經厭倦到極點，都着嘴一言不發。老袁和小陳那一組，決定搭飛機去西安，大哥和大嫂說，無論如何也不搭飛機。老黃伯提議，先下手為強，那裡有車票就買那裡的，去到當地才作決定。但是我認為如果走冤枉路太不值得。我們四個人，三個同意黃伯的提議——去杭州。我是無話可說了。

我們上去洗完澡後就到樓下集合，拿了地圖，大夥兒去搭地下鐵。北京的地下鐵很清潔，也便宜，全程十分錢，但是人很擠。

我們先到王府井。在那兒逛了兩間百貨商場。那位袁先生說，他的妻子一定要他在北京買芭蕾牌珍珠膏，一時引得所有女團友都好奇想看看那些珍

珠寶是個什麼樣兒，但是兩間大百貨商場都說沒有。再問其他幾間都沒有。找到一間湘蜀餐館，進去吃了一頓頗好的晚飯。但是餐館裡也是人分三等。白人是頭等，我們華僑是二等，本地人是三等。分得清清楚楚，界限分明。

一路走回來，經過天安門，我們逕自走進故宮的午門，在古老幽暗的午門下，我在大談珍妃投井和砍頭的故事，嚇得那些女孩子們嘩然往回走。

第二天遊萬里長城。車剛出北京市，到處都是荒涼的沙石地，人烟稀少。車子不是跟火車路走，而是經過迴蕩曲折的小山坡路，路面很窄，車速很慢，有些地方，有點像台灣的太魯閣橫貫公路，驚險異常。經過一處小平台，導遊告訴我們，那是穆桂英的點將台。

車子不經火車路，所以沒有看到詹天佑給砸掉的紀念像。長城附近一帶都是大山石，山上長滿了棗子樹。漫山遍野的，黑棗紅棗都有。

到了長城的停車站，先在那兒吃午飯。這一餐飯十分糟糕。飯是又冷又硬，菜是又干又瘦的炸雞，誰也沒有興趣下箸。勉強吃了一點炒鴨蛋和青瓜湯。吃完飯各自散開去爬長城。八個香港年輕工人的一組，他們最活躍，一路高叫『不到長城非好漢』，飛奔着往上跑。大哥和大嫂以及一些年紀大的，站在那裡望城興嘆，我倒是跟着青年們跑到最高點，拍了照片才下來。

長城是歪斜曲折依山坡而建。那些大石塊又重又大。過去幾千年前，他們也能够用人力搬這麼多石塊上去，也斜斜地立得牢牢固固。令我没法不對我們的中華祖先，肅然起敬。

晚上，導遊帶我們去看戲。戲院門外，擺滿了旅遊巴士，和很多輛紅旗牌房車，也有些大官員剛從車子走出來。在路旁有幾個男青年在巡迴張望。我悄悄在大哥耳邊說：『我們走進了（假如我是真的）的故事裡！』記得看這個電影時，我為戲中的主角遭遇感動到下淚。

第三天行程，上午遊毛廟、人民大會堂。下午遊故宮。在毛廟的外面車子停下來，導遊帶着我們下車，有兩個太太沒有跟去，導遊問他們為什麼不去，他們回說，昨天爬長城很累。我們聽了都作會心微笑。

我跟到門口，也站着沒有進去，那個謝太太說：『這是個對中國影響這麼大的人，一定要看看他是個什麼樣子的。』跟在隊尾的女導遊，眼中漾着一眶淚水，低了頭好像作迴避。每個進去過的人，面上沒有一絲歡笑，也個個是冷漠無言。

（上•待續）

苦
讀
未
悟
圖

公
年
歲
至
于
北
京
楊





統一中國問題淺見

李瑞駿

編者按：

這篇是旅居美國的學者李瑞駿先生所撰寫的文章。他在多次訪問大陸、台灣之後，提出了關於統一中國問題的意見。估計，持與作者相近意見的人不少，尤其是長期離開中國而曾經回國『走馬看花』或『下馬觀花』者。刊載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正如作者所說：「拋磚引玉，希望站在人民立場上的中國同胞踴躍貢獻意見。」

我名李瑞駿，四十年代留學美國，而後定居，前後卅三年，由一九七八年起，先後返中國大陸六次，今（一九八二）年六月，去大陸後，到台灣訪問。五個多星期的旅行，沒遊山玩水，把全部時間化在了解各地情況。在無條件的愛國熱忱下，以真心善意對人，深入各階層，因此凡是遇見的台胞，都像一見如故的親人。大家以解決問題的方式交換意見毫無保留。許多在朝在野，與我交談過的朋友們，都鼓勵我，把各方收集的資料，作一個不偏左右的忠實報導，儘量讓執政的領導們了解中國人民的真正願望，也是響應孫運璿先生說的：「中國何去何從，應該留給全體中國人自己來解決。」這是我寫這文的動機。

這是我第一次訪問台灣。台灣的繁榮情況，並不亞於日本、香港。凡到過台灣的人，決不會否認這是台灣卅年來建設的成績。人民生活水準普遍增高，這一切成就，應該歸功於執政者所行的政策及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優越性。但是，這畢竟局限於一個海島的建設，所以比較容易達到進步的水平，也很快會趨向飽和。最近台灣外貿不景氣，已經影響到整個台灣的經濟發展。近廿年來，人民追求物質享受的慾望一經起飛後，就很難克制。尤其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引起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隔閡，過多的人才得不到適當的發揮，開始批評政府，還有企業界和私人貸款

歪風逐漸增加。凡此種種，暴露出自由競爭的缺點。政府當局應當改變過份自由的政策，來防止大魚吃小魚的事情發生。更應該鼓勵台灣過剩的人才去中國大陸發揮他們之所長，幫助建設以提高全體人民生活的水準。

我在大陸看到的情形與台灣恰巧相反。在過去廿年內政府把人民管束得像一架機器。雖然是善意的，要大家安份守己，有一個安定的生活，保證每一個人不會凍死餓死，但實際成了許多不負責任，不事生產，吃大鍋飯的人，在這種生產減低，物質缺乏的情況下，人人都變得自私自利。在這種惡性循環下，把中國幾乎帶到了總崩潰的邊緣。可是在最近短暫的五年中，大陸執政的領導們能有計劃，有步驟的克服種種阻力。能夠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把十億人民生活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尤其是佔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的農村有了顯著的改善。這種成就足以和台灣卅年來的建設比美。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有很多在海外及台灣的中國同胞不瞭解為什麼大陸這樣相形落後，還能吸引我返去六次之多。其主要原因是我每次返去，都見到國內有明顯的進步。如此繼續下去，中國有極光明的前途。其實，這也是大部份中國同胞的看法，所不同的是，懷疑這種進步情況能否持續下去？文革這一類的鬥爭是否會捲土重來？在大陸的同胞們，也有這種顧慮。解決這疑慮，是全體中國人的責任。我們一面應支持在大陸的執政者，幫助他們放寬大陸人民自由發展的尺度；同時，鼓勵大陸同胞，積極改變自私自利、不負責任的壞習氣。希望大家像前美國甘乃迪總統說的「不要專想國家能給我什麼，應該多想想我能為國家獻出多少」。要知道大陸建設的進度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團結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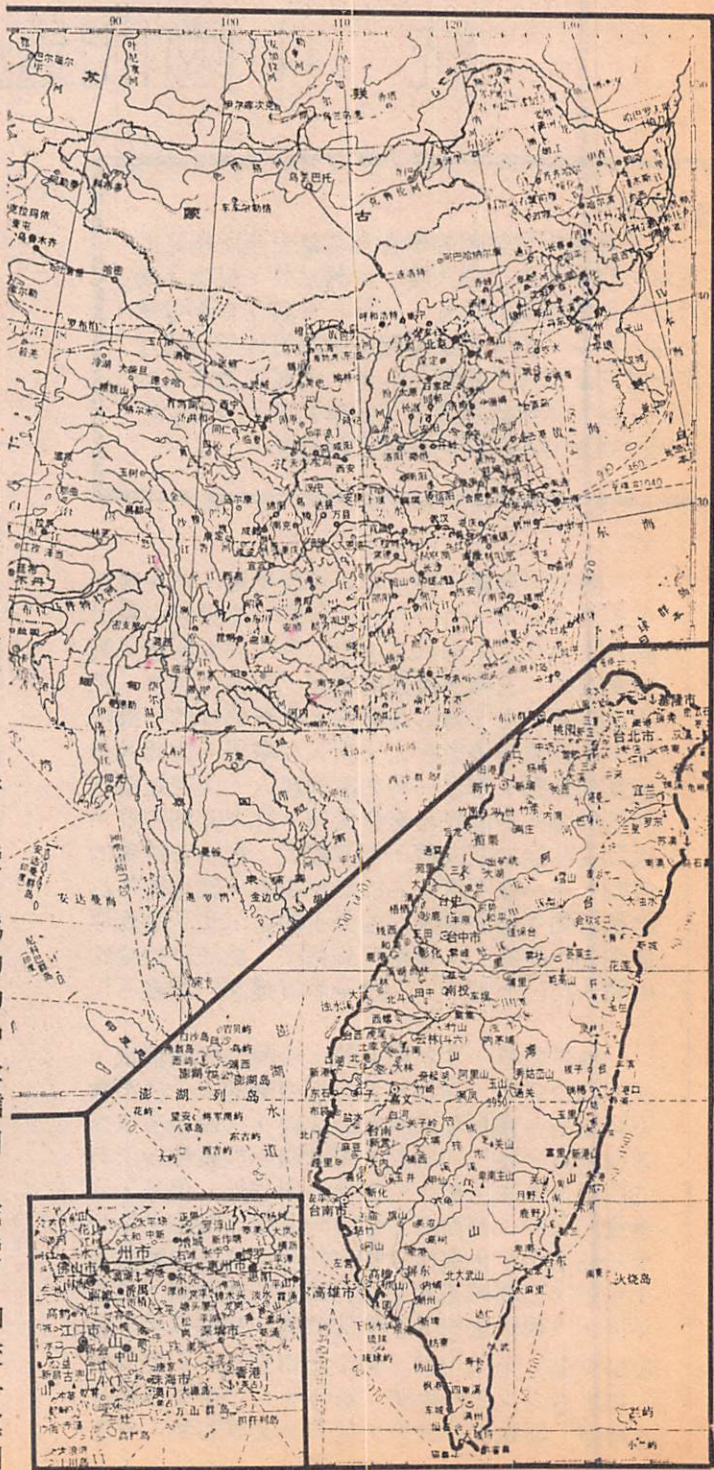
以上是我所見到兩地實情的報導和感想，可是現在雙方執政者所顧慮的是以什麼主義來救中國。這並不符合中華人民的迫切需要。因為事實告訴我們，自從推翻滿清政府以來，歷屆政治家

用了許多教條主義來標榜行政，儘管這些主義的本意和教條始終沒有改變，但是在這短短的七十年中，所行結果以及各種主義的盛衰起落，我們看得很清楚。我們可以看出治國不在乎主義而在於執政者的行政作風。如果世界上真有個十全十美的主義，相信大家都會採用這種主義，我認為不同的民族性、地理形勢、歷史背景和開發程度，該採用適合實況的政策。尤其是這樣複雜的中國，更不可能祇局限於一種主義或一種政策。事實上，中華人民已經厭煩這種祇有某種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論調了。

統一中國的另一障礙是，大陸和海外隔離了卅多年，有一部份同胞受到兩地歪曲事實，惡意宣傳的影響，把台灣和大陸處於敵對地位。中華人民好比一羣父母離異、家庭破碎的兒女，兄弟姐妹們應該聯合起來，棄除一切阻礙團結的抗力，讓支持統一的力量集中起來，幫我們的父母言歸於好，恢復為一個美滿的家庭。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應有的基本立場。我這次旅行，訪問了台灣、大陸、香港和美國各地的中國同胞，他們都想早日投入祖國的懷抱，尤其是在台灣和旅居香港及美國年老的一代，他們都殷切的希望和期待大陸正在進行的各種改革，希望這股力量不但要繼續下去，而且能進展得快一些。因為這些改革愈早完成，統一團結的障礙也就會愈早迎刃而解。

這三十多年的隔閡，以及不認識，不諒解，不信任的氣氛下，立刻要談團結統一，確是一件難事。但是我們應該盡量爭取向這個方向走去。讓台灣那些英雄無用武之地的人才，到大陸去發揮力量。讓大陸台灣兩地的商人，跳過中間商，直接做貿易。讓政治在雙方已經認同的「以民為主」的原則下，盡量推行對雙方人民實際有利的工作、壓制猜疑、攻擊、惡意宣傳等有損團結的行動。大陸早已向全世界公佈，如果台灣返歸中國，可以保留一切政治、經濟、教育制度及軍隊等。雖然台灣仍然以往昔的經驗為慮，不能相信對方的誠意，但是，應該知道，八十年代的中國，在國際與國內的形勢上，與往昔已大不相同。台灣當政者應該放開眼光，至少可以一面保持它本身的繼續建設，另一方面讓各種人才去大陸發展，幫助建設新中國。萬一統一大業發生枝節，尚可以退回台灣，與現況相比並無任何損失。如果統一大業進行順利，台灣能藉溝通兩地人民交往機會，真正為十億人民做一些有福利的事，一定能獲得全體人民的擁護。那就很容易達到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的大業。因

為從人民的眼光來看，國家領袖的成就並不在於推行某種主義，而是在能否獲得民心。一九四九年中共主政大陸，一九七七年四人幫下台。很明確的告訴我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識的領導們皆以此為鑑，唯有短見的執政者才以此為口號而已。



事實上中華人民尚稱幸運，因為大陸台灣同時有德高望重的賢明領導執政。這正是完成統一偉業的大好機會，廖承志先生說「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很明顯的在呼喚每一個中華人民，無論在朝在野，都應該積極的為這統一大業做些實際工作。不要在一些枝枝節節的問題上兜圈子。最近日本軍國主義有捲土重來之勢。蘇聯對中國也表示了虎視眈眈的野心。還有阿拉伯國家四分五裂，遭受霸權國家任意侵襲，造成整個世界的不穩定。這一切都在警惕我們要莊敬自強。要達到全人類所祈望的世界大同，必先要有一個富強而行仁政的中國。中國大陸五年來力行的新作風，台灣二十年努力的經濟起飛，都是最好的證明。說明了中國的前途未可限量。正如前美國尼克遜總統今年（1982）九月去中國大陸後說「以中國進步情形看來，它將成為廿一世紀世界第一大強國。因此，目前是美國與它合作的最佳時機」。這也正說明了，現在也是台灣與大陸着手商談統一的時間了。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是全體中華人民的期望，也是我書寫此文的目的，我僅是拋磚引玉，希望站在人民立場上的中國同胞踴躍貢獻意見，尤其需要具體的方案，如何把我們的力量團結起來完成統一大業。以下是本人就統一中國的問題提出幾項建議：

一、中國統一對各方面的影響

- △富強康樂及統一的中國可以促進維護世界的和平。
- △國家統一後免去力量的對消，人民及政府可以各盡所長，全力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中國。
- △中國統一可使雙方執政者對於歷史作一交待。
- △中國統一可以促進大陸同胞安居樂業及生活水準的提高。
- △中國統一有助於台灣長期的安定，各方面的發展和擺脫動盪不定的外來因素，人民生活得以早達先進水準。
- △中國統一可以提高華僑在海外的地位，有助於他們作落葉歸根或留居的選擇。

二、中國同胞對統一應有的認識

- △雙方執政者應當在「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原則下，先討論如何積極推行目前對雙方有利的工作，並且計劃，當雙方互信心逐漸增長，差距逐漸縮短的情況下如何作進一步的合作，在通盤計劃下，當可完成統一大業。
- △每一個中國同胞應該認識「合則對國家有

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的真理。只要大家有信心，誠心誠意積極來做這個工作，一定很容易，很快就實現。千萬不能把講統一的就認為是幫某一方做工作。

△統一大業並不只是雙方執政者的協調，而是全體中華人民的神聖任務。人民應該有組織的團結起來，集中羣力，提出他們的意見，協助雙方執政者完成任務。



三、統一中國的困難和解決方法

△困難：大陸的四個堅持和台灣的堅持三民主義統一。

解決方法：雙方放棄堅持，實行以民主為原則，實事求是，以人民為至上的施政方針。

△困難：雙方不瞭解，不信任，引致相互猜疑，恐懼和仇恨。

解決方法：雙方鼓勵人民溝通，相互認識，以逐漸達成諒解、和好及統一的目的。



△困難：人民顧慮雙方生活水準的差距對本身所導致的影響，尤其是台灣同胞對於大陸社會體制的恐懼。

解決方法：大陸同胞要放棄自私自利的心理，迎頭趕上作一個現代化的

國民。台灣同胞應消除恐懼的心理，信任葉劍英的九項建議。大陸執行者應逐漸放寬自由民主尺度，使中國成一個現代化的大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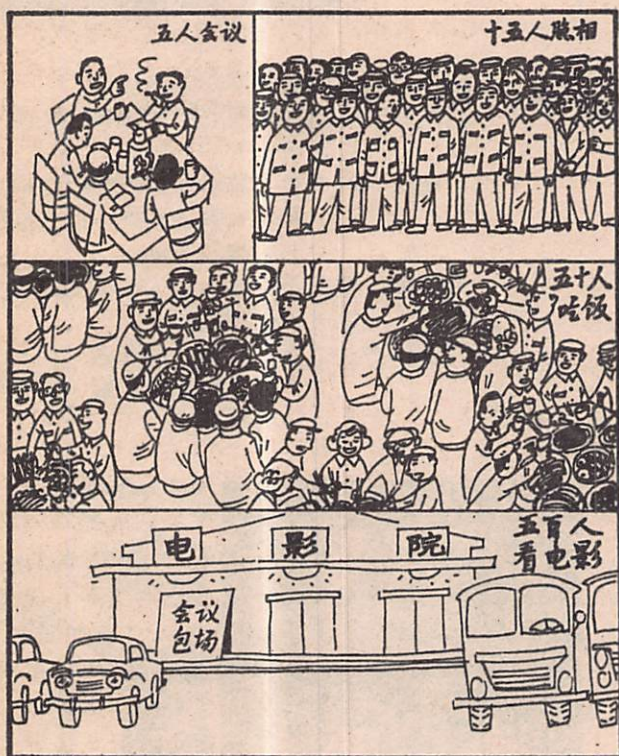
四、雙方應該和不應該作的事

- △讓分離兩地的骨肉親人有機會團聚。
- △讓台灣的外貿及工業界人才去大陸協助開發對外貿易及工業。
- △讓台灣的知識份子去大陸參加急切的大陸青年教育工作。
- △讓大陸供應台灣需要的工業原料及石油。
- △讓台灣供應大陸需要的工業產品。
- △讓雙方商人直接通商，以免去中間商的剝削。

- △不應再繼續堅持自己的教條主義。
- △不應再繼續酬化對方的惡意宣傳。
- △不應再以過份管束人民為施政的一項要務。
- △不應再消極的認為統一是複雜困難無法解決的問題。

對於以上的建議，歡迎公開討論，也可以直接函寄以下的地址：

Raymond T. Lee
 c/o Lee & Lee Corporation
 4 Ivy Circle
 Winchester, MA 01890
 U. S. A.



K 会议纪实

哈笑
 原载《讽刺与幽默》



▲无题 丁聪
 原载《新观察》

馬克思主義與意識形態

—— 沙林 ——

一、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還是「意識形態」？

「馬克思主義」，根據馬克思的「最親密的戰友」，也是「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之一的恩格斯的「解釋」，它是「科學底社會主義」。換句話說，在恩格斯眼裡，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堅持由實際出發，對事物做客觀而有系統地說明，以便指導無產階級進行社會革命的「科學底」社會學說。以後的各式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大都遵循恩格斯的意見，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科學底社會主義」，並深信不疑，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實證的、唯物的，也是經得起檢證和考驗的。

其實這種不加懷疑，直把馬克思主義當成「科學底社會主義」的態度，本身就是非科學底，因為科學精神主要特徵之一就是對事物要持「懷疑」態度，但多年來，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科學底社會主義」是否科學作過懷疑，至於當年的史達林和以後的毛澤東這兩位「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直把「馬克思主義」與「科學」劃一等號，更是反科學反列寧唯心主義的頂點。

這些對「科學底社會主義」毫不加以懷疑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充其量都是教條主義者。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當成「真理」，當成「信仰系統」，強調只要實踐，而不須理解。這種用信仰代替理智；用實踐包辦理論的作法，最後必然地把馬克思主義原有的那有限的「科學性」異化成「啓示性」，終於使「科學底社會主義」變成「紅色的意識形態」。

馬克思的思想體系，平實而論，絕大部份是非科學底，高明的讀者只要想想馬克思與黑格爾在思想邏輯上那種斬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也就可知馬克思主義的玄學性高於其科學性。當今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只有阿土塞（Louis Althusser）用「認

識論上的決裂」（Epistemological break）方式去強求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但他的做法是無法完成「擁護馬克思」的任務的。（他為了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並為了對於黑格爾式的馬克思主義，曾寫過一本書叫做「For Marx」——「擁護馬克思」。）因為馬克思的思想體系是不允許也不可以割裂的。

如果理解馬克思的思想本質，我們就會同意西方幾位大哲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態度和意見。第一個我們要在此提出的是以科學為本，講求實驗主義的美國大哲杜威（John Dewey）。他早年到過中國，也到過蘇聯。他相信暴力革命導向無產階級專政一事不是締造良好社會的道路。而這正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和「哥達綱領批判」中所強調過的「科學底社會主義」中的二個主要概念。有一次英哲羅素（Bertrand Russell）問到杜威關於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時，杜威直截了當地說，他既已擺脫傳統教條的束縛，也就不願再被另一教條所拘限，因而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可見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性高於科學性。其次我們要提出早年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晚年成為義大利思想大師的克羅采（B. Croce）。他是西方少有的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刻理解的人之一，在他的名著「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的經濟學」（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中，指稱馬克思主義是「玄學唯物論」（Metaphysical Materialism）。至於目前尚存的對黑格爾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極有研究的哲學健將胡克（S. Hook），在「辯證唯物主義與科學方法」一文中更明白地指出所謂「科學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無非是把科學標準曲為解說，來取代起於政治動機的形

上唯心主義而服務。」

這些人都是用他們深厚的知識基礎，經過仔細研究，才小心而謹慎地對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性提出客觀而中肯的批評。

當然，除此而外，我們還有別的途徑去說明馬克思主義是否是「科學底」的一個標準。別的不論，從實踐出發，讓我們來看看我們自己的「偉大祖國」吧。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開始，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今後中國將以先進的姿態實行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制度——「科學底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三十多年來，革命的實踐如何？「一窮二白」四個字是令人痛心的答案。革命的實踐說明了什麼？說明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

那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呢？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我們「偉大的黨」曾經提出並堅決實行的一條戰略性的口號——「狠抓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便是馬克思主義最精簡的詮釋。

馬克思主義不是別的，它是一種「意識形態」。

二、馬克思與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Ideology) 這個字早在十八世紀便在法國出現，第一個使用這個字眼的是法國的泰西(Antoine Louis Claude Destutt de Tracy)，但却因馬克思寫了一本「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 而開始流行起來。

什麼是「意識形態」？專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英國名學者普拉明那茲(John Plamenatz) 在其所著「意識形態」一書中這樣簡單地界定它：意識形態是一組「秘思」(Myth)，是一種「導誘」(derivation)，同時也是一個「信仰系統」(a belief-system)。馬克思使用「意識形態」這個字時，把它界定為「虛偽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德意志意識形態」是馬克思為批評當時德國的統治階級的思想觀念而寫的。在這本書中，「意識形態」被界定為「虛偽意識」，按照馬克思的意思，顯然是把它當作一組相關的錯誤信仰，而且此一錯誤信仰又被相關的一群人或一個社會所堅持着。換句話說，「意識形態」被馬克思用作指謂在普遍基礎上和群眾性上呈現出的一組相關的錯誤觀念。因此，馬克思使用「意識形態」這個名辭時，是充份指謂政治學上和社會學上的含義的；也可以說，他把每一個時代作支配地位的「觀念系統」看成是「意識形態」；而在語義上，「虛偽意識」、「虛偽觀念」、「假思想」等等都是「意識形態」的另一名詞。

這麼說來，「意識形態」一辭，在馬克思眼裡被當作「統治階級」的「思想理論」，而且是屬於一種用來維護「統治階級」自身利益的一套「虛偽說辭」。嚴格而言，馬克思使用「意識形態」，在語義上具有極大的貶義存在，亦即凡是馬克思準備加以反對或加以否定的理論，統統加上「意識形態」，把它們斥為「虛偽意識」，而一竿子打倒。

馬克思用「意識形態」來指涉一切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並添上「虛偽意識」的貶義。其目的何在？我們認為有二個：一是破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二是立馬克思自己的思想理論。換句話說，馬克思用「意識形態」套在資產階級學者的頭上，當作反面教員看待，回過頭來，他要人們肯定他的思想理論不是「意識形態」，不是「虛偽意識」，而是「科學底理論體系」。這種一破一立的辯證過程，目的在利於政治導誘，也就是馬克思在指出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是「意識形態」的前提下，誘導人們去歸向於一個不是「意識形態」的「科學底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具體的政治導誘例子就是著名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斥西方當日的資本主義是「支配的或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由於資本主義在馬克思眼裡成爲一種「虛偽意識」，他才強調「被壓迫或被剝削階級」對此「意識形態」無須信仰，甚至要加以否定。

馬克思除了把「意識形態」當成「虛偽意識」外，他還賦予它第二個貶義——「辯難」(Apolo-gy)。第一個貶義是指凡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都是「虛偽意識」；第二個貶義是指凡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都是為資產階級利益充當辯護辭用的。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一旦攻擊資產階級理論家時，一貫地斥責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的原因。

無疑地，馬克思深受歷史主義的影響，他把理論的現實當成意識形態的現實化，例如他批評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時，他就認為這二個學者的理論基本上是意識形態性的，甚至於指斥他們二人根本未意識到自己的歷史地位，因而無意識地充當了統治階級的理論辯護士。談到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就讓我們想到邊沁(Jeremy Bentham)。馬克思是怎麼樣對待邊沁的？他認為邊沁是最現實的原型資產階級理論家，同時也是一個最差的資產階級辯護士。其實，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深受邊沁思想影響的，凡是看過馬克思的「神聖家族」(The Holy Family)及「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人，都會同意以上的看法。然而，馬克思最後在談到邊沁的思想體系時，竟毫不留情地指斥那

是「意識形態」，那是「社會既存事物的辯護術」。

既然把「意識形態」當成辯護術，除了駁義外，馬克思本人也不自覺地犯了功利主義的毛病。因為他一面反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但另一面功利地摘取意識形態的辯護術，用來武裝他自己的思想理論。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是在一面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情形下，同時對自己的思想理論作理論辯難，整本「德意志意識形態」，我們認為馬克思為自己理論辯難的地方多於批評他的敵人理論的部份。一個一向反對意識形態的馬克思，竟然利用了意識形態的辯護術來武裝自己的思想理論，也就使人難於相信他的理論體系不是意識形態了。

三、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當馬克思藉指斥既存的社會思想、制度、觀念和價值為「意識形態」而加以無情否定時，馬克思自己的理論體系又是什麼呢？

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回答是：當然是科學底社會主義！

好一個「當然」！但如果檢視一下這個「科學底社會主義」的總內容，這個「當然」恐怕要大打折扣了。這個「科學底社會主義」它的目標是經過對舊社會的「科學底」分析，導引出一條新社會的必然道路，那就是，資本主義的「必然崩潰」和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天堂的「必然來臨」。馬克思對新舊社會的出現和崩潰的「必然性」是建立在黑格爾的辯證邏輯基礎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經驗科學的基礎上，因此，它只是形上學的「必然」，而非科學上的「必然」。

新的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天堂以超過資本主義社會不知多少倍的「優越性」（這一點列寧最喜歡發揮）的姿態「必然性底」出現如果是形上學的，那我們就不能不考慮到此時「科學底社會主義」所標誌出的目的物只是一種「理想」（Idea），而「科學底社會主義」理論本身則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烏托邦」（Ideological Utopia），只可談論，不能實現，萬一非實現不可，一定要出問題，這裡呈現出一個問題：「意識形態烏托邦」給予馬克思主義理論以理想化，而此一理想化正好導誘世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幻想和追尋。等到追尋並實踐一段過程後由於不能實踐而硬要實踐致使產生一連串的無法解決的難題，此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由於浸淫在「意識形態烏托邦」的理想主義中，不知追求退路，改以「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崎嶇的」為遁辭，而試圖向前滾進。這恰如霧裡探花一樣，情境是浪漫的——現實化的表現就是「革命的浪漫主義」和「社會主義熱情」，但其結果是虛無的——現實

化的表現就是「亡黨、亡國、亡頭」。

以上這些問題使我們不能不為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性和烏托邦性給予知識上的檢驗。

影響當代社會科學甚大的「知識社會學」大師曼罕（Karl Mannheim）在他的著作中——「意識形態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對上述問題提出了知識上的說明。曼罕指出「意識形態」是「保守的」，馬克思也持這種看法，這也是他反對「意識形態」的一個原因。曼罕認為趨於「保守性」的意識形態，其所以尚能存在，它的存在作用在於維護和支持既存社會的現狀。與此同時，曼罕認為「烏托邦」是「激進的」，它的功用在於打破現狀和導出新況。此時可以看出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在性質上是對立的，一個是固持現狀，另一個是要打破現狀。這個矛盾對立用到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個對立面上，就極易看出：如果資本主義是意識形態，則馬克思主義是烏托邦。

然而一個活生生的事實提供給我們來論證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烏托邦，同時還是一個意識形態。最後並不可避免地變成「意識形態烏托邦」一事。這個活生生的現實就是今天的蘇聯和中國，這兩個國家的共產黨在革命之初都是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一個新的理想，並決定用它來改變社會。這說明馬克思主義在中蘇兩國的共產黨人眼裡理想型上（Ideal type）是一個完成社會革命的理論烏托邦。但是，一旦這個理論上的烏托邦成為以共產黨為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具有統治性和支配性的觀念體系後，並用這個觀念體系——馬克思主義去決定這個新的社會主義現實時，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成為維護共產黨人這個紅色政治利益集團存在的一個「保守性」的政治工具了。此時，原來在理想上屬於「烏托邦」的馬克思主義搖身一變成為新的「意識形態」了。這不是故事，而是活生生的現實，至今還表現在蘇聯和中國的社會空間中。好了，此處的分析使我們得出另一個新的結論：此即在社會革命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由激進的理論烏托邦變成保守的政治意識形態。這種異化的特徵說明馬克思主義本身也不過是另一種「虛偽意識」。

著名的波蘭馬克思主義學者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他寫了三大卷「馬克思主義主流」（The main Current of Marxism），他在「意識形態與理論」（Ideology and Theory）一文中把馬克思主義如何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混合物作了理論分析，他的分析，無疑地可以佐證我們在這兒論述上述問題時作為理論上參考。他認為「意識形態」與「科學」之間的區別不在於假值和真值的區別，而在於它們的社會功能。他認為，對

馬克思而言，意識形態的概念包含着一組「否定判斷」（Negative judgement），也就是我們在前面提過的它是一個駁辭。此外，「意識形態」又被馬克思當作「虛偽意識」（即一組被扭曲了的思想意識。）因此，不論接受或反對一個意識形態，都不表示這是一種真實的智識作為，最多只能解釋，這是一種政治行為，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本身不論它處於「烏托邦」階段還是「意識形態」階段，甚或最後成爲一個「意識形態烏托邦」，都被馬克思主義者（此處指謂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外表的那些職業革命家）充當成爲完成一個極具黨派自私主義的政治目的工具。從這裡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一個「秘思」（Myth），一面它是充當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理論體系，一面又是維護「無產階級政黨」遂行政治自私主義時的意識形態。在談到「意識形態烏托邦」時，柯拉科夫斯基的精彩意見，逼迫着一切以馬克思主義爲教條的理論家們（包括東方的中國共產主義理論家們）無還手之力。這個意見我們必須在此提出，好讓全世界的有知識良心的人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是如何地在先天上被共產黨人易於揉捏成一種「意識形態烏托邦」。柯拉科夫斯基指出，馬克思主義確是一個論述社會關係及其社會發展上深具價值的政治綱領，但是馬克思在綱領中對未來問題的思考都不是基於實在的。馬克思只提出一個人間天堂對無產階級的爭取解放的應然性，但在達到天堂之路的實踐上，却完全是玄學式的，到底採取何種方式，馬克思自己前後都不知所從。我們只能說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夢想過於神話化，到底它能否實現，是超出人們知識領域之外的事。這就必然地會刻意地突出社會主義的理想，而用理想面的未來實現去掩蓋目前在實踐過程中的一切罪惡。所以，馬克思主義作爲一個意識形態烏托邦是可以發揮它的社會心理學上的功能的，亦即它用意識形態的角色去動員群眾，去鼓動思想，使所有輕信重信的人們圍繞着它這個「秘思」而組織起來；同時它又用烏托邦的角色給圍繞在它四周的人們提供一個「希望」。然後，它又用意識形態這個長線拉出朝向它所提出那個「希望」——共產主義的來臨的遙不可期的道路。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之間的關係，馬克思主義完成了辯論地統一。那就是：沒有烏托邦，一個社會群眾運動無以出現；沒有意識形態，一個社會政治目標無法達成。這裡，柯拉科夫斯基對馬克思主義最後變成意識形態烏托邦的意見，既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浪漫性，又指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神秘性，同時還剖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功能性。一切只重馬克思主義的理念面而忽視馬克思主義的實際面的人們，柯拉科夫斯

基的意見值得這些人們去作知識上的反省與思考。一切只顧馬克思主義實際面而形式上尊重馬克思主義理念面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者們，柯拉科夫斯基的意見已爲世人替你們揭開握在你們手中的馬克思主義的「秘思性」，那就是：與其說它是無產階級爭取最後解放的科學底理論；不如說它是職業革命家打天下，新生資產階級坐天下和保天下的「虛偽意識」。

四、紅色意識形態的異化

當今全世界都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中最具社會性的一個問題——「異化論」（Theory of Alienation）的時候，我們也願意根據馬克思的「異化論」來分析我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異化。

關於社會主義的異化和共產主義的異化問題；最近兩三年來，國內的理論工作者們已隨着國際馬克思學發展的焦點，並針對國內的實際狀況，運用理論結合實際的作法，把上述問題討論得如火如荼了。這討論本來是始於鄧小平開展思想解放運動後的衍生物，但最近鄧小平居然下令國內「掃除精神污染」，而且在運動中把「社會主義異化問題」當作要掃除的對象之一。說來也真是令我們中國人民稱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本身就包括有「異化論」。然而當今我們中國最具權勢而又親自下令搞四個堅持——其中第一個堅持便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鄧小平同志」居然下令不准再討論「異化問題」。我們不禁在此要問：

「鄧小平同志」，你是馬克思主義者嗎？「異化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之一，由你下令禁止討論「異化問題」，足稱你根本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充其量是個「假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在此之所以不稱鄧小平是「反馬克思主義者」，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現在仍在繼續那「四個堅持」，原因之二是他毛澤東以後第二個最善於玩弄意識形態的人。毛澤東在世時，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往左偏，偏離後連馬克思都不認識那是什麼東西，我們只能名之曰：那是「極左意識形態」。如果硬要說明，才能讓全世界的中國之春讀者知道「極左意識形態」是什麼玩意，那我們就把王希哲在「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其中一段摘錄下來讓大家用嚴肅的心情去閱讀吧：

「它在『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名義下，把中世紀的一切最黑暗最反動的東西都復活起來。它把馬克思和列寧主義宗教化，然後復辟了中世紀式的政教合一；它把黨凌駕於社會之上並使這個黨的領袖成了能够任意擺佈人民命運的至高主宰；……它關心它既得的至高無上的權力、陰謀和策略

，却不關心馬克思主義的理想、良心的命令和起碼的人道。……它是一種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旨意下對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實行官僚特權階級專政的社會法西斯主義。」

王希哲的這段話早有西方的馬克思學學者愛克頓 (H. B. Acton) 爲他提出了論脚。愛克頓在「意識形態」(Ideology) 一文中早已預言馬列主義最後一定異化成一種兼俱宗教、神學與形而上學的意識形態。愛克頓一九五五年的論脚，一九八〇年後經王希哲來證實。

看看王希哲的話，加上我們自己親身領教過的經驗，我們不能不理智地指出，毛澤東的極左意識形態，實質是紅色意識形態在中國的第一次異化。同時，也給了我們深刻的認識，那就是：

紅色意識形態是不能玩弄的，否則千萬人頭落地！

毛澤東去見馬克思後，發出了一個震驚全世界的「四人幫事件」。他們本想繼續玩弄極左意識形態，所得到的報應是他們四個人政治生命的結束。

鄧小平起來後，他把極左意識形態往右一拉，把毛澤東的「反修」旗幟降下來，此時，全國人民喘了一口氣，認爲這下子歷史終於轉變了，社會主義一定到來。其實這是我們那可憐又可愛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遲來的喜悅和幻想。當時，國內的民刊早已指出：指望鄧小平去扭轉意識形態，以求能够進行一場徹底的改革，根本就是一種改良主義的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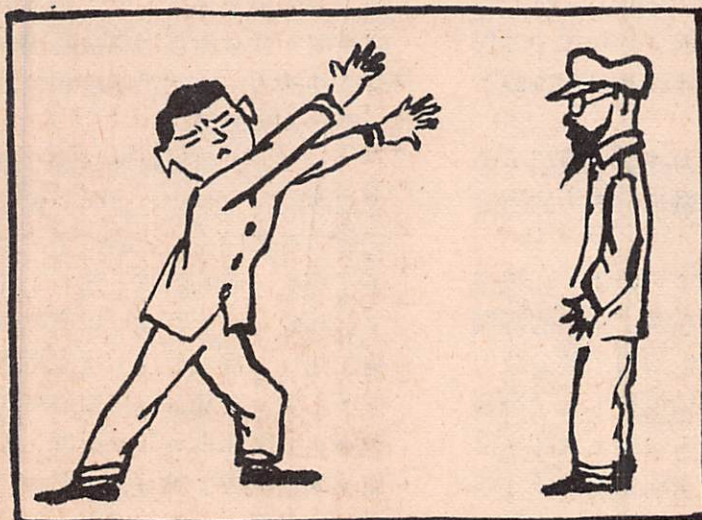
想。這些民主運動的旗手們，爲什麼會有這種看法？因爲他們和我們一樣，對紅色意識形態之作爲「虛偽意識」只有利於統治階級而不利於被統治階級這個問題上，早已作過理論分析。

厚實的理論知識，使我們透視了鄧小平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實質。那不是什麼思想運動，那是鄧小平在玩弄紅色意識形態。毛澤東用「左手」玩，鄧小平用「右手」玩而已。至於那個紅色意識形態，到頭來，還是不折不扣的「虛偽意識」，還是拋出一個烏托邦，用調轉了方向的意識形態去進行對人民的政治導誘，最終完成一場新的紅色利益集團的政治自私主義而已。

因此，目前黨的領導人所幹的實在是另一場紅色意識形態的異化。然而，他們只允許自己幹，而不准中國人民說，誰要說這是「社會主義的異化」，鄧小平就說這批人在搞「精神污染」，而且下令「掃除」！

其實，搞「精神污染」的不是中國人民，而是我們「偉大的黨」。因爲你們從來不曾將馬克思主義的「秘恩」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們小老百姓，而且還堂而皇之的用馬克思主義這個「虛偽意識」長期地統治了十億中國人民的大腦。

今天，要「掃除」的「精神污染」，不是「社會主義的異化」問題，恰恰相反，是製造「精神污染」的這個「紅色意識形態」。



“兄弟打的那路拳？” “摸領導氣侯拳。”



蒙古人歡迎聯邦制

經鐵木兒

自中國之春發表以來，褒貶不一，初時我也有一些疑念。但刊物逐漸概括了正反甚至攻擊性意見，不錯，不錯，這個刊物成功了。

之春，象徵國家民族欣欣向榮之義，可圈可點；但中國兩字在漢族以來似成狹義，應附加中華民族大團結作附題（對歷史與民族過程有研究者應當了解）。

有人指出中國歷史編寫是權力產物，很對，中國長期不安定及漢族不能與別族融洽，很大的因素都由此產生。

有人說中國不能施行聯邦制度，錯了。如果深入了解中華兩字，深澈了解中國超過二千年的專制毒害，覺悟與認識萬里長城造成中國的民族分裂，就知道現在如使中華民族和平團結復興，除了聯邦制度之外，只有所待百年復百年。最近，我和一位政見不同而「民族各異」而他又在社會上出了「頑固」之名的老先生交換意見，他很感慨地說：「塞北、西域與台灣，不是武力可以征服的，對此我已有五十年之經驗。施壓則易變，變則中原不可

守，我希望此生不要看到」，我很尊敬他老人家這些話。

世界很多國家都是聯邦制度，有人批評他們施政決議緩慢是事實，但它們都被稱作先進國家也不容否認。甘草與首相都被稱國老，兩者最大之功能是協和緩衝，這就證明協和較具攻擊者效大而險少，不必走回頭路。

有人對封建與專制兩詞混淆不清，每有什麼壞處都概括在「封建」之內，其實中國的封建早在公元前四百年已實質上結束了，以後都是專制。「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百姓可以直呼君主之名（起碼吳國是如此）；百工並茂，百家爭鳴；軍旅、煉鐵，及很多工藝及文藝都出自封建時代，我們不能因部分不適宜便全部否定而且歸罪。如果深入研究中華民族及歐洲政體，應當明白封建應分原始式封建及精神傳統封建兩類：前者是人口不密，時代的封地建立；後者是把榮譽與官職劃分如(1)漢族以外的民族社會傳統及(2)君主立憲民主自由制度。不客氣說句

，中國近代史應是專制加內定封建再加形式上的民主而構成。

某方面提倡「大漢民族」，某方面提倡「民族大義」，都是狹義的、短視的、且理智的，這兩種提倡都會導致不成爲中華民族。在廿世紀來說，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能稱作純種民族；漢族之形成始自萬里長城，是經過戰爭、合併、共患難等過程而成，沒有人能否定這些事實。但漢族與各族（原是同族）之間長期因利害而隔閡，因此傳統習慣都有差別，強逼「漢化」是絕大錯誤，所以我也贊成上述的聯邦建議。

廣東人俗語有句「歷史無情」，這是相關語。我希望學者們及執政者們能以虛懷而客觀的態度對中國過去「歷史」作檢討與更正，共同爲中華民族之切實形成與團結、強盛而努力。

我是蒙古族，而且更是成吉思汗直系家族內部繼承人，沒有人比我對自己及我家族更清楚，「歷史無情」不能給我改姓及改族。

某方面說：「蒙古族是外國人」、「蒙古人是匈奴」，如果是這樣，則長城以外就不是中國領土了。

某方面對蒙古人說：「中國向來對你們親善的，漢公主昭君也嫁給你們先祖，她的墳墓仍被保存。」，這樣說來，也承認長城以外不是中國領土了。

上述兩方面說法都絕對錯誤的，他們都被富貴迷昏了腦子，希望學者們不要被政權牽着鼻子走。當然，每個民族在今天都含有別族血統是事實，我們不能把美國說成是歐洲人或非洲人，但也不可能否定他們的來源。

我父系是正宗蒙古族，我母系是「南匈奴」嫡系，而父系與母系從前都有和漢族及女真族婚配，我本人也算是混血兒了，讓我來糾正歷史上的錯誤，證實中華民族關係及領土完整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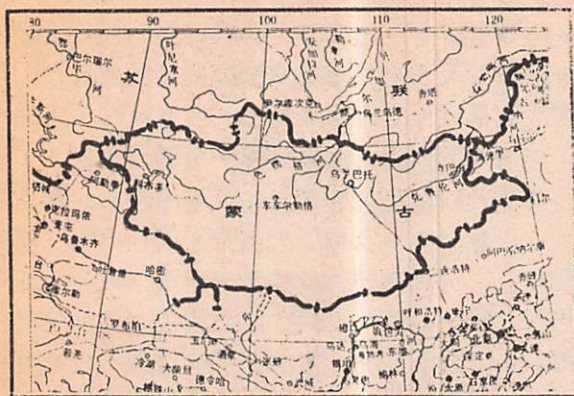
蒙古族起源於黃河以北及西伯利亞南部，史稱「白狄」，古戎公亶父之妻是「白狄」女王德姬，我們尊德姬爲鼻祖而歷代都自稱姬之子，也稱德族，與漢城同化的稱至德族（是取材於孔子讚頌伯泰之語）。姬之親生子伯泰與仲雍（我是伯泰第八十六代）開國於句吳（即現江蘇丹徒縣），夫差（我是他六十四代）失悞而舉族北返渤海吳德族（在今之內蒙西部及寧夏省）。季扎主政時疏散子弟後留

在中原的稱吳族延陵系，後來隨元代南下而留在中原的稱吳族渤海系。稱渤海、稱成吉思，都是紀念夫差生前被周天子策封爲兼領渤海王。吳族被秦、匈逼往東北稱吳恒（史稱「烏恒」，也被稱「東胡族」；部份失散西逃，後稱吳孫，史稱「烏孫」，是日耳曼族及哈薩克族的先祖，可證諸現在之歐洲王族。）再建渤海（我是祚榮第卅七代，史稱「粟水靴靴族」），渤海被篡於契丹，至第五代吳眞即成吉思汗（我是他第廿三代），他禁止人們稱他爲「皇帝」，「陛下」或「大眞」，而以鐵木杖爲令，因此人民尊稱他爲鐵木眞。「博兒濟吉特」只是女眞語，即「愛新覺羅」，就是唐或金一樣。明代歷史姬句吳訛音作「奇渥溫」，把吳訛音作「烏」，都是一種侮辱性，也是導致民族隔閡與分裂因素之一；如果細查唐代歷史，就知明代是從那裏來的。所以現在還強調大民族主義是十分不理智的。「可汗」原是克行，人民呼稱「呀行」，以示親近，漢文字寫法應是行台，如我對上的十四世先祖處恂在太子時代任察綏行台（但漢文官方歷史却寫作「烏察哈爾可汗脫古思」）。

我們家族在離開蒙古科爾沁到蘇州定居（只有數十年）的時候，與蘇州姬吳族總組織元老們澈底檢討了家族在足夠三千年的過往。歷時三千年，三個王國，一個大帝國及前後三個屬半獨立的汗國（指直系，不包括中西亞及歐洲），其成功在於得民，失敗則由於享樂自私。家族規章雖極嚴厲，其缺點是沒有人民監督；國政太重功利，但對官吏管制不嚴，沒有系統的民主法制是致命傷，（當然，中原政權在歷史上之結社、派系、專制等弊病也應引以爲鑑戒。）因此家族決定拒絕晚清皇朝的利誘，也不再履行「世襲德親王」、「世襲綏遠侯」等爵禮，嚴厲規定後代繼承人身體力行鍛鍊及研究以採納廣泛的政治見解與立法制度，由我祖父開始，繼承人（第一繼承人）是不能分取上代財產的。

「匈奴」？匈族起於春秋時代晉國欒氏，後隨漢音作劉，源自西戎，世爲晉大夫，後結合北逃難民而建立，再西聯戎族而強大。

我介紹人們不妨到匈牙利深入民間去訪問，你將看到仍存有非常濃厚的中華風俗，所有的民間傳記或世代相傳的口語都說他們來自中國。匈的原義是饑餓的解釋，秦代已有「蠻」字，爲什麼不稱他們匈蠻而作「匈奴」，這表示戰國末期北逃難民在



饑餓難忍的情況下而常賣兒女作奴，因此不稱匈蠻而稱「匈奴」已非常容易明白了。匈牙利人民在歷史上直至現在都在與饑餓鬥爭，中華民族既常稱泱泱大國民族，爲什麼不向災難人民伸出同情之手？追求個人奢華享樂是否原本的民族道德？如果現在仍保留「匈奴」二字或繼續宣傳萬里長城以如山白骨造成的「光輝歷史」，不但「中華民族團結統一」之口號不能實現，而自誇之民族道德傳統也只屬空談。很多仍在文字上狂罵「匈奴」的人，事實上，不少人還是「匈奴」族的後裔，不少人還以「匈奴」族留下的工藝技術及植物種子作生產職業。有人說「膚色」不同，但你能否保證五百年後美國人的膚色與目前一樣？一千年前、二千年前中國人的膚色是怎樣？檢討過去，面對現實，就是我們這一代應有的責任。

簡括言之，蒙古族是春秋時代吳國及魯國後裔作主體，匈奴是戰國初期晉國後裔作主體，兩個民族都繼續接納了各個世紀的北逃難民及東侵民族，

近兩個世紀匈奴也分別溶入蒙古族與漢族。南北民族不同者只是，北方民族仍保留一些春秋時代遺風及傳統，其中尤以男女在家族中地位平等及姑子亦可歸宗兩事是大部份漢族所不能接納的。任何人都不敢說春秋時代除了秦、楚之外都不是中國人，由此可見歷代專制政權之民族政策都是愚不可及。在現世紀，有些人說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就是統一！你相信嗎？照上述希望只能達北宋及朱明兩代環境，不要忘記北部、西部及海外的中國人。海外中國人不是自願的，只要中國政治修明、制度優良穩定，我敢保證絕大部份返回祖國作出貢獻，而這些人的力量可在很少年份間把中國推進廿至卅年的進步程度。北部及西部的民族如真心合作而付出力量，不但荒漠繁榮，更可鞏固國防，進而收復失地。

民族血統及世系源遠流長，蒙古族深厚的基礎僅次於漢族，彼此之間也脫不了關係。我僅以我太祖成吉思汗鐵木真家族繼承人身份鄭重宣告：

蒙古族也是中華民族，鐵木真家族不容許與不承認蒙古地區完全獨立（除非中原政權真正排擠），更不承認被割去之失地爲合法。

成吉思汗有兩句遺言：天道無私，禍福自召。

這兩句話，就作爲我的禮物，送給海峽兩岸的政客們，及海外提倡台灣獨立的先生們罷！

經鐵木兒

公元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二日



是謂大同



不必爲己



柯 蕙

編者先生：

筆者武人出身，武了幾十年，武不出名堂來。在幾次戰場比武中，幾乎送掉老命。幸祖先積德，閻王漏點了我的大名，而僥倖仍留我在此花花世界中混日子。憶多少年前，逃呀逃！由大陸逃到台灣，又由寶島遁至美洲中的合衆國。至今，算算日子，落脚番邦，又將十載；暗再屈指算算，個人糟踏人類糧食，也將七十年了。

又憶，有幸在年輕時，能於祖國跑過了十餘行省，包括新疆、西藏、陝川、雲貴等地，地球上的非澳二洲，亦曾留有脚印；幾十年奔波，印證了自己祖國的山河，絕不遜色於人，而民族智慧，更不落人後，反問：為何國勢會搞成如此局面？億萬老百姓的生活，會落到如是慘苦！

依個人淺見：最大的原因在於沒有一個好的領導者，沒有一位真真能為國為民的掌舵人，私慾湮沒了理性，權勢抹殺了良知，至今兩黨鬥爭不止。

凡五十歲以上的人，大多數都患了台灣孫觀漢博士所提醒的「老昏病」，病情嚴重，中毒彌深，委實無助於國了。五十歲以下者，實應痛下決心，認真檢討，勇於認錯，抱赤誠之心，為祖國服務，默默地去，做一點算一點，做一滴算一滴。

「夢」是否可予披露，尚請卓裁，文中若有錯，請隨便修改。祝事事順利！

筆者柯 蕙於波士頓
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九日

天熱心煩，躺著苦思。一時似睡似夢，又睡又夢。夢？夢！

夢見孫中山先生正中危坐，蔣介石先生陪之右側，毛澤東先生位於左邊，三位均臉色慘白，低頭不語，情景淒涼可怖。

片刻，中山先生開口：「承閻王之命，召請二位前來，檢討一下，你我古國中華，為何七十多年來，鬧革命，鬧得皂白青紅不分、黑白顛倒，大家都標榜革命，厲行革命，而事實是唱盡了革命理論，做絕了反革命勾當，全是為『私』而不擇手段，爭權奪利，把我的意願——『天下為公』的革命事業，變作是『天下為私』，你爭我奪，殺氣衝天。

先是由黨內殺出黨外，再由黨外殺回黨內，刀來槍去，牽累多少無辜百姓。名為『革命』，實則『命革』。於是殺得血流成河，陳屍遍野；該死的，死不了；不該死的，多成冤鬼。你們互相殘殺的目標，全是自己同胞！

我，孫某，深夜捫心：革命由我起，現今，國家的革命，搞成如此地步，我有大罪。曾呈文哭訴閻王，治我應得之罪，承寬大待我，僅批留府察看。反觀你們二位，在人間的『革命』事業，可謂驚天動地，世人共知。

你們均官高權大，擔任過什麼總指揮、總司令、委員長、黨主席、國元首、黨領袖、國總統，與皇帝何異？又分別被捧為『民族救星』、『東方太陽』，差一點，被崇拜為萬能的『神』，嗚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你們的徒子徒孫們吹捧的技倆，世人嘆為觀止。

君不見：毛有毛語錄，蔣有蔣嘉言；

毛堂矗立北京，壯觀雄偉；蔣堂峨巍台北，傲視東亞。真是偉哉大哉，大哉偉也？！

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多少區別？國民政府，人民政府，有何不同？『以黨治國』『以黨事政』有什麼差異？

你領導革命，我導領革命，大家都說：我的黨是革命黨，黨就是國，國亦是黨；而我是黨亦是國，反我者即反黨，反黨即反革命，反革命等於叛國！你指我反革命，我控你叛國賊。於是你該死！我也不能活。消滅你的方式，或秘密『失蹤』，或公開『槍斃』，不管你的肉體餵了魚或當了肥料，則陰魂無不歸屬陰府。

請問二位：如是『黨』『國』『我』三位一體的構成，有何公理依據？如是能救國、治國而建國乎？能救民、安民而強民乎？

多少年前，美國某一華文日報，短文幾句，提供深思：

『蔣匪毛匪誰是匪？

親美親蘇我親誰？

爭向洋人獻家醜，

難道中國無好人？』

有請二位老弟，從速托夢你們的徒子徒孫們，坦白認罪並痛告之。『爭權奪利，陰間必定治罪』。望你等有生之年，趕快清醒，不能再口是心非，自欺欺人，而痛下決心為你我千年古國、錦繡山河，做點好事！」

筆者，一夢驚醒，滿頭大汗！敬錄夢境，以供你、我炎黃子孫，共惕共勉！

柯 懋 於波士頓

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五日



— 高準 —

三、杜甫草堂

遊武侯祠既畢，原擬即赴杜甫草堂。昨天在四川大學座談會上得知詩人流沙河與傅仇住在成都，極想一會，但時間極有限，遂請接待人員約他們在杜甫草堂相會，草堂會詩人，應該最相宜不過。但成都接待當局知我也研究過中國歷史，還出版了一本「中國繪畫史導論」，就臨時又安排我要先去見幾位畫家。車子就先開到了成都文史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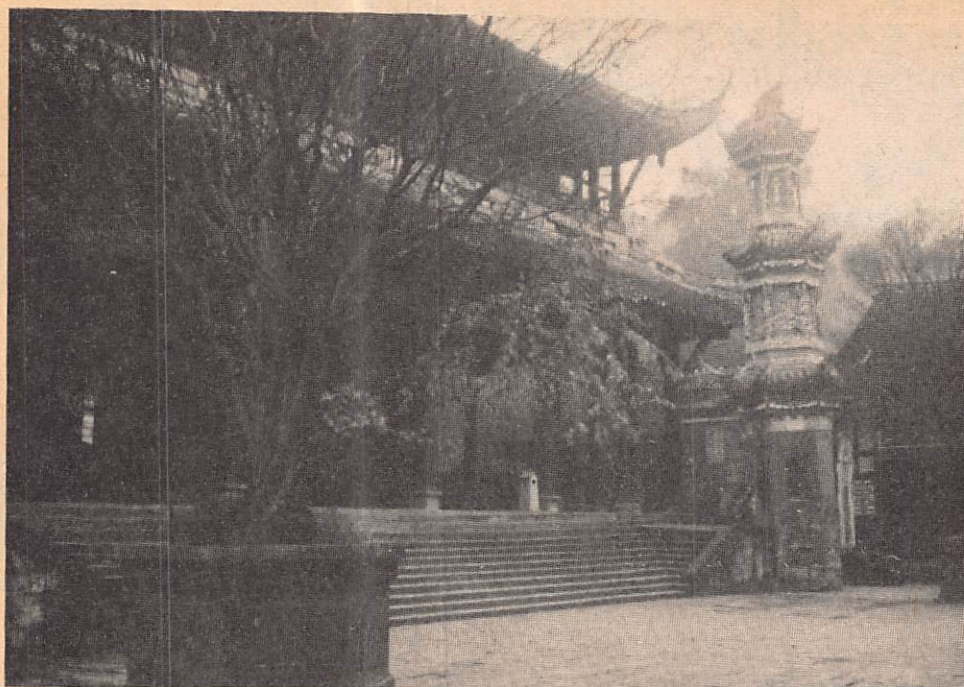
各地的文史館都是安頓一些搞國學舊聞的老知識份子的地方。及抵，有平房三間及一間小會客室。入內，有老畫家張孚芹先生與趙芝璧先生、李金彝先生三人在住。張孚老已八十高齡，身材甚矮，圓圓的臉，感覺很有點像相傳為宋朝石恪所繪的「二祖調心圖」中那個禪宗老和尚。趙先生與李先生亦滿頭白髮，約七十餘歲。他們各帶了一些他們的作品給我觀賞，張孚老並帶了昔年他與張大千合作的畫，還有黃君璧與徐悲鴻送給他的畫及謝無量送給他的詩箋等給我看。張孚老以畫花鳥著名，生平尤喜畫竹。故謝無量贈他的詩中有「殷勤為寫竹千竿」之句。趙先生畫仕女，李先生畫山水，亦各有造詣。一時交談甚歡，以限於時間促

迫，只得匆匆告別。臨別，孚老又出其近作墨竹一幅為贈，圖中除墨竹外並有設色竹筍多枝，意趣清新，題曰：「無數春筍滿林生」，「辛酉十月 杜工部詩意以奉高準先生教正」，除名章外，並蓋有「孚芹八十以後作」及「虛心高節」之圖章。十分珍貴。我幸好身上帶了一板在泰山買的石印，遂以之奉呈孚老為謝。

匆匆趕到杜甫草堂，已較預定到達時間遲了很多。遍找不見流沙河與傅仇兩人，經探問，知他們因久候不見我到，已於十分鐘前離去。失之交臂，實屬遺憾之至。

杜甫草堂為杜甫在蜀時所居地之遺址，唐末韋莊入蜀，首先尋得舊址，蓋了一間小小的茅屋。到北宋神宗元豐中呂大防知成都府，乃在故址重建草堂，南宋、元、明、清代均曾多次培修，主要是明弘治十三年（一五〇〇）和清嘉慶十六年（一八一—）兩次修建，大體奠定了現在的規模。民國以來，甚為殘破。到中共建政後，於一九五四年重建杜工部祠，並整理園容、培植花木，一九六一年起與武侯祠都已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時期似乎並沒有遭到什麼騷擾。（文革時成都被毀的古跡主要是市中心劉備時代遺留下來的皇城，被整個炸掉，改建了一所大禮堂。）現在草堂總面積達三百畝。

草堂地傍浣花溪，大門有互檐廊柱，式樣樸實大方，另有風味，使人覺得就應該是這樣



都江堰二五廟

。門上懸「草堂」兩字匾額，是集清代果親王墨跡而成，兩邊懸對聯：「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是杜甫自己寫他這居宅的詩句，由現代書家馬公愚所著。匾聯均筆力渾厚蒼勁，與中國古式木結構大門相應襯托，分外顯得古樸莊重。

入大門後，有兩棵大榕樹，濃蔭遮天，枝葉甚茂，跨過石橋，下有秋水一泓，兩邊翠竹森森，楠樹冥冥。漫階，有梅樹數十棵，可惜不是開花的季節。過梅林後有屋四「大廡」，內有兩面楠木屏風，一面是杜甫生平的介紹，一面是國畫「杜甫草堂圖」。壁上有清人顧復初所擬的著名對聯：「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蟠虎臥幾詩客，先生亦流寓，有長流天地，月白風清一草堂」。由近代書法家邵章補書。邵章為清代翰林，五十年代初任中央文史館館長。

過了「大廡」，是「詩史堂」，有前後兩進。前廳舉行着杜甫詩意畫展，陳列當代國畫家作品，包括齊白石、徐悲鴻、傅抱石、潘天壽等名家甚多，詩畫相配，意趣盎然。後進有杜甫塑像及歷代石刻杜甫像拓片，還置有材料，講究的桌椅，似乎可以兼作貴賓招待室或會議室之用。杜甫立像由當代雕塑家余厝所造，拈鬚行吟，容貌清瘦，顯示出憂國憂民的詩聖風範。堂前有一付對聯，上聯曰：「詩有千秋，南來尋丞相祠堂，一樣大名垂宇宙」，相傳為清

人沈壽榕所撰，當時無人可對。過了很久才有一位佚名秀才對出了下聯曰：「橋通萬里，東去問襄陽耆歸，幾人相憶在江樓。」聯由葉公錚所書。

出堂後有小橋至「柴門」，橋下有一曲清淺。過「柴門」後就是「工部祠」。「工部祠」式樣亦樸實無華，與宮殿式者大有不同。周圍濃蔭蔽廈。「工部祠」三字為小篆體，書者李植，是辛亥革命時同盟會會員，亦是傑出書法家，字如鐵劃銀鈎，極為美麗。廊柱上有聯曰：「錦水春風公占却；草堂人日我歸來」，為清代書法家何紹基所撰書。入廊下，室門兩側又有一聯，為清王壬清所撰而由老舍補書的，聯曰：「自許詩成風雨驚，將平生硬語愁吟，開得宗賢兩派；草言地僻經過少，看今日寒泉配食，還同吳郡三高」。原來「工部祠」中除杜甫外，尚有黃庭堅與陸游二人配祀。此聯中的「吳郡三高」，即是將杜、黃、陸三人比擬為吳郡江縣「三高祠」中的范蠡、張瀚與陸龜蒙三人。實際上，杜、黃、陸三人當然要比范、張、陸三人更高得多了。

既入室，中為清代所塑杜甫像，兩旁黃庭堅、陸游之像在焉。還有明代杜甫像刻石及清代「少陵草堂圖」刻石。黃庭堅與陸游何以在內呢？蓋因陸游亦曾入蜀，其愛國精神亦可繼杜甫而無愧，所以在清嘉慶年間重修草堂時就把他放進了。後來覺得杜甫旁邊一面放了陸游，

另一面還缺一個，而黃庭堅雖未入蜀，却被認為得杜甫之詩法，於是到光緒十年就把黃庭堅也加進去了。所以室內杜甫像旁之聯曰：「荒江結屋公千古；異代升堂宋兩賢。」此聯為清錢保塘所撰，由商衍鑿補書。

出了「工部祠」，東面不遠，就見到常受遊客攝影留念的那所茅草覆頂的碑亭，亭旁茂林圍繞，亭內立着「少陵草堂」石碑，碑為清果親王元禮於雍正十二年送達賴喇嘛還西藏，道經成都謁草堂時所題。以往我見到它的照片，還以為杜甫草堂就是這一小亭子而已，今親臨此地，才知它不過是其中最小的一景罷了。當然我也在它前面照了相。

在詩史堂前的另一邊，另有一門，題曰「花徑」，門內影壁上有以青花瓷片鑲嵌而成「草堂」兩個大字，每字有一公尺見方。「花徑」的夾道一頭也可通到祠堂，另一邊則有一九五四年整修時擴建的花園，有玉蘭、海棠、月桂、山茶等花木甚多，並有池塘亭榭，亦堪玩賞。

在「工部祠」與「詩史堂」東西兩側，還有分別叫「草堂書屋」及「恰學航軒」的陳列室，陳列着歷代的杜詩派本及外語譯本。

整個草堂的建築大都是木質結構，形體適量，粉牆青瓦，門高柱枋均為淡褐色，風格質樸雅潔。我以前見到的中國建築幾乎都是宮殿式及華麗的廟宇式的，總覺得與中國的古典詩及山水畫實在是合不大起來，常感納悶。今既遊杜甫草堂，才知中國的民間建築確實與詩及畫有着共同的氣質，它是這樣的平易近人，它是這樣的能與自然相溝通，真令人徘徊留連不忍遽去。

四、都江堰行

在成都的時間被擠得十分緊迫。來時的飛機既在西安誤了一天，而自重慶下三峡的船期也不能更改，當晚就要乘夜車去重慶。吃了已誤時的午飯後，就急忙趕赴都江堰。

都江堰在灌縣，位於岷江中游，距成都車行約一小時餘，號稱「天下幽」的道教聖地青城山也就在近旁。本來，都江堰與青城山原可共作一日勝遊。但現在我在成都已只剩這半天時間，當然無法並去。原想多留兩天，把青城山及正在建造李白紀念館的李白童年居住地江油縣青蓮鎮也一併遊覽瞻仰，但北京來的陪伴人員小顏却趕着要走。其實這些地方他也沒來過

，但他對瞻仰祖國河山好像都沒什麼興趣，只對參加餐宴有興趣。一路跟他談話中，他最感興趣的是聽我說到美國脫衣舞的情形。他是北京方面選了來一路陪着我的，總應該有點基本準備吧？但他對台灣及海外的情形却一無所知，對我個人的經歷也完全茫然。到各地各校參加座談時，校方本來並不知道我是誰，照理應該由他先站起來說個開場白或介紹詞，他却也不知道要這樣做。在陝西師大座談時，開始誰也不講話，因為都覺得不該由自己先講，結果就這麼乾瞪着很久，弄得相當窘迫。趕赴四川大學時我就告訴他：「你應該先說開場白」，他才知道。而臨時却又要我寫個簡歷給他，他好照着唸。對大陸的情況呢，他也都說不出什麼來。不管怎樣，他總是代表作家協會在接待我嘛，而他對大陸作家的情況却也幾乎毫無所知，除了知道魯迅和郭沫若之外，對於我所知道的大陸的中青年詩人的名字，他好像一個都沒聽過。講馬克斯主義吧，也講不上來，連考茨基的名字他也沒聽過。國民黨老說中共多麼厲害，好像他們真是無所不知的樣子，而現在，是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呢？真不知怎麼回事！

都江堰，如所眾知，為秦昭襄王末年由蜀郡守李冰及其子所創建。時在西元前二百五十年左右，建成後對四川的農田灌溉貢獻極大。『史記·河渠書』中對都江堰就已作了最早的記載，曰：「蜀守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晉常璩的『華陽國志』中更指出李冰築都江堰後，使川西平原「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可見四川之被稱為「天府之國」，正與李冰父子築都江堰是分不開的。後人為紀念李冰父子，於江邊建有「二王廟」，亦為當地之勝跡。

車子開過去，上了一個山坡，就先到了「二王廟」，此山是為百花嶺，它的南側較矮的就是杜甫詩句：「玉壘浮雲變古今」的玉壘山。奔騰而來的岷江就在兩山的西側自北而南的流過。江流到此分為左右兩道，分別稱為外江與內江，內江則就是當年李冰父子帶領群眾所開闢，玉壘山靠內江的一側均成斷崖，也是李冰父子開鑿而成。其工程最艱巨的地方是南端的寶瓶口，鑿斷山脊，留下一塊巨大的岩石在對面，江水從其間瀉湧而出，進入下游的渠道。留入江中的巨岩與江中沙洲相連，稱為離堆，

岩上建有伏龍觀，取「降龍治水」之意。真正要遊訪李冰的都江堰，應該要到這裡才對。但因時間關係，後來玉壘山及伏龍觀均未及登臨，只有遠望而已。最近我見到比我早八個月而同樣應作家協會之邀往訪的莊因所寫的遊記。他們沒有去泰山，其他所到之地則與我大致相近，他寫得十分簡略，但可知在各地遊覽點雖不盡同，而他也去了都江堰，却也同樣沒有登臨玉壘山和伏龍觀。大陸的接待人員好像都不大有耐心帶人多作遊訪，最關心的倒是要趕回飯館吃一頓較好的飯，這情形後來在杭州及紹興更是明顯。固然，成都當地的老劉、泰山當地的老侯與西安當地的老范都還是蠻熱心的。

二王廟依山而築，規模宏大面對岷江和著名的安瀾索橋。我們在山坡上從後面進去，自最後一進往下而走。但見滿山古木疏林黃葉滿地，層層殿宇，壘降其間。遠處江流潺潺，索橋懸蕩，更遠則群山環繞，秋雲靄靄，真感詩意溢然。「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正是范文正「蘇幕遮」詞中的意境啊！

二王廟初名崇德廟，還是南北朝南齊時代所建，時為西元四九年（那年南齊連換三個年號，所以用中國紀元就很難說了）。到宋代以後，因李冰父子已相繼被勒封為王，遂稱二王廟。依山拾級而下，後進幾棟亭子都殘破未修，其中原來不知放什麼塑像，反正是沒有了。主殿則有前後兩棟，分祀李冰與李二郎之像。兩座像都是新塑的，均高大魁偉，神采奕奕。李二郎的像是立像，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身著藍袍，一手持工具，一手提起袍角，昂首而視，英姿勃勃，恰似正在進行劈山修堰的工作。用大陸上以往習用的詞句來形容的話，該說正是「充分塑造出了工人階級高大的英雄形象」吧！李冰的像則是坐像，身著紫袍，額下有短鬚，定睛凝思，手持絹圖，彷彿治水方案已了然胸中。

從李冰殿再向前拾階而下，有灌瀾亭，旁邊照牆上寫着「深淘灘，低作堰」六個大字，原來這就是李冰當年綜合他給岷江的體驗而歸納出來的六字口訣。我忽然想起「毛主席」氏曾在文革時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九字真言」，看來原來是從這兒套過去的。據告毛氏曾於一九五七年來此，那麼，正是這樣了。但李冰的六字訣至今還有用，而毛

氏的九字訣却已再也沒人提了。

二王廟的建築也有點特色，除了兩進大殿是一層到頂外，其他房子還很多，都是木造兩層，屋角却翹得非常高，柱子很細。與中原的建築風格顯然有不同之處。

既下到河邊，就到了安瀾索橋。安瀾索橋歷史亦極悠久，始建年代未詳，宋以前稱為「珠浦橋」，宋代稱為「評事橋」，到明末被毀直到清嘉慶年間，又由當地儒生何先德夫婦倡議並蒐集資料，重建索橋，所以民間又稱之為「夫妻橋」，建成後，定名為「安瀾橋」。這座橋，我小時候在當時的「旅行雜誌」上見過它的照片，它以木為樁，以竹為纜，上鋪木板，旁設翼欄，長達一華里，共有近十個樁架，每兩架之間的索纜都作弧形下垂，飄飄蕩蕩的，那麼長，那麼美。它與台灣的吊橋不同，不是上下相對的雙弧，而是只有單向下垂的弧，一弧一弧連綿不絕，看來分外靈巧美妙，婀娜多姿，真是充滿了浪漫的情調，印象十分深刻。

但現在這安瀾索橋却已非當年照片上那一座。原來，索橋原位的西半邊現在修了一座「外江閘」。索橋遂被往下游移了百來尺，並把木樁換成了水泥樁，竹纜換成了鋼纜。雖然遠望與原來的外觀仍相去不遠，風味却已大不相同。木樁竹纜那種無限醇美的鄉土古意固然已經煙消雲散，而每兩樁間的下垂弧度也減少了。我來回走了一遍，沒有什麼飄飄蕩蕩的感覺。岸邊那些裝鵝卵石的竹籠也已消失，代替它的是鐵絲的籠子。外江閘只閘住半條江面，只有幾公尺高，上下水位相差甚微，看來不會有什麼很大的功能。而却就任它這麼粗暴的撕裂了這如詩的畫境……。走着走着，心中不覺一陣悵然。像童年的夢般已永遠消逝在塵世裡，美好的事物竟都是這樣容易的在時光裡流去……

草色煙光殘照裡，
無言誰會憑欄意？
望斷關河，
爭忍凝眸，
更與何人說！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九日於美國
柏克萊）

老Q新傳



柏仁

續

五、阿Q高升 小D戴帽

阿Q的預言，果然不錯。一九五八年初，省委第一書記頒下「專令」，提升阿Q為縣委委員兼區委書記。這是破格提升，可謂更大勝利。吳媽聽到，喜不自禁。阿Q却泰然自若：「我早就猜到了。」

阿Q的榮升，雖說沒有當年趙太爺的兒子中秀才那樣，鑼聲噹噹的報到莊裡來，但榮耀却過之。不過，那迎送的盛宴，足使區、鄉幹部們索日逢年了。

至於阿Q本人，則在上任前夕，肅立領袖像前，心裡唸叨着：「爹親娘親，不如偉大領袖親。」然後連鞠三個大躬。鞠躬之後，猶感未能表盡他對領袖的謝恩與崇敬。於是又跪下，叩了三個響頭。然後叫吳媽照辦。吳媽來得簡單，沒鞠躬，只上了三支香，跪下去也叩了三個頭。

區委爲了歡迎阿Q上任，整整準備了一週，由住宅到辦公室，一切由副書記親自安排。這個新書記是受過偉大領袖接見，和偉大領袖握過手，省委第一書記親自任命的啊！

阿Q上任第一天，最深刻的感受是：人們對他的稱呼變了。原先在新末莊，雖說也是書記，那是莊裡的小小支書，所見都是鄉親，「Q哥」、「老Q」，多年叫慣了。來到區裡，無論屬下或鄉民，都一律恭稱「Q書記」。以前阿Q從沒想過，這「書記」二字是啥意思，更不知它是由俄文翻譯而來，但此刻却完全明白：「書記」就是最高長官，要錢有錢，要糧有糧。阿Q完全能夠無師自通。

有了權力，有了地位，就是再等下一次機會了。什麼是機會？阿Q想了老半天，得！就是運動。阿Q明白，他有今日，全靠那次「反右」運動。沒有那次運動，他發夢都不會有今天的好運。因此他渴望偉大領袖再發動新的「運動」。他那焦急的心情，就像當年在賭攤上乍贏一局，等待莊家趕快發牌，開始第二局一樣。

必須承認，阿Q確實是吉人天相，福星高照，就在他升任區委書記那年冬季，偉大領袖便提出成立「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啥玩意兒？誰也不知道，阿Q也不知道。他也無需知道，知道與否，無關宏旨。只要知道這是運動，是偉大領袖發動的，這就足矣。

偉大領袖說：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是建設共產主義最好的農業組織。

這高論，阿Q不懂，也無需懂。這絲毫都不影響他堅決貫徹執行。他執行偉大領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是根據什麼理論，而是憑着對偉大領袖的無限信仰和無限崇拜。這一點，阿Q比禿帥整整先進八年。禿帥是在史無前例之年才提出：「偉大領袖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文化大革命時才提出來？你算什麼東西嘛，老子比你早多了。

人民公社的定義，阿Q雖然不懂，關於共產主義，却聽說過：共產主義是天堂。於是為了達成人民公社，阿Q提出一條口號：「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就是天梯！」為了他的區在全國最早實現「公社化」，Q書記在全縣廣播大會上發表演說：

「你願意不願意上天堂？（誰敢說不願意？）上天堂沒有天梯能行嗎？」

這句名言被人民日報一名記者聽到，認為這個比喻言簡意賅，邏輯性強。這位記者不愧是無產階級記者，不作奴隸式報導，而作創造式報導，於是Q書記這句話變成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橋樑！」霎時間，這十四個大字風行全國，成為推進「公社化」的強勁口號。

不過，口號終究是口號。要農民聽，可以；聽完就土地交公，把馬、牛、犁以及豬、羊、雞、鴨統統交公，農民不幹。他們覺得，這和共產主義有關係，但和天堂沒啥關係。因此不僅不交，且把畜、禽宰之，食之。這樣以來，短短幾天，Q區幾乎變成了無豬羊、無雞鴨的「四無區」。下一步就要屠殺大牲畜。

阿Q一看，口號不靈。於是採取政治措施，當即宣佈：「不入社，便是不愛共產主義；不愛便是反對；反對共產主義，便是反革命！」

還是偉大領袖說得對：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於是全區農民，紛紛入社，僅僅半個月，Q區



昂着頭唱：「得，鏘，鏘令鏘，鏘鏘！」

便實現了「公社化」，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公社化」的先進區。阿Q和Q區，一起在全國揚名。

但是，切莫忘記，偉大領袖還有一條語錄，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頑固份子總是有的。」

在Q區也正是這樣。有幾戶農民頑固不化，任你怎麼說，他們就是不入。其中最頑固者，便是阿Q的兩個盟弟——小D和王胡。王胡經吳媽一再勸說，雖然不願意，總算勉強入了。這個小D，資本主義思想嚴重，克勤克儉，掙扎了幾十年，總算置得一頭牛、一張犁、兩口豬、兩隻羊、一群雞鴨。這些用血換來的財產，今天要他統統交公，這……。任憑吳媽怎樣說，概不理會。你有千條妙計，俺有一條定規，就是不入。

忽一日，阿Q駕到。拍着炕沿對小D喊：

「早入晚入，早晚都得入，誰敢不入！」

小D一想，阿Q雖然是書記，但畢竟是結盟大哥，俺給大哥起過房，供過糧，對大哥說句，總該可以吧？於是也喊道：

「啥人民公社？就是要收俺的幾畝地和俺的老牛！俺不是地主，憑啥把俺的財產充公？」

「你這是破壞！」阿Q大吼一聲，走出門去。

第二天，阿Q派來民兵，把小D押送縣城，關進監牢。

偉大領袖說過：典型的意義最偉大。一看小D的下場，其餘幾戶頑固份子，再也不敢抗拒，終於紛紛入社。

至於小D，雖然不久獲釋放，但已不再是貧農，而是交由「群眾專政」的反革命份子了。

人民公社成立了，一切財產共有了，這無疑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果然不久，偉大領袖便頒下最高指示：中國已經提前實現了共產主義。

阿Q立刻下令區委宣傳部，發動全區中小學生，利用一切宣傳工具，到各鄉、各戶去宣傳：「中國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大家都去公共飯堂吃大鍋飯去！」

阿Q想到：既然是共產主義，就應該徹底共產。於是靈機一動，命令全區各級黨組織，逐門逐戶，把口糧、白菜、蘿蔔、鹹菜，統統集中起來，每莊辦一個大食堂，男女老少，都吃一鍋飯，都喝一鍋湯，吃喝一律不要錢。這就叫共產主義大食堂。

阿Q這步棋，又是一大創舉。不久，全省推廣，全國普及。人民日報專題報導：實現共產主義的重要標誌——Q區建立共產主義大食堂，吃喝一律不要錢！

阿Q和Q區，再次轟動神州大地，再次傳進中南海。偉大領袖高興地對夫人說：

「我早就說過嘛：阿Q一貫正確。他才是我的好學生。」爲了這句話，第一夫人因此憤憤不平了好幾個晚上。



阿Q煉鋼 王胡坐牢

回顧那段歲月，阿Q真正是鯤鵬展翅。

神州大地的政治運動，一項又一項，接踵而來。就在實現「公社化」，又實現「公共食堂化」之後，偉大領袖又頒下最高指示：「全民動員，大煉鋼鐵！」阿Q對這個運動，當然又是歡呼雀躍，喜如兒時過年。

不過這次却碰到一個難題——對於煉鋼，阿Q實在一竅不通。這鋼可怎麼煉呢？如果是燒磚煉瓦，雖說沒進過窯，也還見過；如今偉大領袖要煉鋼，阿Q不僅沒見過，也沒聽說過。要說鋼，阿Q也只見過未莊鐵匠爐補鍋和打馬蹄鐵；至於鋼，當年只在紹興城看到過打鏈刀和菜刀，據說那刀又是塊鋼，但那鋼是那兒煉的，却聞所未聞，哪兒知道怎樣煉鋼呢？想在煉鋼運動中也能領先，總該知道用啥可以煉鋼才是。這鋼可到底是怎麼煉出來的呢？阿Q為此苦思冥想，夢寐以求，但却毫無門路。人在這時候，最需要的是啓示，阿Q此時最需要的也正是啓示，那怕是不着邊際的啓示，都能在阿Q風發的大腦裡激起智慧的火花，而助其大展鴻謀。

就在這酷暑思雨的關鍵時刻，偉大領袖頒下八個大字：「就地取材，土法上馬！」

這八個大字，立刻給阿Q的大腦燃起了智慧的火焰，他馬上下令各鄉各莊，把所有當年從地主家裡分得的酸菜缸，全部集中到打穀場，排成一行。鋪上砂底，算是爐底；鑿個洞口，算是爐門；上懸一個大瓦管，算是煙筒；沒有鼓風機，裝上木風箱；一個不夠，多裝幾個。於是Q式土高爐便問世了！因為不是一個，而是一行，人民日報稱做「小土群」（小型土高爐群——作者）。

有了「小土群」，尚缺燃料。這個不難，太行山上有森林，阿Q組織了煉炭隊，開進山裡，大片森林被伐倒，大批木炭源源煉出來。

有了燃料，還缺礦石；沒有礦石，怎能煉鐵？沒有鐵，怎能煉鋼？這個難題不小，——那時不但太行山尚未勘出鐵礦，本省和鄰省也沒有。這也難不倒Q書記——Q書記已經是一區之主。在革命運動中，他學會了最有效的一招兒：經濟困難用政治措施解決。於是他眉頭一皺，向全區發出號召：「實行鋼鐵抗旱！」命令全區，除了公共食堂的幾口大鍋，一律砸碎交出；除生產工具之外，一切鐵器以及門、窗、箱、櫃等一切器物上的鐵件，也要統統拆下交出。誰交得多，便是煉鋼積極份子；誰敢抗拒不交，就是破壞煉鋼運動，就是反革命！

但是農民在失去土地、牲畜，又失去了吃飯的自由之後，再也沒人響應書記的號召了；人人裝聾做啞。但是阿Q對付農民最有辦法，馬上命令民兵：組成「鋼鐵抗旱大軍」，到各家各戶去「挖鐵」。這是Q書記的指示，區武裝部的革命行動，誰敢阻擋？於是所有的鍋被砸碎，所有的鐵器被挖淨，不僅拆去了門環、窗框以及箱櫃上的鎖扣，拔淨全區牆上的每一根鐵釘；就連各莊碾磨上的鐵軸也被拆去。Q書記的政治措施，立竿見影，鋼鐵抗旱大軍，戰果赫赫！

但是別忘了偉大領袖那條語錄：任何運動中，都有頑固份子。在煉鋼運動中，全區唯一的頑固派，是阿Q的另一個盟弟——王胡。他竟敢坐在鍋蓋上，不准拔鍋。——雖然不再燒飯，但他每天用鍋燒水燙腳，因為腳骨受寒，關節痛，每晚必須用熱水燙一遍，第二天才能走動。他不明白，燙腳是私人小事，鋼鐵抗旱是關乎煉鋼運動成敗的國家大事。怎能以私人小事，抗拒國家大事？這「鋼鐵抗旱大軍」是區武裝部所派，怎麼抗拒得了？這大軍來到王胡家，把王胡從鍋蓋上拉下來，揭去鍋蓋，一錘將鍋砸碎。王胡一看，不僅吃飯沒了自由，連洗腳的自由也沒了，氣得一時失去理智，破口罵道：「這是什麼朝代？連老農的鍋也要砸碎！」

單是抗拒砸鍋，罪行已屬不輕，居然還罵起朝代來，這不是地道的反革命，是什麼？王胡立即被五花大綁，押送縣城，關進大牢。

在造爐、燒炭和砸鍋之後，阿Q煉鋼終於成功，Q區的鋼鐵元帥終於升帳了！

這是全國大煉鋼鐵運動中，第一個鋼鐵元帥升帳！這是人類歷史上，土法煉鋼的第一個鋼鐵元帥升帳！這是劃時代的大事件！全縣轟動了！全省轟動了！全國轟動了！從中央到地方、電台、報紙、雜誌以及一切宣傳工具，都為第一個鋼鐵元帥升帳喝彩，都為劃時代的大事件喝彩，都為阿Q的偉大勝利喝彩。各大報的社論題目是：「開創了中國煉鋼的新紀元！」、「為第一個鋼鐵元帥升帳歡呼！」、「超英趕美第一步！」至於阿Q的名字，各報一律用大號粗體字套紅刊出來；在廣播裡，播音員用崇敬和歌頌的語調唱出來；阿Q的相片，成了許多雜誌的封面。

全國都到Q區取「經」來了！阿Q每天要接待無數的來訪者。各省、各市、各地區的書記們，誰不為煉鋼而大傷腦筋？誰不為自己的「鋼鐵元帥」升帳而焦慮呢？誰不在這次運動中備受煎熬！但是，他們聽過Q書記傳「經」之後，立刻信心百倍，把握十足，歡天喜地，帶著「Q經」趕回轄區，大展鴻圖。於是轉瞬間，Q式「小土群」便在全國星

羅棋佈，酸菜缸燒木炭，燃遍神州大地，轟轟烈烈的大煉鋼鐵運動，不僅在城市，在鄉村也如火如荼了！

實現鋼鐵大躍進了！一天等於二十年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小土群」的熊熊火焰光芒萬丈了！「Q經」遍地傳的六億神州，霎時變成全人類的輝煌榜樣了！

百姓挨餓 阿Q新婚

正當人民公社陷入一籌莫展，「小土群」煉出廢鐵一堆時，阿Q却被偉大領袖特調進京了。至於擔任什麼官職，未見詳細透露，總之是進入中央首長行列。

人民公社帶來天災，大食堂吃空了倉底，餓鬼統治了米糧川；大煉鋼鐵傾家蕩產，煉出的鋼好像玄武岩，比爛鐵還爛。阿Q却平步青雲，進京外官。

多少海外愛國之士，無不對此憤憤不滿。

孰是孰非，如何分辨？

海外人士不理解，有情可原。因為沒有經過思想改造，不懂偉大思想的真諦。

大陸人經過漫長的思想改造，他們不會這樣想，更不會這樣講（魏京生等異己除外）。他們懂得，偉大思想有一條重要理論，叫做「動機第一效果第二論」。人民公社，大煉鋼鐵，雖說有其缺點（絕不是失敗！）但目的是上天堂和超英趕美，那動機是革命。阿Q緊趕運動，那思想自然是革命思想；在革命思想指導下，砸鍋煉鋼，自然就是革命行動。何罪之有？偉大領袖調他進京，正是知人善任。有何不當？

阿Q接到進京的調令，喜出望外。高興之餘，還做了一件善事——指示縣人民法院釋放王胡，給以小D相同的待遇——戴着反革命帽子，交群眾監督改造。

話說五十年代末期，阿Q的官運真正是紅裡透紫，紫中生金。進京不久，偉大領袖便發起了反海師的鬥爭。

這位海師，戎馬一生，殺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友邦鄰國，可謂英雄一世。然而在學習偉大思想的造詣上，却遠遠不及阿Q。自以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才是忠於領袖，忠於黨；却不懂直諫將被追究動機，而動機孰忠孰奸是無可證明的。海師反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雖然歷史證明：他沒反錯。但他的動機是「反對偉大領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那動機分明是反動的

。如果向偉大領袖請罪，還在罷了，居然執迷不悟，頑固到底，那就咎由自取了。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阿Q雖然還不是中央委員，但却受到特邀，列席參加。會上批判海師者，不乏其人，僅領銜批判就有三人：禿帥、偉大領袖的兩大刀筆金剛——康朱筆和陳邪神。禿帥出身行伍，不通文墨，不善文鬥；康朱筆只會裁臧、誣陷和判決；真正的理論家，只有一個陳邪神。但是就在陳邪神的尖銳、入骨的批判之後，偉大領袖也未盡滿意。最後指着阿Q對海師喊道：

「你想為民請命嗎？你聽聽貧下中農擁護你嗎？」

阿Q霍地站起，直指海師，大吼一聲：

「反對偉大領袖，就是反革命！」

偉大領袖聽之大悅。朱筆和邪神，都頓覺遜色。怎能不遜色呢？身為偉大領袖的兩大刀筆金剛，却不曉得偉大領袖最想聽到那句話，而阿Q却脫口而出。有什麼不服氣的？

就在廬山會議之後，偉大領袖特准，補選阿Q為中共中央委員。於是阿Q便住進了釣魚台了。

阿Q住進釣魚台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宣告「三年天災」開始。神州大地的Q式大食堂依然吃飯不要錢，但不是吃糧食，而是吃豆糲粉做的糰、玉米骨粉熬的粥、榆樹皮燒的湯。這也並非白白供應，而是自己交出豆糲粉、玉米骨粉和榆樹皮之後，才能取得入伙資格。那年月真是顆粒不收嗎？不是！但公糧尚未交足，那裡有自己的口糧呢？那時候人們最大的奢望是捕一隻烏鴉，或捉一隻老鼠。可是烏鴉和老鼠的影子都見不到了。

Q區究竟餓死多少人？沒統計過。在神州大地，人口減少，似乎不一定是壞事。

阿Q住進釣魚台，和同級首長享用同樣的「特供」（高幹食品及生活用品特殊供應——作者）。這「特供」和年景豐歉無關。所以沒多久，阿Q一掃原來的山民面貌：膚色白裡透紅、血乳交融、春風滿面了。阿Q從未感到生命力這般強壯，生的欲望這般旺盛，體內有這樣多的能量；他覺得真正是更軀易骨，再度青春了。

現在阿Q決定做一件事，一件夢想已久的事——他要建立一個新家庭。他已經不是趙府的短工，也不是山溝的土幹部了，而是住在釣魚台的中央首長了。吳媽已經……何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呢！「我的兒子將來比你強多啦！」這年輕時代的豪言壯語，至今仍在腦際。廢除舊婚姻，建立新家庭，這是「婚姻法」賦於每個公民的權利。舊換新，老換青，阿Q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首長要辦這種事，極其容易，極其順利，又極

其方便，保證稱心如意。

每位首長都有一名秘書。秘書，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是必需的。秘書職位不僅是滙報、抄寫等，那是平庸瑣事。最重要的是體會首長意圖。何謂「體會首長意圖」？就是憑慧眼去觀察首長的內心世界，探索、揣摩首長想做而又不想說的事。這份工作，確實不易。但做秘書有否發展前途，正決定於有否這種本領。會者不難，難者不會，做首長秘書，大都具有這種天才。——這是選擇秘書的首要標準。

Q首長的秘書，不僅符合標準，且才幹超群。對首長的眉梢和鼻翅的一牽一動，既能體會入微，更能深明尊意。因此行動總是在首長啓齒之前。阿Q想「老換青」，他早已看透，且早已從兩方面着手準備了。其一是派人去太行山，說服吳媽讓位（阿Q根本沒帶她進京），理由是「國家的需要」，條件是保證吳媽的生活費用，直至最後一口氣；其二是物色對象，要求是：年青貌美，願意為首長貢獻一切，未曾結婚。

兩方面都十分順利。吳媽明白：阿Q的官愈當愈大了，廢黜她是必然的；「老換青」的事例，他早已聽到許多了，何況她又沒生個一男半女，所以

她甘願讓位。至於找到的新對象，完全符合阿Q的要求——未婚，年輕貌美，決心為首長貢獻一切。只有一點不足：她的祖父是地主，這是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且無法改變。對這一點，阿Q在見面之後當即表示：「嫁給無產階級，她就是無產階級了！」說罷就地拍板，女方也十分高興。

一九六〇年，阿Q結婚那天，北京市糧食局宣佈：無業居民及待業人士，口糧標準由每人每月卅斤，改為廿四斤半；一般職工由卅一斤改為廿九斤；食油由每人每月七兩，一律改為五兩。

但是首長婚禮所需一切，屬於特供，不在此限之內。婚禮盛大而隆重，自不必說；同志們紛紛祝賀：早生貴子，為革命養育後代——革命需要接班人。

新夫人果然不負眾望，第二年便生下一位公子。阿Q自然喜出望外，在彌月盛宴上，當眾宣佈：取名小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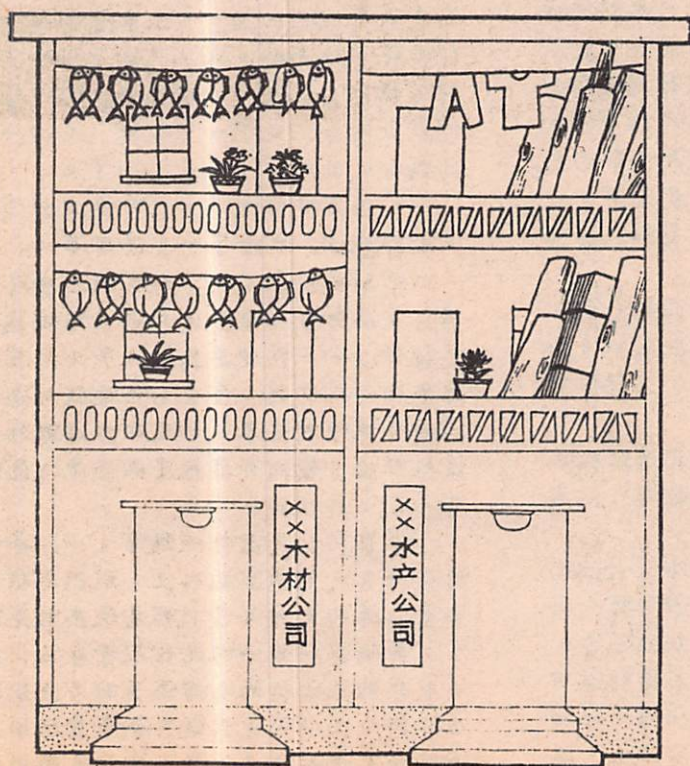
阿Q的新生活，真是萬事勝意，福祿呈祥啊！

（待續）

靠木得魚 近水得木

鄒祥保

原載《諷刺與幽默》



在西雙版納 的日子裏

蔡可風

(續)

汽車一出思茅，向南，就很快要進入西雙版納自治州境內了。這時所有車篷都早已掀開，再沒有一個人靠着背包打瞌睡。車行不到兩小時，就到達了『普文』。陳連長突然命令司機停了車，讓我們全體下車稍作休息。他站在公路的中間笑着說：以我的身軀為界，北面是思茅，南面是西雙版納，你們看看有什麼不同？

事實上，前面的景色和後面的景色實在難分差異。我們却寧可他早點衝過這“交界點”。陳連長倒像不太着急似的度來度去。忽然，他走到我們面前說：「這幾天以來，跟你們生活在一起，說句真心話，我真是很喜歡你們呢！」

我一下子被他的話吃驚住了：幾天以來，我們對他絕對服從，也不曾對他講過一句心裏的話，他憑什麼對我們流露出這種情感呢？我

們各自在彼此間劃了千百道鴻溝，誰知「感情」兩字却有如此具大的超越能力。我的服從，實際上一方面為了自保，另一方面不無反感的情緒。這一下我却完全軟化了。大概他也很快發覺自己感情太外露了，他突然向後面車隊的人大叫要他們上車，却又別轉頭來對我們笑着說：「西雙版納，我也是第一次到這地方呢！」

這裏，就是西雙版納了！

從普文到景洪的路上，我們都瞪大眼睛去欣賞沿路的景物。我們極盡我們的視聽之能力，不願放過一草一木。但我仍無法找到這一帶與思茅以北地區的大差異來，即使駛近了禁獵的『野獸山』，也只能看到飛禽而不見走獸。也許，我們浩浩蕩蕩的汽車馬達聲，把它們都給嚇跑了吧？突然，幾個同學齊聲呼叫，把我也帶進他們的視野：一棵高大的木棉花，正在

盛開。我不禁啞然失笑，木棉花也沒見過嗎？不！我忽然悟出他們驚呼的理由了——現在正是臘月時分，廣東的木棉花是四月才開放的。木棉花開是溫暖季節的象徵，而這裏的木棉花正在開放！西雙版納是沒有寒冷的嗎？

「瀾滄江！下面就是瀾滄江！」又是一陣歡呼，我們幾乎忘記了集中在車廂同一側帶來的危險，向足下的深谷望去——我們所在的山和對岸的高山夾着了又深、又狹窄的河谷，瀾滄江就在這河谷裡靜靜地流過。我曾經在書本上領略過從橫斷山搶道向南，流經雲南，緬甸，老撾，泰國的瀾滄江—湄公河的氣勢。想不到在這兩座山間，它顯得那麼馴服，那麼沉靜。

我們聽從了命令全部下車。原來，這座橫跨瀾滄江兩岸的鐵索橋是沒有橋墩的。由於河寬一百多米，橋的跨度不小，爲了保護鐵橋，橋只准許兩輛卡車緩緩地對開。故此，橋的兩岸公路，正停了十多輛車，排着長串等待過橋。乘客們則通常下車，徒步走過鐵橋。

，倒更能滿足我的好奇心。但可惜規定我們只許邊走邊看，不能在橋上停留。過了瀾滄江的大橋之後，就是西雙版納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允景洪。

景洪又名允景洪，你不難在中國地圖上找到它。它座落在雲南省之南端。有一條航空線通向那裏；即等於說：這裏應該有一個飛機場。從景洪在地圖中所示的圓圈大小判斷，這城鎮該有不少人口，城鎮的大小也不下於思茅才對的。思茅給予我們相當好的印象。試想像一個傣族人的城市，將對我們有多麼巨大的吸引力呢。我們知道我們將在景洪停留時，真高興得無法形容。

我們的車隊離開大橋不到半小時，又停了下來。陳連長先跳下了車，說：「景洪到了，全體下車，我們在這裏只停留一小時！」天啊！一小時，够嗎？

我們紛紛下車。車停在一個十字路口，時值正午，行人稀少。我們四處張望，要找一個路人問問到城鎮裏去的路。恰好，一個穿着幹部服裝的青年騎着自行車在前面橫過，我連跑帶叫地追上去攔住了他，問道：「同志，請問到市中心往那條路走？」

這青年注視了我一刻，笑咪咪地說：「你是個廣東人吧？」我的廣東口音他一下子分辨得出來，看來，他也是個廣東人了。我一點頭，他就改用了廣州話對我說：「喺！我好久沒



早晨的瀾滄江江畔。

有講過廣州話了，什麼？市中心？」

他把手向我們所在的十字路口一劃，說：「這裏就是！這裏就是景洪「市」中心了！」

我們順着他的手，把我們所在的地方細細地觀看了一遍：構成十字路口的有四座三層樓的洋房。一間是「新華書店」，一間是百貨公司，一間是飯店，還有一間也是百貨公司；延伸開去，還有幾座平房，却都關了門，不知道該是什麼商店了。這條路是用雞蛋大的碎石鋪成，凹凹凸凸的；道路却很寬，約有二十米開外。其中一條路頗爲美麗，夾道種的是鳳凰木。沿着這條路，可通向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和居民住宅；另一條道路對比之下顯得很荒涼，將是我們行車的路綫。

當我們向這位廣東老鄉追問那所「熱帶作物研究所」時，他只是一個勁的搖頭，一小時的停留時間是不足以去遊覽的。臨別時，他笑着說：「要來西雙版納找現代化文明的地方，什麼也找不到；但要看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痕跡，要住下來慢慢看才看得到。」

雖然這位廣東老鄉這麼說，仍減不了我們的憂興，我們仍在這條鳳凰木街上徜徉了一個小時。本來，我們都到過大城市，對漢人居住的大城市自然很熟悉，我們却希望看一看傣族人的城市罷了。既然它不存在，我倒不會刻意的追求，能够在有限的人生之中，一下子看到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加上我們一直生活着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實在是一種幸運吧？



從景洪到勐海的一段路，雖然仍屬於曲折。但比起以前所經歷的，却是相當的平坦。雲貴高原從貴州省向南，可以看成是一個大斜坡。在昆明地區，海拔高度為一千九百米，來到景洪、勐海一帶，就只有海拔一千二百米左右了。這一帶的壩子的密度相當高，就西雙版納地區，較大的平壩就有十二個之多。西雙版納這個名字，實際上是一個傣族話的音譯。西，就是十；雙，就是二；版納，就是壩子。合起來，就是：十二個壩子的意思。稍通地理知識的人都知道：盆地的氣候是相當宜人的。加上北面的哀牢山、無量山這幾道天然屏障，使這地區與外地相當隔離。自然賦於人們以「世外桃源」的遐想，更增加了這地區的美感。連我們的車隊在這萬綠叢中穿行，也帶來了詩意了。連續幾天的旅程，我却一首詩也沒寫上，真有幸負天公作美之感。而今，在剩下的幾十公里行程內，要鍊出一首像樣的詩歌，真有臨陣

磨槍之急。於是愈急愈不能成句了。

一陣冲天的鑼鼓聲，把我從沉思中驚醒。陳連長早已下車，招呼各車上的同學：以車為單位排好隊，在夾道歡迎我們的解放軍戰士中間進入團部。我們一個個風塵撲撲，背着掛包徒步而行。與旗甲鮮明，衣裝簇新的戰士們形成了強烈的對照。我們走到一個小操場之後，就按原來的排列坐下，等待團部的首長訓話。

不久，來了幾位年紀較大的軍人。我們不難猜想到：這幾個人必定是團一級幹部了。其中一位較年輕的幹部暫時充當了司儀，向我們介紹了這個團的團長、政委和副團長。

這個團的番號是〇二八二部隊。一般地，每個團的建制都擁有一個番號。但這個番號是會變化的。當部隊調防時，番號往往改變。至於這個團所屬的第十四軍，第四十二師，第一二四團……這個名稱，當然不會改變了。這個團的團長，是最近由副團長提升的。在文化革

命期間，這個團在支持雲南八·二三派上立了功。原團長最近越級提升到第十四軍軍部當副參謀長去了。於是，連帶着各級大小幹部都有了提升的機會。這應該說是他們在文化革命中的成果之一。

幾位首長講的話都十分簡短。大意都是歡迎我們，按毛主席的指示來這裡接受再教育。預祝我們能成爲工農兵羣衆歡迎的知識份子……這一類的話題，我們耳熟能詳，我們很能保持，在任何場合下，能遵從形式做到令人滿意的。學生之中，幾位善於做這類工作的人，早已草擬了決心書，準備出來表決心。這一次却很例外地被團長擱置了——這時天色已晚，我們仍未曾用晚飯，首長們還爲我們安排了一場由部隊對學生的籃球比賽呢。

飯後，我們獲得了一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雖然，我們都被分派了床位，但誰也無心呆在房子裏。都想到團部各處走走。呂哲因爲是個籃球好手，被選作學生球隊參加比賽去了。我們一行幾個廣東來的學生，就在營地附近踴躍熟悉一下環境。

「喂！老大，過來，老大！」

起初，我們聽到一些戰士衝着我們這樣喊時，倒沒有在意。反覆幾次之後，我們才知道，這個戰士給我們送來了一個雅號：「老大」來了。大概是由於我們是一群大學畢業生的緣故吧。我們卻沒有走過去，只是報以友善的微笑就走開了。

這個團部，約佔一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積。不但宿舍、膳堂、禮堂、辦公室等一應俱全，還設有泳池、浴池和小賣部（小型商店）可以說是一個相當獨立的小天地。小賣部的物品只供應本團軍人及其家屬，雖然物品種類和數量不算豐富，但也已經很能應付簡樸的軍人生活了。游泳池內，人的密度不大，但卻沒有任何救生人員和救生設備。戰士們都穿着清一色的又寬又大的白色內褲往池裏跳，同行的幾位女同學早已轉身離去，我們也只好與她們一道回去看部隊和學生的球賽。

球賽正在進行。上千的士兵和學生把籃球場圍得重重疊疊、針插不進。我們只好到膳堂裏挪了幾張長條凳子來墊高自己。才勉強看到了。

正看得入迷，突然聽到了轟隆一聲巨響。把我從凳子上嚇得摔了下來。站在同一條凳子上的韓修賢，因爲凳子失去平衡也給摔了下來。他倒沒有埋怨我，却拉着我向剛才發出爆炸

聲的地方走去。在一間散發着煙硝味的房子外面，就給幾個軍人擋了回來。他們一邊擋着，一邊嘴裏嚷道：

「看什麼！看什麼！有什麼好看的！一個流氓用手榴彈自殺了！有什麼好看的！」

「回去！回去！快給我回去！」

奇怪的是球賽仍在正常進行，沒有因爲這件突發事件而停頓下來。然而，一部份人的騷動使得那幾重的人牆綻開了一個大缺口。我們立刻回去，補在這缺口上。這才知道：團的幾位首長都來了觀看這場球賽。球賽的比分是解放軍略爲領先了。看來，團首長們頗爲重視，他們絕不希望解放軍隊會敗給學生隊的。他們的希望也沒有落空，比賽到終了，結果還是解放軍隊領先，贏得了比賽。

本來，我以爲這天晚上，將免不了要集中起來，談談關於那位用手榴彈自殺的人，並且強調一下「階級鬥爭」之類問題的。誰知，却是隻字不提，而且以後也沒有再提起過。只是到我們跟這裡的戰士們混熟了，才從他們的口中了解到：那位拉響手榴彈自殺的，是一名團參謀。至於什麼緣故導至他自殺，就無從查究了。

到達西雙版納的第一天，即來到我們所隸屬的解放軍第一二四團的第一天，就上了這沒有明確答案的第一課。

第五章：在團部駐地

一陣軍號聲把我們從睡夢中驚醒，這一次，我們都已學乖了，沒有人忙着穿衣，也沒有人忙着整理床鋪，大家都一轉身就爬了起來，班長就立刻大聲喊道：

「首先，讓我們祝願我們的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全班的學生以高亢而整齊的聲調接上喊道。

我們這聲喊叫，宣告了我們這一個班的人都已經起床，開始做我們的「早請示」了。因爲我們知道：我們之前，還沒有齊呼「萬壽無疆」的聲音。這等於說，我們這個班已占先了。比起其他班，甚至其他軍人都占先了。爾後，祝林彪副統帥身體永遠健康、歌唱東方紅、唸幾段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的毛主席語錄……。都讓我們占了先。我們是邊動口，邊動手整理床鋪、穿衣，和其他內務。比及「早請示」做完，也就一切停當。走到小操場去列好隊，等候連長的到來了。

（未完待續）

(電影文學)

王希哲

作者：小 楓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 屈 原

(續)

(廣州市東山區西河甫路，綠樹成蔭。省委大院裏，趙書記的家。現代化的客廳佈置。鄰近港澳的廣東省委第一長官官邸，果然並非那些邊遠省份的長官住處可比。龐大的桌子面上擺滿了水果、點心，客人却只有一個：王希哲，笑容滿臉的趙書記正在招待他。)

趙：吃，吃，吃一點，這幾年委屈你了。

王：那沒什麼。

趙：這倒不是這樣說，我是常常為你們三個犯愁，年輕人嘛，說錯了幾句話，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受這麼大的委屈？……

(王希哲正想駁嘴，趙一擺手，習慣性地往躺椅上靠，臉朝天地)

趙：想當年，我們年輕時些，不也犯過錯誤嘛……嘿，嘿，(陷入回憶狀)是嘛，也犯過錯誤，跟主席跟得不夠緊嘛，……嘿……嘿，不夠緊。現在怎麼啦，組織上不也一樣信任嗎？……

王：(一絲不滿)我們可沒說錯話。

趙：(又是一擺手)年青人，不要那麼固執。固執沒有好處，要看形勢。你想文化革命初期，我

不也被你們小將鬪過嗎，中山大學的小將不是要我交出省委大印嗎？我明知你們是錯的，可是我一下子就交了，形勢嘛，得看形勢！

王：那完全是兩碼事。我們在「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裏說……

趙：(嗅到氣氛有點不對，趕忙坐起來)算了算了。過去的事，咱們也別提了，向前看嘛，都怪四人幫嘛，是四人幫害了你們，也害了我們嘛，要向前看嘛。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嘛，最近海內外的報章雜誌不也是在攻擊「凡是派」嗎？我們也不同意「凡是派」，……。

王：我很同意團結一致，共同對付「凡是派」。但是，這種團結，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要徹底清算四人幫的餘孽，就得讓人民說話，現在的關鍵是允許「評毛」，言者無罪。

趙：「評毛」可絕對不行。想想看，沒有毛主席，哪有我們今天！

王：(有點譏諷地)我說的是你們今天？

趙：(也有點愠怒地)我說的是：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

王：也沒有文化大革命。

趙：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不能評，一評就大亂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安定團結。搞四個現代化。
飯都吃不飽，講什麼民主？

王：專制之下，更沒有飯吃。

趙：你胡說，現在是鄧副主席掌權，誰專制？你說，誰專制！

王：（拂袖而起）趙書記，你今天召見我，就是爲了說這些話嗎？

趙：（冷冷地）是的。

王：那好，我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嗎？

（王轉身）

（趙勃然大怒，一拍桌子）

趙：你給我站着。

（王回過頭來，四目對視，王是冷靜地。）

趙：（停了好一會，放軟聲音）坐下，我還有一件事要對你說。

（王想一想，坐下）

趙：（聲音完全改過來了）你出獄的時候，不是提出過申請，要求分配工作嗎？

王：是的。

趙：你想分配到哪裏？

王：我申請到珠江電影製片廠，我父親工作的單位。

趙：你想當電影演員？

王：這一直是我的理想。（笑笑，話中消除了敵意）

趙：（這時也微笑着）省委可以考慮。我想你也知道了，李正天申請到美術學院工作，陳一陽申請到社會科學院廣東分院，我們都批准了，現在就剩下你了。

王：如果省委同意的話，那我……

趙：慢着，我說省委可以考慮你的分配工作。不過，你也要考慮自己的影響。

王：這是什麼意思？

趙：說明白些，你不能到社會上鬧，你們不能讓省委爲難。我對李正天也是這樣說的。

王：他？

趙：他態度很好。

王：你這是交換條件？

趙：（又有點惱怒了）這不是交換條件，省委是爲你着想，社會上現在大亂，階級鬥爭很複雜。你現在又沒有工作，哪有工資養家？還是安份守紀地工作，「珠影」很好嘛，有前途，……

王：（站起來，在來回地踱步，陷入沉思）

趙：你回去好好考慮一下，我們給你時間。

王：（霍地站住）不用了，我已經考慮好了。

趙：（希望地）怎麼樣？

王：（輕輕地，但又很堅定地吐出一個字）不！

（省委書記一下子仰躺在椅子上，大聲地叫）

趙：衛兵！

（衛兵如臨大敵地，衝了進來）

王：（笑着）看樣子，今天我又走不出省委的大門了。

（趙抑制着怒火，輕輕地對衛兵揮揮手）

趙：（對衛兵）幹什麼？……送客。

（東山區培正路。廣州師範學院就座落在古老的培正中學，現在的第七中學不遠的地方）

（方處長和李國坐在七中的一幢樓房裏，居高臨下地注視着廣州師範學院的大門。）

（街道上以及各個橫巷，都散佈着行跡可疑的行人，然而，人們畢竟是三三兩兩地走進了師院的大門了。）

李：（放下望遠鏡）那幫公安局的，全是飯桶。

方：也難怪，很難分辨出是師院的學生還是外人。

李：應該檢查學生證。

方：星期天，檢查什麼學生證？再說，要那麼一搞，那些民間刊物又該有話題了。

李：盯王希哲的還沒有消息。

方：他們出門了嗎？

李：還沒有。

方：昨晚他回家了嗎？

李：回了。

（方沉吟不語）

（中山三路，王希哲的家。鄭走到窗戶，打開窗簾一看，一部軍用吉普停在大門外面，裏面有人正在向窗戶眺望，鄭明鼻子裏“哼”了一聲。）

（王希哲和鄭明從家門出來，王穿着軍大衣，還戴了墨鏡，一出大門，軍用吉普車上跳下一個年青人，迎上前來。）

青：（敬禮）請問，是王希哲嗎？

王：是的。

青：團省委書記有事找您。關於團省委的青年座談會。

（王和鄭對視一眼）

王：我今天有些事情要辦。

青：首長等得好急，請您上車。

王：（故意沉吟了一會）好吧，您等等，我要換換衣服，還要處理一些家事。

青：好吧。

(王和鄭回到門裏去了。青走回車裏，洋洋得意地對吉普車上的司機擠擠眼)

(司機把腳擱到方向盤上，嘴裏叨着香煙，哼着流行的鄧麗君的歌曲，手裏正在玩着紙牌)
司：他不出來了，怎辦？(派了兩張牌給青)
青：哼，首長說，不出來更好。(和司機玩起牌來)

(吉普車外，已經很多煙頭了，「青」不耐煩地抬頭望望王的窗戶，窗戶上還有王希哲和鄭明的身影，司機撇撇嘴，說：「跑不了。」)

(車上的青年看看錶，再望着窗戶裏王的背影，突然喊了一聲：「不好！」跳下車就衝上樓去。)

(「青」氣急敗壞地「呸」的一聲推開房門，窗簾下赫然坐着一對男女，穿着是王希哲和鄭明剛才穿的衣服。)

青：王希哲呢？

男：(聳聳肩膀)誰知道。

青：(大吼)怎麼你們穿了他的衣服！

女：(不理他，對男的說)哎喲你知道嗎？有件新鮮事。

男：什麼？

女：最近團省委有個新規定——全省青年都不准穿王希哲的衣服。嘻嘻。

(「青」氣瘋了，一頓足掉頭衝下樓去)

(鏡頭轉回方處長、李國所在的樓房，李國還在望他的望遠鏡。鏡中出現了鄭明和戴着帽、低着頭的王希哲，正在向廣州師範學院的大門走來。)

李：來了，來了。(他大喜過望，放下望遠鏡，抓起了無綫電通話機大叫)攔住他！

(鏡頭轉到街上，曾經在大字報架前和鄭明打過交道的「便衣」收好通話機，向鄭等兩人迎了上去。)

(遠遠一見，回頭就走，「便」一邊口中叫着「喂！」「喂！」，一面趕緊追。兩人也越走越急。轉了幾條巷，氣咻咻的「便」總算追上了，他一手搭住了鄭的肩膀喘着大氣嚷：「你，你跑不掉。」)

(誰知兩人一回頭，「王希哲」一把扯下了口罩，却把「便」給氣楞了，這不是王希哲，而是一

個滿臉橫肉的絡腮鬍子。)

鬍子：(一把揪住「便」的前胸)喂，你想幹什麼？

「便」：對不起，對……

鬍子：(故意當街大嚷)你幹嘛調戲我的女朋友？

「便」：不……我是公安局的……

(街上的群眾開始逐漸圍上來)

衆：(打抱不平)公安局的就能欺負人啊……

鄭：(嬌聲嬌氣地)他不是公安局的，他上一次也是對我不禮貌。

「便」：你……你……

鬍子：(迫上前去，把強壯的胸部頂着「便」的鼻子)好小子，你五行欠揍……

(便衣哭喪着臉)

(王希哲已經在大會的會場裏了，這是一個一百多人的大型座談會，團省委宣傳部長公安局幹部，各大報刊的記者，裏面還可以分辨得出是來自香港的記者，相機的閃光燈在熠熠的閃着)

公：(對身旁的團省委部長抱怨地)你們真是的，怎麼說不服這些大學生。

宣：(黑着臉)他們提前開會，打我們一個措手不及。哼！你們也沒有攔住王希哲！

(王希哲對會議主席點點頭，站起來演說)

王：同學們，朋友們，今天「未來」雜誌編輯部邀請我來作個發言，很多人都勸我不要講，但是我想，這是我的責任，今天，就算是又衝了一次大人們的忌，又犯了一次報上的「禁」吧。我認爲，現在已經是公開評論毛澤東錯誤的時候了。我的發言題目是「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

(記者們的鎂光燈又起)

(劉華的笑臉)

(共青團省委宣傳部長和公安幹部面面相覷)

(鏡頭交疊。香港和海外中英文報紙。醒目的大標題：

王希哲發表評毛文章！

廣州市民主運動又起波瀾！

「李一哲」東山再起！

(各種報紙都交疊到趙書記的辦公桌上，趙在案上重重一擊，虎着臉霍地站起來，對面坐着表情不一的方處長、李國、團省委宣傳部長、公安局幹部。)

未完待續



惜陰

白丁作於 3.8.83

半天外飛過一顆流星，以蒼穹為畫布，大地做陪襯，在晴朗無際的碧空中輕輕滑過，留下一抹彎曲的淡色跡痕，不多久，消失在無窮的宇宙中，沒有一絲漣漪，好似一切不曾發生。

何處追尋？失落的心靈，那逝去的一萬三千多祇能回味的前塵，它化作一萬三千片彩雲，隨着微風，散去輕輕。

總當，用不竭，取不盡，何曾念過珍惜——這黃金般的歲月、青春？

他人鬢角華髮，額頭縐紋，喚不醒浪子悟頓；滿以為有能力掌握飛逝生命，捕捉那童年歡笑；不留神，如雨後彩虹般——消失的無踪影；祇留下遙遠而模糊的畫面，在腦海深處。

妄想以智慧的彩筆塗抹生命中的空白，不料繪

出的卻是醜陋的紅塵。在悲哀的喜悅中加添些無可奈何的樂章；提起鉛錘般沉重的脚步，沿着歷史中的羊腸山徑，循着先人犯過同樣錯誤的足跡，盲目往前摸索探測，心中想着一個永遠不能達到的幻境天堂，突地一聲杜鵑淒啼，驚醒夢中人，無奈花事欄珊，春意將盡。

別過臉，不讓任何人瞧，偷偷地，拭去淚痕，強顏歡笑，不想博取廉價同情。

但願不太晚，這不再的短暫生命。問題在，如何變一刹那為永恒。

當心，別像天外飛過的流星，以蒼穹為畫布，大地做陪襯，靜靜地滑過，在晴朗無際的碧空中留下一縷彎彎的淡色跡痕，不多久，消失在無窮宇宙中，沒有激起一絲漣漪，好似一切不曾發生。

姓名：英文

中文

NAME

地址：

ADDRESS

零售：每本 \$ 1.50

訂閱：（每六期計算）

普通訂戶：\$ 9.00

學生訂戶：\$ 7.00

贊助訂戶：\$ 30.00 以上

學校機構：\$ 30.00

海外訂戶另加郵資

航空：\$ 12.00

平郵：\$ 4.80

支票請寄：CHINA SPRING

（美國）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作家阿修伯(右二)

中國之春運動發言人王炳章(左一)

中國人權協會主席闕君飛(右一)「新土」雜誌社社長陳憲中(左二)



環境與衛生保護委員會主席任覺民(左)「中國之春」主編汪岷



中國保障人權委員會法律顧問吳律師(左)、作家陳若曦



紐約的一次中國人權座談會

前「中報」總編輯余國基(左)
台灣東吳大學教授孟德聲



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唐德剛



通訊處： 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 BULK RATE ==
== U.S. POSTAGE ==
== PAID ==
== NEW YORK, NY ==
== PERMIT NO.355 ==

電話：(212) 728-7008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主編：汪岷

定價(零售) 美國： 1.50 美元 加拿大： 2.00 加元 香港： 4.00 港元



殺風未已
攝影：木公